



韶關文史資料

第25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封面照片说明

封面照片为仁化县的华林寺塔。该塔位于仁化县闻韶镇下徐村、原华林寺西侧，今下徐小学旁，建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1989年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塔为平面六角、七层仿楼阁式砖塔，高19.6米，塔身边长1.84米，塔腔为壁内折上式结构，塔身置假平座，倚柱作莲瓣分节柱，栌斗和散斗为仰莲瓣状。

该塔1990年由省文化厅拨款进行了全面修葺。修葺过程中，在塔西南角第五至第六层之间拾取了北宋咸平、景德、熙宁、元丰等年号铜钱98枚，青瓷杯一件，银小佛像三尊（已碎），并拾取了铭文砖和纪年砖各一块。纪年砖行书阴刻“元丰五年九月二十日造”，铭文砖行书阴刻“谢道人结塔（缘）好”。

（侯荣丰）

韶关文史资料

第二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十月

韶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主任：伍时永

副主任：苏广赞 朱祖平 吴娇娣

委员：叶格根 毛根能 麦 丰 官景泰

杨继光 廖伟迅 王志明 朱庆明

聂德存 林志胜

目 录

- 粤北地区五十年代报纸发展史 王 刚 (1)
- 韶关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变迁 李璇光 (24)
- 建国初期的重大斗争
- 粤北地区剿匪概述 朱定桂 (29)
- 曲江的土地改革运动 甘 峰 (59)
- 建国初期的始兴教育事业 陈遐莹 (69)
- 回忆在北江公学学习的日子 赵洪波 (81)
- 粤北在三年游击战争湘南游击区中的历史和作用
- 廖冶金 (85)
- 大革命时期的乐昌工农运动 廖冶金 (95)
- 仁化县长江镇的广州会馆 刘森华 (112)
- 一条六十年前的抗日标语 刘森华 (116)
- 长江抗日宣传剧团 刘森华 (118)
- 曲江东水农运概况 甘 峰 (119)
-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 解放前夕翁江人民的革命活动 何群新 (124)
- 韶关飞机制造厂的兴衰 关中人 (128)
- 铜韶忆旧
- 和平路的昨天 鲁 韶 (131)
- 杨新先生生平事略 甘 峰 (137)
- 于光远在翁源的抗日活动 官永辉 (143)
- 刘怀汉烈士传略 李启民 (150)
- 布衣诗人廖紫舟生平事略 杨民生 (153)

粤北地区五十年代报纸发展史

王 刚

前 言

五十年代，粤北包括现韶关、清远两地级市。建国后，因行政区域几次变动，报纸名称亦随之几次变更。五十年代初，那时的北江专区包括现韶关、清远两地级市的全部，及现由广州市管辖的从化市（原从化县），共 17 个县（市）。1952 年下半年，广东省撤销专区，设立粤东、粤西、粤北、粤中、海南五个行署区。粤北行署区管辖现韶关、清远两地级市的全部及河源市的一部分县，现广州市管辖的花都市（原花县）、从化市，共计 22 个县（市）。1956 年初，广东又撤销行署区，恢复地区。现韶关、清远两市的全部，当时共 16 个县（市）改称韶关地区。粤北行署区撤销之后，习惯把韶关、清远两市称为粤北，沿用至今。因行政区域几次变动，报纸名报依次变更如下：北江日报、北江导报、北江日报、北江农民报、粤北农民报、粤北日报、韶关报，现是韶关日报。报纸虽然几度易名，但是，报纸的性质及主管机关始终没有变，性质依然是地区一级（或地级市、区党委）的党委机关报，主管机关依然是地（市）委（区党委）宣传部。

五十年代的韶关地区 16 个县（市）都创办了县（市）报，

不少县（市）报由周二刊发展为周三刊、日刊，有些县（市）报先后请郭沫若、朱德、陶铸题写报名。各县（市）报出版时间最长的有6年，最短的约2年。

一、《北江日报》时期

1949年10月7日，韶关解放。当时特务造谣，土匪猖獗，群众顾虑，社会还不安定。中共北江地委决定立即出版《北江日报》，把办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以安定人心，恢复秩序，恢复生产。

（一）艰苦办报，以苦为乐

当时没有社址、未有人员，更没有印刷厂。地委一声令下出报，北江地委宣传部立即指派由李凌冰同志牵头，负责出报。同时，宣传部决定分两批人马，双管齐下。其中一批人马由李子明和梁木两位同志筹备印刷厂，筹备社址。

当年10月25日，即韶关解放后10多天，《北江日报》第一期刊世（暂定四开二版、三日刊）。由李凌冰、苗霖雨两位同志编写材料，陈时良同志等几位已调编辑部工作，逐步充实编辑部。报纸交由私营商店（韶关李汝文具店）承印，每期印一千多份，由郑石安等五、六个“小鬼队”（从游击队转来）挨家挨户分派，免费赠送市民阅读。到11月底，已出版10期。社会秩序也已逐步安定、恢复正常。“小鬼队”亦已边赠报、边征求订户。至同年12月1日，已有二千多订户，开始正式出版日报，四开四版，向全北江专区公开发行（1951年3月1日起全国报纸由邮局统一发行）。

另一班人马筹办印刷厂、社址等，李子明同志通过省政

府杨秘书长，由广州拨给一部印刷机；梁木同志通过韶关军管会同广州军管会联系，广州将接管国民党所办《西南日报》印刷厂的印刷机及铅字粒，由30多名印刷排字工人负责运送到韶关。解放前夕，粤汉铁路（解放后扩建改称京广铁路）被国民党破坏，在琶江口有一段铁路桥梁被炸中断，30多名工人不顾天寒水冷，水深流急，硬把所有印刷机等设备，全部在北江河中抬过对岸去，并无任何人叫一声苦。

《北江日报》社址亦已选定，由韶关军管会将接管国民党时期的农业银行房产（原市区民权路64号，现东堤中路172号）交给《北江日报》作为社址。这座四层楼房的报社，首层是报社营业部、印刷厂及发电机房（自己发电印报），二楼是报社员工宿舍，三楼是编辑部、采访通联部及宿舍，四楼是电台及宿舍。楼房并不大，要容纳近百人的住宿，是十分拥挤的，不少同志睡集体大宿舍二层“木架床”。大家过着供给制生活，除工人领低工资外，其余同志每月只领理发“钱”，生活艰苦可想而知，但这比游击队的生活已安定得多，大家反而以苦为乐。

有了社址有了印刷厂，保证了日报出版的正常运作。日报出版前，已调来40多人，原是北一支队、北二支队、连江支队的干部，充实编辑部、采访通联部及各管理部门。这批同志在游击区已习惯艰苦生活，所以编辑部每晚工作至深夜，也习以为常。每晚由编辑改稿、总编审稿、捡字、打印校对，最后送宣传部长审阅签字后印刷出版，保证明晨读者看到日报，全部运作于当晚完成。有一段时间，地委宣传部长金阳下乡土改，由地委书记伍晋南每晚深夜审阅报纸大样，并由他签字同意才可付印。解放初期，为了保证报纸宣传不出政治上差错，所以审稿制度比较严格。北江日报后期由我及陈

明峰两人负责校对，不管是寒冬雪夜，也不管是刮风下雨，我们每晚深夜轮流把报纸大样送交地委书记伍晋南审阅签字付印。校对的同志还要负责出版前的监印，印出第一张报纸后由监印校对后签名才付印，校对工作时常要坚持到下半夜。

（二）全党办报，领导带头

当年由上到下强调“全党办报”，中共北江地委很重视报纸的宣传工作，积极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任命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金阳兼任社长，代表地委直接领导报社工作。副社长李凌冰兼总编辑，后由杨重华、李子明（原任北江日报经理）先后接任总编辑。1950年2月5日，北江地委作出《关于改进北江日报的决定》，决定设立《北江通讯社》，由金阳兼社长，李凌冰任副社长，各县委宣传部长为特约记者，各县委宣传干事为通讯员，各县成立通讯组，由县委宣传部长任组长。同时，地委决定成立以北江地委书记伍晋南为首的党报社论委员会。委员会由伍晋南（北江地委书记）、黄业（军分区司令员）、何俊才（北江专员公署专员）、袁鉴文（军分区副政委）、金阳（北江地委宣传部长）、吴伯仲（韶关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杨重华（北江日报总编辑）等七人组成。《决定》还对报纸的宣传方针、读者对象、发行工作等作出明确规定。为了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决定》规定地委委员、县委委员，每人每月要给北江日报写稿一篇，内容及稿件长短不限。以后，地委书记伍晋南、地委第二书记梁威林、地委第一副书记张根生、秘书长林名勋等地委领导带头为报纸写稿、写社论，从而带动了各县积极写稿。现将地委书记伍晋南、第一副书记张根生当年为《北江日报》撰写的稿件，选登如下：

对曲江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希望

伍晋南

曲江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曲江县的空前盛举。这个会议一方面表示着曲江各界人民的大团结，一方面表示着曲江的人民已经起来当家作主了。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初期的形式，它的主要任务是经过各界代表将各界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作成决议，然后又经过各界的代表将决议传达到各界人民群众中去实行。因此各界的代表应将各界人民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有这样会才开得好，才能作出为人民兴利除弊的决议来。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又是政府联系人民，人民监督政府，贯彻中央各种法令，解决当前各种工作问题的机关，绝不是徒然的应付场面。我们要把各界人民代表当作一家人一样，共产党员应诚恳的谦逊的与各界代表共商问题解决问题，执行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共产党员只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而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的指示。

目前曲江县残匪尚未肃清，有不少的乡村，恶霸还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春耕季节已到，荒月迫在眼前，秋征任务尚未完成，因此，如何肃清土匪，如何反掉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霸，如何发动群众春耕度荒，进行减租退租与解决春耕渡荒中的困难，以及如何继续完成秋征任务等，都是目前曲江县的人民急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希望此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认真讨论作出合乎人民目前所需要的正确的决议来。祝

县代表会议胜利成功！

（编者按：本文的作者伍晋南同志是中共北江地委书记）

清远源潭区台前乡 通过诉苦扩大串联农民队伍日日壮大

张根生

清远县源潭区台前乡，在夏收前进行了退租退押斗争，初步组织了农民队伍，如五村已有七十多个农民参加退租退押委员会及贫雇农小组，一村二村也有了四十多人的贫雇农小组。但由于前一段运动着重了退租退押的经济果实，没有很好开展诉苦反霸斗争，因此恶霸没打倒，群众队伍也不巩固，群众还想“快划阶级分田”。这次工作队落乡，知道这种情况后，就先深入贫雇农家中去发现苦主，进行启发教育，并召集积极分子开会进行诉苦，审查了原来的“根子”。九月二十日，区农民代表会开完后，本乡十七名代表回村积极向贫雇农传达。五时因为原来没有贫雇农小组，就由代表及在原来积极分子中选了廿余人，开小型贫雇农会议进行诉苦，当场有雇农妇女孔三妹诉出：“我老公前三年帮地主叶龙扬打工担烟，累得吐血，我家穷无钱请医生，跪求地主几天，一个钱也不肯借，我老公就病死了！我没饭吃，把七岁的女仔也卖掉了！”一晚有十几人纷纷控诉地主的剥削压迫，最后大家一致拥护区农民代表会决议，由廿几人作根子，按自然村分六个小组去串联贫雇；经过两天时间，已串联到一百余人。工

作同志和代表每天都是白天访贫问苦，培养苦主，晚上开小组会诉苦。一村二村则一方面以原来贫雇小组进行诉苦扩大串联，另一方面又直接深入未组织起来的（过去工作同志和代表都认为是落后分子的）贫雇农中去扎根，启发诉苦。只八村一个自然村，就发现培养了九户真正最劳苦的贫雇农起来诉苦，并加入组织。一个叫潘漠的老雇工诉苦说：“我帮地主潘左庭打了十二年工，孩子被害死两个，五间房子四斗种田也卖给了他。”现在一村二村也正一面诉苦一面整理扩大贫雇农小组。全乡准备再用几天时间，进行深入诉苦，然后召开乡农代会成立新农民协会，领导进行反恶霸斗争。

说明：根子是指工作同志到村级最初找到的贫雇农。

北江地委领导经常关心过问报纸的工作情况，下乡时，要求报社派记者随从，并具体指导记者调查了解农村情况作宣传报道。报纸的言论及报道，地委领导坚持把关。

根据北江地委的决定，《北江日报》的读者对象是面向各阶层人民，以农村为主（当时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报道方针、内容是围绕新解放区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改划阶级、分田地、镇反、抗美援朝等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针对新解放区情况复杂、土匪活动猖獗、敌人不断散播谣言，一些后进群众不明政策，存在怕变天等思想情况，大力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北江日报》积极贯彻地委和上级的指示，对于团结教育人民，分化、瓦解、打击敌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三）老兵上阵 卓见成效

《北江日报》全体同志兢兢业业工作，不但保证了报纸每

天正常出版，而且使重大消息见报快，社会影响大。报社的电台每天收录全国电讯，报社记者每天采写各县消息，《北江日报》及时完成各项宣传任务，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首先，全体报社人员不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重要的是还有一批有经验的老兵上阵，如李凌冰、杨重华、李子明等同志都是“三八式”干部（1937年至1938年入党），有工作经验。那时报社干部大都是十多岁至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社长金阳也是刚三十出头，大家朝气蓬勃，精力充沛，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其次，就是靠笔杆过硬，因为编辑部有部分同志解放前就做文化教育工作，文字工作有“老底”，如杨重华等，这一部分同志是大学生。并且，有一批有经验的老新闻工作者，如李凌冰、李子明、梁木、张岳强、莫巩、蔡慧、崔耀钟、张文、谢君豪等同志，在解放前曾是新闻工作者，或在游击区已搞报纸工作，他们业务熟悉，发挥了自己的专长，为报纸的宣传工作作出了贡献。因此，《北江日报》创刊后很快走上正轨，宣传工作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北江日报》出版两年来（中期有半年曾更名《北江导报》，内部发行），在历史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老兵上阵为《北江日报》作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在我国建国五十周年之际，仅将这批离休老兵的名字记述如下：

金阳（北二支队，离休前任广东省政府环境保护局局长）、李凌冰（北二支队，离休前任韶关地委副书记，离休后任韶关大学代理书记）、杨重华（连江支队，离休前任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党组成员，离休后任该社特邀编审，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李子明（北二支队，离休前任广东省乡镇企业局副局长）、梁木（北一支队，离休前任广东省委党校校长、省委委员）、张岳强（东江纵队，离休前任广东省

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莫巩**(北江二支队,离休前任南方日报编委、部主任)、吴江(连江支队,离休前任省社会科学院负责工作)、官健(北一支队,离休前任社会主义学院负责工作)、陈时良(北二支队,离休前任韶关教育学院党委书记)、谢劳(北一支队,离休前任韶关市计委副主任)、蔡慧(北一支队,离休前任致公党广东省委办公室副主任)、**钟祥奎**(北二支队,离休前任韶关市浈江区政协主席)、刘烈义(北二支队,离休前任乳源瑶族自治县人大办公室主任、离休处级待遇)、包汉驹(北一支队,离休前任羊城晚报海外版副主任)、关筱(我党地下交通站,离休前任羊城晚报海外版副主任)。下列老兵北二支队的有:王功、莫明、罗铎、欧阳干戈、钟祥兴、苏茂亮、郭家兴、陈因、刘辉明、李华、朱群、张世春、**林邦年**、欧阳姗、**崔耀钟**、黄强、张牛、下列老兵属北一支队的有:何希贤、潘英霖、郑石安、林圻、刘克培、何秉泰、范武。属连江支队的有:马文、**巫毅芝**(上述排名不论先后)。

二、《北江农民报》及 《粤北农民报》时期

《北江农民报》及《粤北农民报》出版共有四年多时间,为叙述方便起见,现以大事记形式把报纸的发展状况记载如下:

1. 1951年10月1日,北江地委决定《北江日报》更名为《北江农民报》。根据1951年8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南区报纸工作会议关于地方报纸要面向农民,宣传土地改革,及解决地方报纸通俗化问题的精神,地委决定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宣传

教育，加强报纸在农村中的作用。改版当天，刊登中共北江地委“关于出版北江农民报的决定”。读者对象以农民、农干、县区乡干部及土改工作队为主。改版后，社址不变，版面不变（四开四版），三日刊。

2. 《北江农民报》社长由北江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金阳兼任，副社长为李凌冰，总编辑李子明。

3. 报纸改版之后，为解决通俗化问题，对报纸进行改革。内文改用老五号楷书排印，版面编排实行方块化，文字要求通俗浅白，消息一般三百至五百字，通讯一般八百字，要求图文并茂。编辑记者不得使用农民难懂的字句，使不认字的农民听得懂，粗通文字（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可以看懂。

4. 1952年6月，《长江文艺》（中南区文艺刊物）专题介绍《北江农民报》山歌创作经验。当时报社经常刊登山歌联唱（有男女对唱）、山歌戏。粤北农民演唱山歌联唱、山歌戏，并参加汇演，很有特色，远近闻名。

5. 1952年，粤北区党委从土改工作队中抽调一批人员到报社工作，加强报社力量。报社编辑部加强农业组的力量，加强记者下乡采访人员，用主要力量抓好农业生产及互助合作的报道。

6. 1952年下半年，北江专区改为粤北行署区、报纸名称于1952年11月19日第136期起改为《粤北农民报》。社址仍在民权路64号（现东堤中路172号）。

7. 粤北区党委领导积极带头为《粤北农民报》写稿，善于利用报纸指导工作。粤北区党委书记伍晋南撰文：在土改胜利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1953年5月1日第一版）、粤北区党委第二书记梁威林撰文：响应党中央增产节约的口号（1953年10月1日）、粤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张根生撰文：全

党必须动员起来，为战胜当前的旱灾而斗争（1953年7月25日）。

8. 党中央十分重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作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在各地报上公开刊登。《北江农民报》及《粤北农民报》历来重视开展报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当年开展批评是雷厉风行的，仅在1953年2—3月份，刊登批评稿件10多篇，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其中，1953年2月10日一版头条为连山县公安局副局长陈世富等有意陷害农民并抵抗批评。同时刊登调查报告，并发表陈世富的犯罪行为令人不能容忍的评论文章。报纸公开批评之后，陈世富等陷害农民事件有关人员已受到严重处分（1953年2月22日见报）。又如，翁源县建设科副科长贺玉龙殴打老婆，违法乱纪侵犯人权。当时正是公布婚姻法之后大力贯彻婚姻法。报纸抓住这个典型，于1953年2月19日刊登批评稿的当天，开辟“贺玉龙思想”讨论栏目，陆续刊登讨论稿10多篇，从而推动了婚姻法的宣传贯彻。至同年4月10日，贺玉龙受党内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此外，报纸还刊登了翁源法院处理婚姻案件有很大偏差（1953年3月25日见报）、曲江乳源县粮食局副局长李永违法乱纪严重压制批评，用手枪强迫别人结婚的批评文章（1953年2月25日见报），见报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9. 一方面，报纸敢于开展公开批评，另一方面，粤北区党委领导积极支持报纸开展批评。当时任粤北区党委的宣传部长梁威林在该报撰文：积极主动领导反违法乱纪的斗争（1953年2月22日刊登）、当时任区党委的秘书长张根生在该报撰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1953年2月28日刊登）。

10. 报纸不单是公开批评别人也敢于公开批评自己。1952年1月,《北江农民报》发生停止关锡桢通讯员资格的错误,为此,报社刊登了检讨书。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连山县委宣传干事关锡桢来稿批评连山县公安局某南下干部作风恶劣,见报后,关锡桢被围攻殴打。连山县委书记王贵华(南下干部)来信反说关锡桢闹不团结,批评失实,错在关锡桢。这时《北江农民报》没有派员到连山县进行调查核实,就匆忙作出停止关锡桢通讯员资格的决定。后来,连山县干部意见很大,反映到南方日报。结果,此事由北江地委书记伍晋南亲自处理,调集连山县双方人员到地委,进行公开辩论,最后,证实关锡桢没有错,北江农民报公开给关锡桢恢复名誉。王贵华,也因此而调离连山,由县长黄漫江任书记兼县长。

11. 1953年下半年,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全面结束,中南区在武汉再次召开报纸工作会议。粤北农民报总编辑李明参加武汉会议(已实行总编辑负责制,不设社长)。会议贯彻土地改革结束后,强调发展生产,发展互助合作,加强工农联盟宣传的办报方针。

12. 之后,分别于1953年11月25日及28日起,以章回小说的形式,逐期介绍“陈翊科互助组”及“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及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连续报道本地区各地农民响应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农业社向全国农民的挑战。编写“互助合作讲话”专栏,开辟讨论栏目“大家来讨论:农民走那条路好?”

13. 1953年起,编辑部由三个组改为设立五个组:农业组、文化生活组、时事工业组、读者来信组、通讯读报组。明确规定各组职能,实行“组包版”进行工作,各组采编合一。农业组包第一、二版,文化生活组包第三版,时事工业组包

第四版。各组由改稿、编稿、划版面、校对，一条龙包到底，最后将各版大样交总编辑审阅。

14. 1954年以前，总编辑审阅报纸大样后送地委领导审阅，1955年后，地委领导不再审阅报纸大样，只审阅重要评论及重要报道。1955年下半年，报社设立办公室，执行编委职责，协助总编辑工作。办公室由王乃夫担任主任，陈时良及魏锦坤任副主任。第一版至第四版的稿件及大样，分别由王乃夫、魏锦坤、崔耀钟、陈时良等四人代表总编审阅。

15. 1954年起，直属机关理论学习制度化。报社总编辑参加地委高级组学习。各组组长以上参加中级组，学习政治经济学及俄共（布）党史（主要学习新经济政策部分）。初级组学习哲学。

16. 1954年1月，总编辑李子明调任连南县委书记，莫巩任副总编辑。

17. 报社文体体育活动活跃，经常进行篮球、歌咏、舞蹈活动。报社篮球队经常与外界进行友谊赛。韶关市第一届运动会，报社获奖项目有：男子400米接力赛第一名，个人三级跳远第一名，个人跳高第三名，掷手榴弹第三名，歌咏赛团体奖。

18. 各地农会组织重视读报活动，由农协小组组织读报组，比较经常进行读报活动的读报组，每个县都有几十个。

19. 1954年8月22日，《粤北农民报》由343期起迁至闻韶北路新址办公（现东堤中路40号），粤北农民报印刷厂改为“粤北印刷厂”，使用粤北农民报旧址为厂址（后该厂迁至五里亭，原址改为粤北印刷厂营业部）。报社迁新址后，与印刷厂分家，《粤北农民报》由粤北印刷厂承印。

20. 1955年2月1日，粤北农民报由第395期起改为二

日刊，仍是四开四版。报社人员此时增至 48 人（包括行政后勤人员），计划在适当时候出版日报。

21. 粤北农民报每份零售三百元（旧人民币），每月报费四千五百元。1955 年每月报费改为四角五分（新人民币，即现通行的人民币）。报纸发行数量最多时是 3 万多份。

22. 报社每年召开一次通讯工作会议，研究总结通讯工作。报社拟定每个时期的报道计划及报道要求，发给各地通讯员参考。报社领导列席地委有关会议，经常及时地将地委的工作布置及对报纸的报道要求向编辑部传达。

23. 1956 年，中共韶关地委贯彻省委提出的“加强省报，停办专区报，发展县报”的方针，《粤北农民报》于 1956 年 3 月 1 日停刊。报纸出版最后一期是 1956 年 2 月 29 日第 587 期。

24. 粤北农民报停刊后，报社房产由政府拨给韶关邮局使用。

25. 报纸停刊后，原报社工作人员 48 人中有 12 人上调广州，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南方日报、华南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前身）、省电台、广东青年报等单位工作。有 12 人分配到各县创办县报，其中一部分人担任县报负责工作。其余 20 多人分配到韶关地区一级各单位工作。

三、《粤北日报》始末

《粤北日报》于 1959 年 1 月 6 日正式出版，四开四版日报，是韶关地委机关报，向全韶关地区发行。

出版初期，由韶关地委常委、地委宣传部长李凌冰兼任总编辑，陈迟（陆润玲）任副总编辑。1960 年 10 月，陈迟调

任工作，改由陈景文任副总编辑。党支部书记苏茂亮及王乃夫两人参加报社领导班子，领导成员共三人。

编辑部共 22 人，其中编辑 6 人，负责编辑四个版的报纸；记者 7 人，每人负责两个县的报道工作。通联组 4 人，负责来稿登记和分发及发行工作，另校对 1 人，美工 1 人。报社不设财务，全部工作人员由地委行政科发工资，报社办公亦在地委大院内。

《粤北日报》由粤北印刷厂承印。1959 年下半年，在粤北印刷厂抽调印刷排字工人，创办地委印刷厂，厂址设在韶关地委大门对面，即现“韶关日报印刷厂”前身。印刷厂创办初期，全部工人工资亦由地委行政科发给，后来改为印刷厂自己发给（报社人员的工资仍由行政科发给）。广告、报纸发行收入归印刷厂，报纸的印刷费亦由印刷厂包下来。

《粤北日报》报道内容主要是农业，读者对象主要是县、区、乡干部及农民。1958 年至 1960 年是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报道内容、标题、口号，均按“大跃进”的要求，取用大字标题、口号，有时大字标题、口号几乎与报头大小相等，有时大到超过报头字，口号、标题所占版面幅度很大。

《粤北日报》工作人员的工作干劲，亦按“大跃进”的要求，每晚一般工作至 12 时，有时工作至凌晨一时，翌日继续工作。

《粤北日报》发行量，开始是一至二万份之间，后来要求报纸发行“大跃进”，发行量最多时，增至五万多份。于是，印刷厂购置新的卷筒胶印机，以适应发行量大增的需要。

“大跃进”时期财政经济困难，新闻纸紧缺，省委于 1961 年指示要求停刊。当时韶关地委要求《粤北日报》坚持办下去，新闻纸紧缺就改用南雄土纸印刷。1961 年开始使用南雄

土纸代替新闻纸，一直坚持到1961年8月30日，出版最后一期（报纸出版两年零8个月）。停刊后，报社全体人员于9月9日合影。

附：五十年代地区报纸报头字样

北江日報

北江農民報

粵北農民報

题字人：伍晋南

粵北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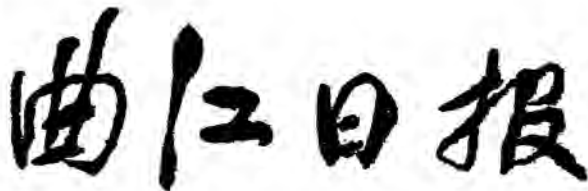
题字人：李祥麟

四、县报发展状况

1956年3月24日，广东省委作出关于发展县报的决定。决定共有六个要点：第一点是说明发展县报的意义，我省绝大部分县出版县报已具备一定基础。第二点对县报干部的配备，作出规定：1. 县报主编应由县委委员担任，如暂时人选有困难，可由区委书记或相当区委书记的党员干部担任，使其能列席县委常委会议和全体会议。2. 应配备3—5个编辑记者。3. 县委要定期讨论报纸工作，并由县委书记之一直接负责对县报的经常领导。第三点是说明县报的性质和任务。第四点是规定县报的办报方针和宣传要点。第五点是说清楚县报的刊期，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订县报，由邮局负责发行。第六点是要求各地委农民报在停刊前要举办县报干部培训班。

根据省委的上述决定，粤北农民报于1956年2月份举办了县报干部培训班。县报培训班结束后，韶关地区16个县（市）按照省委上述规定于上半年已先后创办出版了县报。其中，《韶关日报》请郭沫若题写报名，《曲江日报》请朱德题写报名，《阳山报》及《翁江报》请陶铸题写报名。现在的《韶关日报》的报头字，便是使用当年郭沫若为当时的《韶关日报》题写的报头字。

附：《曲江日报》、《阳山报》、《翁江报》、《韶关日报》报头字样



题字人：朱 德

韶美日报

题字人：郭沫若

阳山报

题字人：陶铸

翁江报

题字人：陶铸

韶关地区各县对办县报很重视，韶关、阳山和新丰等县（市）报主编，是由县（市）委委员兼任，其他各县报主编均由正科级干部担任。由于县报配备干部力量较强，各县报在各地农村都发挥了自已的作用。但由于1958年起的三年经济财政困难，新闻纸紧缺，各县报难以为继，根据省委指示，各县报大部分在三年困难时期先后停刊。现将当年韶关地区各县（市）办报情况列表于后。

粤北地区五十年代县报发展状况

| 报纸名称 | 隶属性质 | 社 址 | 创、停刊日期 | 主要办报人 | 版面、刊期 | 发行量 (份) |
|----------------------|---------------|----------------------------|--|-------------------|---------------------|----------------|
| 阳山农民报 阳山报 | 中共阳山县委机 关报 | 县委大院内 | 1956年1月创刊, 1958年12月停刊 | 梁木(兼) 梁文法 | 四开四版 三日刊 | 5500 |
| 曲江农民报 曲江报 曲江日报 | 中共曲江县委机 关报 | 县委大院内 | 1956年3月1日创 刊,1957年1月改名 《曲江报》,1958年7 月改名《曲江日报》, 1959年1月停刊 | 魏锦坤等 | 四开四版 三日刊 | 3000至 16000 |
| 新丰农民报 新丰日报 | 中共新丰县委机 关报 | 县委大院内 | 1956年3月25日创 刊,1958年5月1日 改名《新丰日报》, 1958年底停刊 | 陈森翰 梁仲桓 丘文杏 | 四开四版 三日刊转 双日刊 | 1500 |
| 乐昌农民报 乐昌日报 | 中共乐昌县委机 关报 | 城关府前路128 号,后迁县政府 大院内 | 1956年3月创刊, 1958年4月改名《乐 昌日报》,1961年停 刊 | 肖学信 | 四开四版 双日刊 | 3000 |
| 始兴日报 | 中共始兴县委机 关报 | 县委大院内 | 1956年3月创刊, 1961年1月停刊 | 苏茂亮 黄海清 | 四开四版 日 刊 | 4000至 6000 |

续上表

| | | | | | | |
|----------------------|--------------|--------------|---|------------------|-------------------|------|
| 乳源报 乳源日报 | 中共乳源县委 报 | 县府大院内 | 1956年4月创刊, 1958年10月改名 《乳源日报》,同年12 月停刊 | 王刚 丘汉辉 | 四开四版 日刊 | 1700 |
| 南雄农民报 南雄报 南雄日报 | 中共南雄县委 关报 | 维新路33号 | 1956年4月创刊, 1957年改名《南雄 报》,1958年12月改 名《南雄日报》,1959 年7月停刊 | 廖德明 凌康民 | 四开四版 三日刊 日刊 | 1000 |
| 连山农民报 连山报 | 中共连山县委 关报 | 县委大院内 | 1956年4月创刊, 1957年12月停刊; 1958年7月创刊,同 年11月停刊 | 张铨槐 钟伯扬 | 四开四版 三日刊 | 1000 |
| 仁化农民报 丹甯报 | 中共仁化县委 关报 | 县城和平路40 号 | 1956年4月创刊, 1957年1月改《丹甯 报》,1958年底停刊 | 黄日光 吴德 张文南 | 四开二版 双日刊 | 1000 |
| 连南农民报 | 中共连南县委 关报 | 连南县三江镇 | 1956年创刊,1957 年停刊 | 蔡焯焯等 | 四开四版 | 1000 |

续上表

| | | | | | | |
|-------------|-----------------------------------|-----------------------------|---|-------------------|--------------------|----------------|
| 韶关报 韶关日报 | 中共韶关市委机 关报 (三县一市合并 为县级市) | 市区风度北路 126号,后迁忠信 路34号 | 1956年5月1日创 刊,1958年6月1日 改名《韶关日报》, 1961年3月1日停 刊 | 何定仰 杨宜崢 吴就培 | 四开四版 三日刊转 日刊 | 3000至 20000 |
| 翁源农民报 | 中共翁源县委机 关报 | 翁源龙仙镇 | 1956年3月25日创 刊 | 胡成 陈学庭 谢立中 | 四开二版 三日刊 | 4000 |
| 翁源建设报 | 中共翁源县委机 关报 | 翁源龙仙镇 | 1958年6月更名至 1958年12月30日 | 谢立中 沈学文 刘光 | 四开二版 二日刊 | 5000 |
| 翁江日报 | 同上(新丰与翁 源合并时办的 报) | 翁源城(官渡) | 1959年1月至1959 年9月 | 丘文杏 谢立中 沈学文 | 四开四版 日刊 | 10000 |
| 翁江报 | 同上(翁源与新 丰分县后办的 报) | 翁源龙仙镇 | 1959年9月至1961 年3月 | 谢立中 沈学文 刘光 | 四开四版 二日刊 | 5500 |

续上表

| | | | | | | |
|----------------------|------------------|----------------|--|-------------------|--------------------|----------------|
| 佛冈农民报 从化日报 | 中共佛冈县委 关报 | 县府大院内 | 1955年秋创刊,1958 年划归从化管辖后 改为从化日报,1960 年停刊 | 洪 流 | 四开二版 周刊 | 3000至 5000 |
| 英德农民报 英德报 英德日报 | 中共英德县委 关报 | 旧县城人民路 | 1956年2月创刊, 1958年2月更名为 《英德报》,1958年8 月改为《英德日报》, 1959年7月停刊 | 林华盛 曾自立 卢海寿 | 八开二版 三月刊转 日刊 | 5000至 18000 |
| 连县农民报 | 中共连县县委 关报 | 县委大院内 | 1956年3月创刊, 1958年11月连阳四 县合并为连阳各族 自治县,改名为《连 阳日报》;1959年7 月更名为《连阳报》 | 林 超 | 四开二版 3日刊 | 3000至 4000 |
| 连阳日报 | 中共连阳各族自 治县机关报 | 连县中山北路 117号 | | 林 超 | 四开四版 日刊 | 20000 |
| 连阳报 | 中共连阳各族自 治县机关报 | 连县中山北路 117号 | | 林 超 | | 16000 |

续上表

| | | | | | | |
|-------|--------------|------------|-------------------------------|-------------------|-------------|-----------|
| 连州报 | 中共连州各族自治县机关报 | 连城县城爱民路37号 | 1960年划出阳山县后,改名为《连州报》1961年3月停刊 | 林超 | 四开四版 三日刊 | 8000 |
| 清远农民报 | 中共清远县委机关报 | 县委大院 | 1956年4月1日创刊 | 车昶道 | 二版 每周二期 | 几千至 一万 |
| 清远报 | 中共清远县委机关报 | 县委大院 | 1957年7月1日创刊 | 车昶道 | 四版 每周二期 | 一万至 二万 |
| 清远日报 | 中共清远县委机关报 | 县委大院 | 1958年初创刊 | 车昶道 郑瑞南 刘汉元 | 每天一期 | 稍增 |
| 清远报 | 中共清远县委机关报 | 县委大院 | 1959年底创刊,1961年2月16日停刊 | 刘汉元 | 每三天 一期 | |

注:1956年2月16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为《清远日报》刊头题字,这一刊头一直沿用到停刊(《清远报》期间,把“日”字去掉)。

韶关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变迁

李璇光

民国时期，韶关市区公共体育场所设施十分简陋。仅在中山公园（今市政府大院）内设有沙土篮球场、排球场和小型足球场。抗日时期省府迁韶后，曾于1941年在这里举行纪念“五四”青年节全市篮球、足球赛，同年8月31日举行“汉魂杯”篮球赛，同年9月9日举行庆祝体育节球类、拔河、国术（武术）等项比赛。1943年举行秋季“学艺”篮、排、足球赛。1944年由中苏文化协会广东分会举办“盟国胜利杯”中学生足球赛。另外，在西河芙蓉山下、韶连路边的低洼地设有一块沙土运动场，叫芙蓉山运动场（今西河体育中心位置），1943年12月25日至30日在此处举行粤北运动大会。在黄田坝设有党团球场（篮、排球场），在西河武江河畔设有简易游泳场，还在青年会内设有乒乓球室。

建国以后，由于党和政府对体育工作的重视，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1953年市体委的建立，陆续兴建了一批标准实用的各类体育场馆设施。

灯光球场

原设在中山公园内的灯光球场，于1957年10月迁至园前路（今市公共汽车公司位置），除架设灯光外，还增设木结

构看台，可容观众 4000 人。当时发动群众义务劳动，仅用七天时间完成。1964 年因扩建街道而拆除，另在园前东路重建，后改建成体育馆。

体操室

建于 1957 年 10 月（今市体委位置），由政府投资 2 万元建成。体操室为砖木结构，长 30 米、宽 18 米。可作篮球、体操、乒乓球室内比赛和训练之用。建成后即承办了全省乒乓球锦标赛。1996 年因建体育大厦而被拆除。

游泳场

西河游泳场拆除后，于 1961 年在园前西路兴建游泳场。该场占地 5600 平方米，设有跳水比赛池、练习池（初级池）和儿童池各一个。池体为砖石水泥结构。跳水池深 4.8 米，设有 3 米、5 米、10 米跳台。场内有更衣室、保管室、票房和救生台等设施及灯光照明。跳水池两侧原有可容 500 人的看台，因扩大活动场地而拆除。后为游泳安全起见，跳水区单独设池，练习池则改为 50 米长的比赛池。

运动场

在市区小岛南端的沙洲尾，1953 年曾建有 400 米跑道的田径运动场，田径场的西侧还僻有一处大型足球场。1954 年的市运会和 1959 年的专区运动会曾在此处举行，后因兴建人民广场（今中山公园）此两处运动场而废除。1963 年另在东端滨江河畔另建运动场，新运动场占地 3 万平方米，投资 4 万元，场内有 6 条 400 米的煤渣跑道，场中央为大型足球场，四周有排水沟，正面有蓬顶的司令台。1986 年新增设两块水泥篮球场和两块老年人门球场。1995 年又增设两个网球场。

射击场

于 1963 年建成，与市游泳场相邻。场内有 50 米小口径

运动步枪靶位 20 个，靶位前后均建有砖土水泥结构的挡土墙以保证安全。1980 年扩建将靶壕加深加盖，挡土墙加高，靶位增至 26 个。1984 年又增设 25 米、10 米手枪、汽步枪靶场及裁判室等附属设备。射击场主要供体校射击班训练之用，并多次承办省、市级比赛。

体育馆

于 1976 年 2 月动工，当年 4 月竣工投入使用。该馆座落在园前东路，是在原灯光球场的基础上加盖顶而成（第一期工程）。该馆建筑面积为 4172 平方米，长 56 米，宽 43 米，净高 12.48 米，观众座位 4856 个。比赛场地地面铺木砖块，顶部为钢梁架结构，四周为玻璃钢窗，球架为钢化玻璃液压篮球架，还设有电子计时钟、分数显示牌。看台底部为办公室、休息室、卫生间及住房 30 间，二层有课室及学生宿舍。

1987 年进行第二期工程，完善出入口楼梯通道，外墙批档，灯光及地板更新，改建住房等项，该馆于当年 11 月 7 日举行落成剪彩仪式。

该馆第一期工程投资 100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45.9 万元；第二期工程投资 86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15 万元，其余均来自社会各界赞助。1992 年 9 月观众席全部安装塑胶靠背座椅，增加行走通道，座席减至 2934 个。建馆以来，先后承办全国性球类比赛 6 次，其中 1981 年办过中英羽毛球赛，1987 年办过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羽毛球决赛。

羽毛球馆

该馆作为体育馆的附属馆，与体育馆平行对称，于 1986 年 4 月动工，当年 9 月竣工。球馆占地面积 5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300 平方米，投资 120 万元。

该馆长 54 米、宽 36 米，地面净高 12 米，顶盖有 9 个跨

度，用钢架连接，铝合金材盖顶，四周有三排通栏玻璃钢窗，装有天花板。采用钨钠灯与高压钠灯相结合的新型照明。地面采用架空木地板，馆内有办公室、休息室和卫生间。可供12块羽毛球场或3个篮球场同时使用。为充分提高利用率，现作为羽毛球、乒乓球和体操训练比赛之用。该馆于1987年承办了全国六运会羽毛球决赛。

西河体育中心

该体育中心位于武江区的工业东路，于1984年动工，至1986年9月竣工。占地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2000平方米，投资600万元，其中市属及驻韶共436个单位赞助资金225万元。

体育场是体育中心的主体工程，看台呈马鞍型，可容观众25000人。体育场长210米，宽176米，田径场设有直道10条，弯道9条的400米煤渣跑道，足球场内铺有草皮，四周安有自动喷水设备。正面主席台长53米，有延伸出15米的钢架防雨篷。看台东西高（30级）南北低（15级），四周有20个出入口，10座天桥与场外连接。看台底层有办公室、会议室、休息室和餐厅。内有72间住房，可供320人住宿。体育场南端还有一块足球练习场（副场），在北门广场建有三个跨度呈抛物型的拱门，门外设有停车场。

体育场竣工后即交付使用，9月21日广东省第七届运动会田径比赛和省运会闭幕式在此举行。

随后在体育场的南端兴建了各项设施，1996年12月建成网球场3个；1998年8月开放游泳池（中级池、儿童池各1个）。为适应足球夜间比赛，1998年再投资298.5万元（其中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先生捐资200万元，省拨20万元）在足球场四角竖起四支灯柱，灯柱高度为43.5米，四条灯柱

共安装金属卤化物灯 256 支，耗电量为 384 千瓦（每柱安装 64 支灯，耗电量为 96 千瓦）。场内照明度为 1350 勒克斯。同年 10 月在南端新建的老年人门球场也对外开放。

西河体育中心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全市各界人民的协同支持下，经过十多年来的建设，各项体育设施逐步完善，融比赛、训练、会议、食宿于一体。该中心于 1991 年承办了全国女足赛和全国足球分区赛，接待省内外体育队伍来韶比赛训练，并曾成为广州松日足球队的主赛场。

（作者系市体委退休干部）

建国初期的重大斗争

——粤北地区剿匪概述

朱定桂

解放初期，地处华南战略后方的粤北山区，是全省最严重的匪患区之一。中共北江地委、北江军分区，遵照中央和华南分局、华南军区的指示和部署，集中全区党政军主要力量，密切配合驻粤北的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一四三师、一二三师和随后的四十一军一三〇师、一三二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广大军民在北江地委的领导下，经过三年多的浴血奋战，取得了彻底根除匪患的伟大胜利，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保障各项民主改革及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广东北部行政区域为北江地区，辖曲江、乳源、乐昌、仁化、南雄、始兴、翁源、新丰、佛冈、英德、清远、阳山、连县、连南、连山、从化、韶关市区等17县市，通称粤北，与江西、湖南、广西三省（区）毗邻，是

广东的北大门。珠江水系北江河及其支流流经全境。京广铁路贯穿南北，是华南沿海通向内地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境内大部分为南岭山脉的山地，山峦迭嶂，森林茂密，地势险要，溶岩洞穴遍及整个粤北，历来为土匪打劫、藏身之地。由于历代反动政府的容匪、纵匪政策，直至解放，全区匪患不断，成为粤北山区一大祸害。

一、解放大军挥师南进

194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确定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独立兵团，由叶剑英、陈赓统率，进军华南，解放广东。9月中下旬，为实施叶剑英主持召开和华南分局赣州会议制定的解放广东作战计划，我南下大军独立兵团分三路先后从江西全南、大余和崇义（绕道湘南汝城）进入粤北境内，在地方人民武装北一支队、北二支队的紧密配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迅速占领了粤北重镇韶关，解放了北江地区大部分县城。接着，我人民解放军继续挥师南进，追歼南逃之敌，并与桂路入粤部队协同作战，迅速解放了广州、佛山、湛江、肇庆、惠州、汕头、梅州等广东大部分沿海和内陆地区。至11月下旬，除海南岛外，广东内陆只剩下与湘桂相邻的粤北山区连阳“四属”即连县、连南、连山、阳山四县，仍被国民党残余部队盘踞，其兵力包括广东保安军和交警南逃残部。

二、国民党军残部和社会残渣余孽上山为匪

据查，盘踞于连阳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奉逃离大陆的蒋介石之命，其目的是要建立以小北江上游连阳山区一带作为南粤境内的西北防线，并妄图与尚未解放的湘南嘉和、临武、蓝山相邻县的交警总队和“湘南纵队”等国民党军残部相呼

应，在南岭山区连成一块纵横八百里的“反攻复兴”基地和游击区。与此同时，粤北地区已经获得解放的曲江、乐昌、仁化、乳源、南雄、始兴、翁源、新丰、英德、清远、佛冈、从化等12县，被打败了的地方反动头目纠集反动武装和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建立各种反共组织，上山为匪，到处流窜作乱，破坏我民主建政、征粮支前、减租反霸等工作。由于解放前国民党在粤北地区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因而刚解放一段时间内，土匪气焰十分嚣张，在我不断剿灭其一股股残匪的同时，其数量仍呈上升趋势。据资料显示，全区的土匪人数已由1949年12月上旬的38股、7850人增至1950年4月164股、10596人，而且迹象显示仍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三、土匪类型及其罪恶活动

粤北地区的土匪，就其性质和组织成份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在解放中被我军击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保安团队和县乡武装的散兵组合的政治土匪；二是封建恶霸、大地主、地方实力派及失意政客所组成的维护地主利益的封建土匪；三是社会上的一些流氓地痞、无业游民和因生活无着被迫为寇的贫民专事抢劫掳掠谋生的职业土匪（又称经济土匪）；四是与国内外反动组织有密切联系、欺骗和煽动群众从事秘密反动活动的封建会道门（如“忠义堂”、“三点会”、“互助会”等）中的反动分子。这四种土匪都极端仇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他们中，不仅政治土匪是国民党有组织有预谋地布置潜伏的反动武装，封建土匪、职业土匪、封建会道门中的反动分子，也都拥有枪支武器，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反动武装。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倾轧。为了挽救蒋家王朝的失败，在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特务机构的封官加爵及收买利诱下，封建土匪、职业土匪和会

道门中的反动分子均沦为政治土匪，成为带有政治性的反革命武装。

从粤北土匪的地域分布及其政治势力、活动特点看，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为国民党正规军残部，盘踞于尚未解放的北江地区西北一隅的连阳“四属”连县、阳山、连南、连山等地。这类土匪有两大股，共4000多人。

一股是由国民党中将军长李楚瀛所指挥的《反共救国军第九军》。其组成由原有的广东保安团扩编。军部设7个处，下辖3个师、9个团，兵力3000多人。李楚瀛在蒋家王朝面临覆灭的时候，还幻想国民党反动军队卷土重来，认为他在连阳地区统率的反共力量会一天天壮大起来，从而顽固地在连阳地区强化其反动统治，加强“勘乱动员会”组织，设立特务机关，派出大批人员刺探我军和地下党的活动情报，强令其反动军队围剿我人民武装，并大搞“清乡”，制造白色恐怖。

另一股是国民党上校副队长申学忠率领的“交警第二总队第十八团”残部。敌交通警察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局直接领导的特务军队，配备精良。自我军南征以来，从东北、华东战场先后败退到湘粤边境的国民党交警部队有4个总队1万多人，分驻在湘南宜章、临武、蓝山、江华和粤北连县等地，其中进入连县的有1200余人。由申学忠指挥的“交警第二总队第十八团”残部约500人，是原东北中长铁路交警王牌部队。他们在东北战场遭到我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打击后，沿粤汉铁路溃退下来，与妄图在连县建立反共基地的反动头子李楚瀛相勾结，寻找逃生的出路。

第二类股匪是国民党县乡“自卫队”残余和维护封建阶

级利益的地主武装，主要分布在已经解放的曲江、乐昌、仁化、南雄、始兴、乳源、英德、清远、佛冈、从化、翁源、新丰等12县山区。在稍后解放的连阳“四属”山区也仍存在反动武装残余。这批国民党残渣余孽，解放后坚持以人民为敌，拖枪上山为匪，并收买、引诱本地经济贯匪和会道门中的反动分子扩充势力，成为社会祸患。这类股匪约2万人，其中势力较大，活动较猖獗的有以下一些：

1. “粤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四军”。军长林显（原国民党仁化县长），副军长何康民（原国民党粤赣湘边区剿共少将参谋和原始兴、汝城县长）。军以下设3个师、9个团，组织系统跨三省10县，网罗的匪众有五、六千人之多，并拥有大批轻重武器和弹药。以粤湘边境龙虎洞为据点，并在粤湘和粤赣边境建立5个指挥所，与三省边境几个县的股匪互相勾结，拧成一体，其统编组织和流窜骚乱范围已由最初的乐昌、仁化、汝城、崇义4县扩展到邻近的曲江、乳源、南雄、始兴、桂东、资兴等10个县。活动于粤境乐昌、仁化、乳源、曲江4县的董超云、黎元勋、刘桂馨、黎洪、康作云、张文照、薛秀基、谭钧亮、朱炳寰、饶长梓、余湘华等是“粤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四军”师团级匪骨干。

2. “粤桂边区反共人民救国军总队”。总司令朱光振（原国民党军统局粤站从化保卫所所长）、副司令毛易雄（原国民党军统局粤站从化电台台长）。从化解放后，匪首朱光振与毛易雄逃入深山，于从化及相邻佛冈、花县、龙门等县以欺骗手段招聚喽罗2200余人，拥有长短枪1300余支，分设10个支队，活动于从（化）佛（冈）花（县）龙（门）四县边境山区，昼潜夜出，扰乱社会治安。尤以其所属的殷燕、谢枉股匪最为猖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弄得从化及边缘县鸡吠

不宁。

3. “北江民众反共救国黑军”。由原国民党南雄县长黄余东和国民党区乡骨干邱常贵、邬锡金、侯甫仁、张传一、赵棣华、张南洋等一批匪头目率领的大小25股土匪组成，共有匪卒1200余人，拥有各种枪支900多支，于南雄县南山、北山、油山和界址、坪田等地山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其中黄余东网罗的200余名土匪同时隶属于林显、何康民的匪组织系统，其番号为“粤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四军第六支队”。

4. “中国青年人民服务团”（又名“阳山青年党”）。谢谢（原名谢汉修）为匪团长，吴斌、谢仁青、马路、李崇高为匪副团长。团以下设3个营9个连，网罗国民党残渣余孽及受骗群众约1000人。这股土匪连以上骨干者是原国民党的军政职员，与逃离大陆的国民党陆军参谋次长、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和国民党香港特务机关有直接联系。其装备拥有电台及六〇炮、轻重机枪、冲锋枪一批和步枪近1000支。他们以阳山县大崑鹿暗、红图顶一带大山为据点，等待时机，妄图里应外合，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推翻我人民政权。

5. “粤桂边民众反共救国军二十一支队”。这是连阳地区解放不久，原国民党连县保警大队头目廖耀庭受香港匪特机关指派，在连县搜罗流氓兵痞、地主分子和各种社会渣滓拼凑起来的土匪组织。廖耀庭任支队长，欧真隆（逃港）任副支队长，惯匪头目黄荣宽任支队政委兼政治主任。匪支队下设3个大队、5个中队，号称拥有500余匪众，有电台和轻重机枪10余支，其他长短枪400余支，流窜于连阳“四属”连县、连南、连山、阳山边界山区进行骚扰、破坏活动，梦想卷土重来，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重新夺回其失去的“天堂”。

6. “广东反共第五纵队第二支队”。原国民党英德县联防大队反动头目杨策雄任支队司令，反动分子杨玉珂、黄友庭任支队副司令。搜罗国民党残渣余孽、地主分子和受骗群众共 1800 余人，分设 20 个大队（其中第 14、15、16 大队未成立），流窜于英东和英（德）曲（江）翁（源）三县边界地区及粤汉铁路沿线一带为非作歹。这股顽匪还与英德其他地区梁猛熊、梁三槐、刘琅林、康开、李富、邓德明、邓龙飞、陆忠良、范庚等股匪相呼应，在英德县内制造了几十起攻打我区乡人民政府的暴动事件。

此外，建国初期在清（远）从（化）佛（冈）花（县）等地流窜作案的谭砥纯、李再芳股匪；集结于清（远）英（德）阳（山）交叉地带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陈大春、包仁、包南股匪；串连于英（德）翁（源）新（丰）佛（冈）边界地区专事打劫山民的卢家豪、湿水米、潘伯恭、潘毅、陈仿如、王朝昌等股匪；活动于曲江樟市、罗坑和周田、黄坑等地制造多宗血案的傅桂标、李志超股匪；纠集于始兴清化山区发动暴乱事件的华秉越和华秉琦股匪，等等，都是与当时国民党台港匪特机关有密切联系的一批穷凶极恶的匪帮。这批股匪每股 300 至 800 人不等，他们各踞一地，四处流窜，无恶不作，危害极大。

（二）

粤北地区的剿匪是从发动连阳战役开始的。1949 年入冬以后，遵照华南分局、华南军区的指示，我野战部队协同地方部队，向固守于广东北部一隅的连阳地区国民党交警残部、李楚瀛为首的“反共救国军第九军”及地方反动武装发起了

总进攻，取得了粤北地区剿匪连阳战役的胜利。

1949年12月上旬，为迅速消灭盘踞于连阳地区的国民党数千残敌，我解放军南下主力部队在完成了追歼广东境内南逃残敌并解放了省内大部分内陆地区后，即按照华南军事指挥机关的战略意图，调兵遣将，进军连阳。首先由参战部队制定进军连阳的作战计划，成立了由北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周明、一四三师参谋长王中军、政治部主任吕琳组成的解放连阳前线指挥小组，集中一四三师四二八、四二九两个团，北江军分区第十二团、暂编第三团以及连江支队所属武装力量，以优势兵力采取分进合击、大胆迂迴、截断逃路的战术。接着，根据作战部署，我军朝预定目标从北路、中路、南路三个方向迅速出击。

一、奔袭梁家水，全歼敌交通警察残部

梁家水激战，就是我野战军和地方军组成的北路部队进军途中，在粤北连县与败逃的国民党军统组织的王牌军交通警察第二总队第十八团残部，进行的一场围歼战。

12月5日，从北面进击连阳的野战军四二八团和游击队连江支队七团在湘南宜章县黄沙堡会合后，经周家岱到天光山，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四二八团团团长李洪元和连江支队七团团团长肖怀义率领主力经洛阳从东面奔袭东陂；另一路由连江支队七团一营长黄振率领的连支七团两个连配合四二八团副团长徐彦凯率领的该团二营，准备绕道黄洞山从北面插至东陂，直捣连县“杀人魔王”关以忠的老巢。当这一路部队从天光山经桐木冲到达黄洞山时，获悉前面的梁家水村驻有敌交通警察四、五百人，于是决定先歼灭这股敌人，为继续前进扫清道路。

战斗于12月6日中午打响。据侦察，敌交警占据了梁家

水村东、西、北三面的炮楼，已形成交叉的火力网；在村南小山和村后山岗的密林中，设有敌前哨阵地，控制全村；村内的大祠堂，则是敌总部所在地。正确分析了敌情后，部队分三路进击；一路由四二八团副连长赵廷贵和连江支队黄雄带领野战军四连及游击队一个排，从岩塘背南下，迂回到龙形洞，切断敌人西逃之路。另一路由四二八团连长熊志清率领野战军五连前进到仙人岭脚从东面包围梁家水。还有一路由四二八团副团长徐彦凯指挥，连江支队七团一营营长黄振协助，率野战军六连和连江支队七团两个排，从北面坑头水沿公路分两路纵列直扑梁家水，展开正面进攻。围歼战从6日中午12时过后前锋小部队与敌接触，至晚上10时以后大部队三路包围、突击、运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前后与敌激战了约24小时。7日上午，围歼敌交警的战斗结束。清查战果，毙伤敌160余人，俘敌上校副队长申学忠以下320余人，缴获卡宾枪46支，轻重机枪35挺，炮3门，长短枪400余支，电台两部，弹药一批。野战军副连长赵廷贵等22人英勇牺牲。梁家水围歼敌交警的胜利，为我军解放连阳和在粤北山区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揭开了序幕。

二、解放连州、三江城，“反共救国军第九军”在追击中覆灭

我军进击连阳前夕，李楚瀛召开军事会议，拟订“应变”计划，既定以连南瑶山为总根据地，把连阳四属划为5个游击区，“反共救国军第九军”军部设在连州城，情况紧急时迁往连南三江，在瑶山设指挥所。他们首先加紧执行连州“城湘防守计划”，在城内建栅门六、七十个，强征木材杉杉木1500多条、民粮1000余石、民工约600名，限令10日内完成。同时，又紧急部署将连州物资运往三江，准备在连州

城作战不利时，纵火焚烧民房工厂，嫁祸于解放军，趁乱撤往三江，然后上连南油岭、南岗一带大瑶山，实施预定的游击计划。

李楚瀛的城防紧急工程，尚未完工，我北路部队在梁家水战斗结束后即会合于东陂，经西岸、石角、直扑李楚瀛老巢三江。在进军途中歼灭驻新岩村敌兵一个连，截获从连州开往三江的军车两辆。7日傍晚部队包围了三江城。在这之前，李楚瀛家中的亲信卫士10余人闻到风声，仓促抓来民夫10余人挑行李，护着李的母亲、妻、妾、儿子逃往瑶山，守敌一个营全部缩进城内，紧闭城门，妄图凭借古城墙固守待援。8日拂晓，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军向三江城发起总攻，敌兵惊慌失措，四散逃奔，有的窜入居民家里躲避，有的钻进街头巷尾的牛栏猪舍和厕所内隐藏，枪支弹药随处乱丢。我军迅速攻进三江城，敌营长莫家铨被击毙，乡长邱仍洲受伤被俘。

中路部队于7日凌晨发起对连州城东面30里的星子圩守敌的攻击，敌团长黄坤山面临大军压境，自知无力抵抗，便下令南逃。我部队跟踪追击，晚上追至连州城外圍，准备在8日凌晨发起总攻，但敌人已经逃跑，我军不费一枪一弹便解放了连州城。进城后，获悉李楚瀛已率领其军部和专署人员并指挥两个团的兵力朝连南方向上了瑶山，一路经三江，一路经九陂向瑶山追击。麦永坚率领的北江军分区十二团二营，在油岭、南岗一带追上了敌军部人员。这时的敌军如惊弓之鸟，战斗一打响，敌军便四散逃窜，我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并俘获李楚瀛的妻、儿等亲属和士兵200多人。经审讯俘虏，均不知道李楚瀛下落，部队继续进行搜索。

李楚瀛的人马是东拼西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他们在蒋家

王朝末日来临的时候归附李楚瀛，各人都心怀鬼胎，同床异梦。在我军进剿连阳之前，“反共救国军第九军”少将副军长严庄，便携带购买武器的巨款下落不明；军部从连州撤退时有7名上校副处长，不几天就有5名各自逃跑藏匿起来，只有2名外省籍的处长无法脱身跟随李楚瀛；其手下“四大天王”之一的二十五师第三团上校团长黄墨苍率3个连撤出连州城，辗转3天，还没有同我军交火，就只剩下一个连的人马了，李楚瀛在瑶山难以落脚，他的乌合之众未战先散。12月13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集中所有残余部队近千人自阳山进发。行军途中，脱逃回家的几名三江籍士兵，在水竹塘附近向我四二九团追剿部队报告了情况，并自愿作向导，带领部队经沙冲方向追击。李楚瀛发现我军追击，仓皇指挥应战。但枪声一响，士兵都不听他的命令，为了求生都趁机逃脱，就连二十五师少将师长张燮元等一批文武官员也各自逃命去了，满山遍野都是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至此，李楚瀛的主力已被我军消灭了大部，其余也被我军打散。李楚瀛见势已去，便撇开残余人员，剩混乱之机，带着心腹卫士和亲信，逃回瑶山。我军追踪在瑶山进行严密搜查。12月16日，得知李楚瀛一伙躲藏在南岗矮凳凹地方的一个山洞，我部队立即实施包围，逼其投降，李楚瀛及其参谋长于继祖等40多人被擒获。顽固不化的李楚瀛最后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三、南北两路分兵奋进，连山、阳山县城获解放

三江解放后，为堵截李楚瀛残部西逃，四二八团团团长李洪元率领该团三营为主力，彭厚望率领连支七团一个连配合，急进连山。8日下午，部队抵达连山县太保外围，“反共救国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副师长兼连山县长虞泽广闻风潜逃，我军开进太保旧城，虞泽广余部无条件投降。10日，我军在群

众的欢呼声和鞭炮声中开进了国民党连山县府驻地永和镇，收缴了敌保安队 200 多人的枪支，宣告了连山县的解放。11 日，李洪元率北路部队从连山县城经加田、上洞到寨岗，参加追剿逃窜到南岗、油岭一带的李楚瀛残部。

与此同时，南路部队野战军四二九团和北江军分区新编三团、连支五团的两个连，在军分区参谋长黄云波指挥下，在英德西部瓦解了“反共救国军第九军”两个团的兵员。慑于形势，敌六十一团团团长张隆率 300 余人向我军缴械投降，敌六十三团团团长张观带也只身前往浚洗向我驻军投降。接着，部队分两路进军，一路由四二九团团团长苏陶率领进剿黄花，聚歼盘踞在那里的梁猛熊部（毙伤俘敌 720 余人，匪首梁猛熊化装逃脱），然后挥师阳山；另一路由新编三团团团长兼政委王式培率领，解放英德大湾后，经七拱到青莲与一路部队会合。14 日，解放阳山县城。“反共救国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兼阳山县长李谨彪率部逃出阳山县城。南路部队解放阳山县城后，按计划继续向大崑、黎埠进击，与中路、北路部队会师。

在解放连阳的战役中，我军消灭了盘踞在连阳的国民党交警部队和反共救国军主力，共计毙敌 102 人，俘敌“反共救国军第九军”中将军长李楚瀛，少将参谋长于继祖以下官兵 1540 人，接受敌投降 671 人，总共歼敌 2300 余人（不包括逃散人数），缴获轻重机枪及其他长短枪共计 1504 支，炮 13 门，各种枪弹 134000 余发，其他军用物资一批。解放军部队牺牲 28 人。李楚瀛的“反共救国军第九军”的覆灭，使连阳地区获得了解放。

(三)

连阳战役以后,为了把剿匪斗争扩展到整个粤北地区,根据华南分局和华南军区的指示,结合粤北的匪情,我军对剿匪兵力作了重新部署,除留下四十八军一四三师外,还增派四十一军一二三师参与粤北剿匪,加上北江军分区3个团和16个县大队的配合,已形成清剿土匪的强大军事打击力量。从1949年12月下旬至1950年9月底止,经过野战军和地方部队9个多月的大力追剿,曾经猖獗一时的一股股残匪土崩瓦解。

一、挥师北江东北部六县,扫灭山匪六千八

按照剿匪部署,连阳战役后留驻粤北的野战军一四三师奉调粤北地区东北部协同北江军分区十一团及各县大队,对盘踞于乐昌、仁化、曲江、乳源、南雄、始兴6县之土匪实施围歼。在这之前,率伪保安二营逃入深山为匪的原国民党韶关专署专员龚楚和乐昌县县长薛纯武,为形势所迫,于1949年11月带着其原班人马300余人携武器下山向我军投降。我军挥师东北部6县后,重点是进剿“粤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四军”。匪军长林显、副军长兼十师师长何康民、参谋长兼十一师师长董超云、十二师师长黎元勋以及团长、支队长级以上的匪骨干黎洪、康作云、张文照、薛秀基、谭钧亮、朱炳寰、饶长梓、傅桂标、刘桂馨、黄余乐、黄焕章等数十人,是我军清剿的主要对象。

我部队进入驻剿地以后,“粤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四军”即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匪首林显、何康民的“反共救国军”成立后,即把其军部第一个指挥点设于粤湘边境龙虎洞。

这里山高林密，是一处两山相夹的山区小镇，也是乐昌县五山通往湘南汝城的一条主要通道，军事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以逃。我部队经过一番侦察，得悉有近百名“重兵”把守，便决定先拔除龙虎洞敌指挥据点。1950年1月2日晚，我北江军分区十一团一个加强连，奉命从数十里外的驻地红山出征奔袭龙虎洞，并于翌日凌晨3时过后与敌交火迅速歼灭了龙虎洞外围街背山、老虎腊和白泥塘山上的敌人。接着，我部队又迅速穿插到山下用机枪火力堵截主要路口，匪副军长何康民见势不妙率残部趁黑冲出封锁圈，朝乐昌五山方向逃窜。龙虎洞之战捣毁了敌指挥部，毙伤匪20余人，俘匪3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

随后，我军又在粤湘赣边粤境一侧的五山、九峰、红山、城口、长江、扶溪、百顺、澜河等地展开追剿。在我军的追击下，何康民及其残部在五山一带已无驻足之处，只好到处流窜。2月上旬，匪军长林显率领的“反共救国军第四军”军部人员40余人，也在仁化县境红山属地观音坐莲山被我军包围3昼夜，匪被围山上死不投降，最后我部队发动攻势，火力朝敌阵地猛烈扫射，毙匪2人，俘匪30人，缴获轻机枪1挺，冲锋枪2支，其他长短枪19支，电台一部。匪军长林显及其亲信、卫士乘隙逃脱。我在粤湘赣边境采取军事攻势，从1月上旬至3月底止3个月内出击230余次，歼敌600余人。但土匪时分时合，仍继续与我周旋，气焰十分嚣张，仅3月份粤湘赣边区一带山区，就有10余处刚建立起来的区乡人民政权遭到匪首林显、何康民指挥的1000余名匪徒的武装围攻。

为根除匪害，4至6月，我野战军一四三师四二九团和北江军分区十一团在湘南郴州军分区独立七团、赣南地方部队

等友军的密切配合下，在粤湘赣边纵横三百里山区展开追剿，共出击 320 余次，毙俘敌 630 余人。我军还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号召匪众弃暗投明，悔过自新，于是向我军缴械投降者达 380 余人。至此，流窜于粤湘赣边境的何康民“反共救国军”第十师已消灭十之八九。匪军长林显已逃往香港，匪副军长何康民、匪独立团团团长黎洪和匪支队长刘瑞熊、黄苟仔和其他匪骨干或隐蔽或继续流窜。

同时，我在曲江、乳源、南雄、始兴四县的驻剿部队在县大队和民兵的配合下，也发动了猛烈的军事、政治攻势。在曲江、乳源二县内，曲江的枫湾、大塘、沙溪、樟市、罗坑和乳源的一六、瑶区等山区都是林显、何康民的“反共救国军第四军”所属十二师的主要活动区。为遏制和消灭匪害，我野战军和军分区部队及县大队全面出击，在实行以军事打击为主的同时，结合政治攻势，进入匪主要活动区重点清剿。从 1949 年 12 月下旬至 1950 年 9 月末的 9 个多月中，我驻剿部队反复搜剿，在对匪进行数百次的围歼和追击中，毙匪、俘匪共 1200 余人，还有 800 余名匪卒慑于我军的威力主动缴械投降、自新。进剿中“反共救国军第四军”一批师团级匪首，如董超云（匪军参谋兼第十一师师长）刘桂馨（匪第十二师副师长）、何德全（匪第二团团团长）、余湘华（匪第三十六团团团长）等被擒获。

在南雄、始兴二县内，我军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以政治攻势。从元月开始，驻南雄县的北江军分区部队与县大队密切配合，频频出击，对土匪的主要活动区南山、北山、油山和界址一带山区进行大扫荡。至 6 月底止，上半年击毙、俘虏和下山投降自新匪众共 1060 人。除匪首黄余东、邱常贵、

张传一、侯甫仁、赵棣华和少数顽匪漏网外，全县土匪已基本肃清。在始兴县东南部边缘地区，从1950年1月至8月，驻剿部队协同县大队清剿流窜于粤赣边的清化、都亨一带山区残匪，追踪数月，与匪激战多次，基本上消灭了以华秉越和华秉琦兄弟为匪头目的“粤北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第三支队”和以涂观东为匪首的“北江青年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大队”两股狡诈而凶恶的土匪，共歼敌300余人，还打散了从江西省潜入始兴境内的赣南吴爱洲股匪。

我军在1950年9月底以前的9个多月内，进入粤北东北部山区剿匪取得重要战果。打着“反共救国军”旗号的各类土匪组织均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有的被全部消灭，有的大部被歼。据不完全统计，仅乐昌、仁化、曲江、乳源、南雄、始兴等6县，击毙、俘虏和投降、自新土匪共6800余人。其中林显、何康民的“反共救国军第四军”遭我军严厉打击后已土崩瓦解，其被歼的匪众达4300余人，包括一批匪骨干，计有师级2人，团级7人，营级14人，排级67人。还缴获了各类匪组织一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

二、进剿清、英、阳边界地带股匪，连战皆捷

奉命参与粤北剿匪的野战军一二三师，于1950年4月下旬进入清（远）英（德）阳（山）地区，实施下一步清剿。在这之前，我北江军分区十二团全部（后编并入九团）及十一团一部配合野战军四二八团7个连在英阳地区协同会剿，初战告捷。2月2日，部队开始进剿盘跨于黄花、九龙一带的梁猛熊股匪，战斗于5日打响，梁猛熊300余匪徒在我追击中溃散，后经四昼夜搜剿俘匪骨干林开进以下220余人。3月初，阳山县匪首谢谢、梁光、刘裕林、莫金妹收拢溃散匪军200余人先后攻占我七拱、东山、水口等区、乡人民政府。3

月下旬原在英清边清剿的北江军分区十二团获悉后，即决定转移兵力，首先以一营为主攻出击东山经梁湾大路迂迴包围，二营向水口一带进剿，三营向杜步一带进剿，构成对匪的封锁堵击线。4月1日拂晓，攻击开始，我主攻营包围了梁湾上下围村，并采取围困打援，土匪与我逐屋争夺，我猛烈的炮火和机枪火力把敌压缩在一座炮楼和几间小房内。土匪见突围无望始全部投降，经26小时激烈战斗，毙匪首梁光以下12人，俘138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100余支。我军牺牲一人。东山梁湾歼灭战的胜利，令敌丧胆，占据七拱、水口乡政府的匪徒，未战先逃。3个多月我军在英阳地区共歼匪900余人。

一二三师抵达清（远）英（德）阳（山）地区后，随即成立师指挥所，在清、英、阳3县县大队和广大民兵的配合下，对盘踞于3县范围的股匪采取扫荡式的清剿。一二三师首先以两个营的兵力由清远至阳山边境形成封锁线后，即向东压缩，在空心地区进行反复搜剿。在我军追击下，流窜于清远境内的“反共救国军”走投无路，5月中旬匪团长陈大春等被迫率700余人交枪投降。随后，李楚瀛的“反共救国军第九军”在瑶山覆灭后，由李谨标（国民党阳山县长、反共救国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组织的“青年党”匪帮所谓“中国青年人民服务团”也遭我驻剿部队的穷追猛打，匪团长谢谢、匪政治主任邱思贤以及匪大队长谢芬等股匪慑于我军的威力，先后向我军缴械投降。一二三师从4月至9月底在对清英阳3县边界地区的进剿中，共歼匪3608人，其中毙匪188人，俘匪550人，降匪2870人。而在毙俘降匪中，有匪团长和正副支队长4人，匪营长和副大队长以下匪骨干110余人。经过半年清剿，清英阳地区的大股土匪被打垮，匪害

基本得到根除。

三、两团兵力分赴连阳和英、翁、新、佛四县边境区，股匪土崩瓦解

根据上级指示，为正确实施剿匪斗争中的指挥作战，1950年春北江军分区成立了剿匪作战指挥所。按照当时剿匪部署及与驻粤北野战部队的分工，北江军分区剿匪作战指挥所主要担任包剿连阳地区和英（德）翁（源）新（丰）佛（冈）4县边界地区两个重点地区的股匪。分区原辖九、十、十一、十二4个团，1950年3月整编撤销十二团建制，兵员并入九团。后辖3个团中，除十一团继续配合一四三师包剿乐昌、仁化、曲江、乳源、南雄、始兴6县股匪外，九团、十团均由北江军分区作战指挥所指挥包剿。其中九团负责包剿连阳地区廖耀庭、欧泽龙、黄孟虎、黄懋传、梁启学等股匪，十团负责包剿英德、翁源、新丰、佛冈4县边界地区和上下碓地区的股匪。此前，十团大部（一、二营和团直）奉命于清远、从化、佛冈、花县等县执行追剿谭砥纯、李再芳股匪的任务。经50多天的军事、政治攻势，歼敌348人，其中击毙18人，俘虏70人，投降、自首260人。至5月上旬，十团将清、从、佛、花地区的剿匪任务移交给一二三师三六八团一个营负责。

1950年5月中旬，十团二营因奉命调动担任城市警卫任务，参与前线剿匪主要是一、三两个营。一营任务是包剿英、翁、新、佛4县边界地区卢家豪、湿水米、潘伯恭、潘毅、陈仿如、王朝昌等股匪，而三营任务是包剿横石塘李富股匪和上下碓地区邓德明、邓龙飞、陆忠良等股匪。

兵力部署以后，十团一营迅速进入英、翁、新、佛4县边界区组织清剿。1950年6月，一营四连在英、翁、新边的扫管洞一带，采取夜间以班排为作战单位，在一些单家独户

和小村庄设下埋伏。一天晚上卢家豪股匪“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粤北第一支队”参谋长周瑞波率10余人进村抢粮食，果然中我伏击，当场击毙匪3人，活捉周瑞波以下8人。一营一连也协同四连追剿卢家豪股匪。7月4日，获悉卢家豪一伙在英翁边地区由英德县一侧的青塘向翁源县内的马鞍山一带流窜，一连当即派出二排长张利率一个排和一个便衣组，马不停蹄，追寻匪首卢家豪的下落。经一天的追踪，最后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于7月5日上午在马鞍山附近的江屋和莫屋实施包围，活捉匪首卢家豪以下15人。许多散匪眼看大小头目被擒，大势已去，300余匪兵先后向我军投降、自首，至此卢匪全部覆灭。另外，进入匪患严重的新丰西区沙田清剿的一营二连也取得欣喜的战绩。5、6月间，二连一、三两个排在当地工作组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在深山中围捕追击，歼敌160余人，匪支队司令湿水米和其他匪头目潘帝惠、潘伯恭、潘毅、罗力子、潘步须、潘实英、潘名仔先后被我抓获，匪首潘捷如、潘德、潘顶仰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缴械投降。二连二排在翁城郊区也歼灭了王朝昌土匪中队长以下60余人。三连担任围歼谭头地区的股匪，则通过办班提高匪属的思想觉悟，动员匪属上山寻找误当土匪的亲人下山自首，招降、瓦解土匪120余人。三营在英德上下砍驻剿邓德明股匪和在横石塘一带追歼李富股匪也取得很大成绩，共歼匪230余人，但主要匪首邓德明、李富等尚未抓获归案。

在连阳地区驻剿的北江军分区十二团（后改为九团），剿匪的重点是指向连阳四属危害最大的廖耀庭股匪。十二团根据廖耀庭股匪的活动线索，首先对土匪活动的主要地区连县北岭、石角、蒲石湾、船潭、铁坑墩、杨梅冲等地组织追歼。从4月到8月的5个月内，十二团协同县大队和县公安中队，

在地方党委和广大民兵及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支持下，共出击 250 余次，毙伤匪 30 余人，俘匪 40 余人，其余被打散。几个月来，廖耀庭股匪到处被动挨打，大伤锐气。我部队还通过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清剿宽严政策，迫使逃命的散匪纷纷向我自新。同年 9 月，匪支队属下的三个大队、5 个中队，仅剩第一、第二两个中队，不久，第二中队被我驻剿部队歼灭，生俘中队长伍水兰。廖耀庭股匪受到严重打击后，所谓“粤桂边民众”号称 500 余人的反共支队，剩下不足 100 人。自此以后，这股残余分子改变活动方式，化集中为分散，将剩余人员编成若干小组，一部分流窜于黄牛岭、茶田、大东山、朝天桥、麻步水、保安等地山区，一部分逃往九陂和阳山交界地区的深山密林中。

1950 年 4 月至 9 月，我驻粤北的剿匪部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对盘踞粤北山区的残匪实施全面反击，取得重大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毙、俘、投降、自首之敌在内，共歼敌 17176 人，并破获匪特地下组织 40 宗、成员 2457 人。据查，重要匪首林显、谭砥纯、梁猛熊已先后潜逃香港。但廖耀庭、何康民、黎洪、傅桂标、杨策雄、李富、邓德明、邓龙飞、陆忠良等匪首尚未落网，剿匪任务仍十分艰巨。

10 月至 12 月，一四三师、一二三师奉命调离粤北执行新的任务。四十一军一三〇师、一三二师则奉命进入粤北参与剿匪，但不久也调离粤北。此后，粤北地区的剿匪任务全部由北江军分区部队担负，力量削弱，加上军分区部队集中了一段时间进行整编，因而剿匪进展受到影响，在三个月追剿中，仅歼匪 262 人。

(四)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上年最后二三个月粤北地区剿匪成绩不大，对此中央很关注。1951年1月16日，毛泽东电示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等，指出：“北江匪情严重，除去年12月份向罗坑出动一次外，其余无行动，对这种不积极态度，给予严厉批评，并督促限期清剿匪患……”

为贯彻毛泽东给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等的电示精神，迅速根除粤北匪患，北江军分区即以当月召开了一次各团领导干部参加的剿匪战地会议，提出1951年剿匪仍为全区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当时全区仍有匪59股，637人，分布于乐昌、曲江、乳源、英德、清远、仁化、南雄、连县等边沿山区潜伏活动，并发展其地下组织，妄图和我长期对抗。根据匪情，北江军分区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并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实行先剿有形股匪，后清隐蔽散匪，重点地区建立党政军“包剿匪委员会”，同时对剿匪兵力也作了部署，北江军分区在编的三个团，均重新落实任务。九团以三分之二的兵力（一、二营）继续在连阳地区包剿廖耀庭、黄荣宽、熊智恩、黄荣发、唐林标等股匪；三分之一兵力（三营）接替野战部队大坑口至英德的护路任务。十团三分之一兵力（一营）包剿曲江境内的傅桂标、高毅、张神有、黄友庭、范庚、黄昌等股匪；三分之一兵力（三营）包剿英德下砍地区邓德明、邓龙飞、陆忠良及横石塘地区的李富等股匪，余下三分之一兵力（二营和团直）进驻韶关市区接替城市警备任务。十一团全部兵力（一、二、三营）包剿乐昌、仁化、南雄之股匪何康民、黎洪、刘瑞熊、刘明古、黄苟仔、

黄余东、邱常贵、张传一等股匪。各主力部队在包剿地区还与县大队密切配合，协调作战行动。没有主力部队去的县，则由县大队根据匪情，组织民兵和发动群众进行搜捕散匪。新的剿匪部署作出以后，彻底根除匪患的清剿行动很快在全区范围内形成。

一、再接再厉，“粤桂边民众反共救国军”被彻底根除

1950年10月中旬，连阳地区危害极大的股匪“粤桂边民众反共救国军二十一支队”，在连县被我驻剿部队消灭其大部力量以后，匪头目廖耀庭率30余名匪徒从连县麻步水、保安等地流窜到阳山县小江、大崯一带山区与当地范辉股匪相勾结，为非作歹，蹂躏乡民。10月24日，当廖、范股匪窜入大崯乡下岩村骚扰时，当晚即遭我驻乡部队北江军分区九团两个连的围歼，毙伤匪7人，俘匪50余人。匪首廖耀庭、范辉也被生擒。几天以后，廖匪趁隙逃跑。此后狡诈的廖耀庭身边经常只带数人无定点地流窜。为迅速歼灭廖耀庭股匪，我驻剿部队北江军分区九团作了周密部署，总体清剿方案：一是指导思想把匪支队长廖耀庭作为清剿的重点。二是组织包剿委员会，由参与包剿的作战参谋负责军事指挥，保卫股长负责内线部署，侦察参谋负责情侦工作，廖匪活动地的区乡长负责发动群众及组织民兵配合。三是动员全部可以利用之兵力，作四层兵力部署，第一层兵力作内线秘密侦察，夜间设伏，第二层公开搜山，第三、四层守路口、桥梁、山坳和交通要道，进行外线封锁。

1951年元旦过后，我驻剿部队官兵在阳山县黎埠及连县附城、九陂和连南三江、寨岗的广大山区地带冒着冬天的严寒昼夜出击。1月6日，匪首廖耀庭及其骨干刘时芬、胡易等从瑶山潜回连县九陂一带，被我民兵发现，立即遭到围剿，胡

匪被当场击毙，廖耀庭、刘时芬等在密林中夺路逃脱。这时候，廖耀庭一伙残匪已是四面楚歌，无路可走，加上天气寒冷，匪徒已经断绝接济，饥饿难忍。1月9日，匪中队长刘时芬被迫下山向驻剿部队自新。但匪首廖耀庭顽固到底，仍四处流窜。14日凌晨三时，我驻剿部队接到匪首廖耀庭在黎埠至九陂一带深山活动的报告，当即用电话通知廖匪活动地区周围的区政府，待天亮后动员1000余民兵和群众搜山、堵路，并实施包围。当天中午12时过后，在连县九陂爱民乡，廖匪化妆农民模样突然从山里窜出，被正在路口巡查的民兵擒获。与我周旋长达一年之久的匪支队长廖耀庭终于落入罗网。

廖匪被擒以后，匪支队政委兼政治主任黄荣宽、匪大队长熊智恩、匪副大队长黄荣发等一伙残敌，也在连县黄牛岭、茶田、大东山、朝天桥、麻步水、保安等地被我驻剿部队跟踪追击，受到沉重打击后锐气大减。1951年1月下旬，我部队获悉黄荣宽、熊智恩等股匪已逃入大雾山、北岭、虎片塘和金龟观一带山区骚扰乡民。为彻底剪除廖匪余孽，我驻剿部队立即调动两个连的兵力入山追剿，并在县大队、县公安中队的密切配合下，打破常规，春节期间冒着风雪严寒，不分白天黑夜连续搜查了数十座高山大岭，元宵节后第九天（3月1日）下午在麻步水之间的大雾山北面的黄茅深处发现了敌人。部队立即组织战斗，由强攻至围困与敌交火10余小时，终因这伙匪徒熟悉地形于下半夜乘黑沿山中暗沟突围潜逃。部队发现股匪潜逃后，即根据其逃跑方向，发动附近区、乡民兵配合分头追击设伏，直至3月5日晚，发现匪首熊智恩、黄荣发及其余孽逃窜到阳山县朝天桥背基岭燕子岩隐藏，被我追剿部队和当地民兵一举歼灭。计毙敌1人，俘匪大队长熊智恩、副大队长黄荣发以下6人，缴获长短枪6支、子

弹 280 发。3 月 10 日，匪支队政委兼政治主任黄荣宽以下 5 人，也在麻步水被我军擒获。至此，流窜于连阳地区的所谓“粤桂边民众反共救国军二十一支队”已全部覆灭。

二、重兵清剿，曲江、英德境内土匪被全部肃清

1951 年 1 月开始，承担清剿曲江、英德两县股匪的北江军分区十团一营和三营接到新的任务后，各连队在驻地农村立即开展广泛深入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恢复农会、民兵组织，管制地主，控制匪属外出，以封锁他们与匪通风报信，断其粮食接济。

2 月上旬，十团一营在曲江县罗坑地区追剿傅桂标股匪。一天早上，三连一个排于师木坑山头包围搜山，在当地 600 余民兵、群众的支持配合下，与 40 多名匪徒交火，匪参谋长张神有被当场击毙，众匪见势不妙，逃进深山，几天之后陆续回来自首。接着，一天晚上我十团二连在胜笏岭伏击由傅桂标老婆、匪政治部主任潘亚云率领的 20 余名残匪，当场毙匪徒 2 人，活捉潘亚云和匪骨干吴庭顺等人，其余残匪向密林处逃窜，不久也陆续回来自首。几天以后，我驻峡洞四连一个排突击附近一个山洞的藏匪，俘匪副司令高毅以下 11 人。一营三战三捷，给傅桂标股匪以沉重打击。我部队还抓住时机，向匪属宣传我党我军剿匪的宽严政策，消除匪属的思想顾虑，于是出现了父母上山寻子，妻子劝丈夫下山的场面，使傅桂标近 200 名匪徒众叛亲离，纷纷携带武器下山自首，最后只剩下傅桂标等 15 名顽匪骨干四处逃窜。

为了尽快消灭傅桂标一伙匪骨干，十团一营奉命组成了一支飞行队共 70 余人，由营长邱振英率领，跟踪追击傅桂标一伙匪骨干。时值初春，严冬尚未完全退走的粤北山区阴雨连绵，寒风袭人，飞行队活动于深山老林里寻找傅匪踪迹，生

活十分艰苦。追击中发现傅桂标持金属杖棍尖走路，路上留下深深的痕迹。跟踪部队紧紧沿这一线索追击。经过一段时间追踪，最后追至龙归乡。傅桂标一伙匪徒逃入石背庙一个岩洞内躲藏起来。我军将其围困数日后，终于生擒傅桂标及其继子傅宏全和匪骨干15人，傅匪遂彻底消灭。

在追歼傅匪的同时，奉命接替南下大军在沙溪剿匪任务的十团一营一连也在春季追剿中频传捷报。1951年元旦过后，随着剿匪斗争的深入，一连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攻势，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在做好自新人员思想教育的同时，对匪属的行动加强了监视。在军事上，采取普遍搜山、重点搜山与路口设伏的方法，有效地遏制了通匪、济匪和土匪下山活动。截至4月下旬，我军在沙溪3个多月的追剿中，30余名顽匪被俘，匪首黄友庭、范庚、黄昌也被活捉，匪“第二支队”支队长袁超、副支队长曾溪成、匪霸张善士被击毙，这样，曲江境内除个别隐蔽、潜逃外，其余股匪被全部肃清。

在英德县望埠、沙口、横石塘和上下砭地区，土匪活动十分猖獗。经1949年冬和1950年我野战部队和北江军分区部队的大力进剿，这些地区的股匪大部分已被歼灭，只剩下李富、杨策雄、李泽周、邓德明、邓龙飞、陆忠良等少数顽固不化匪首匪骨干。1951年1至3月，以横石塘大南山一带流窜地的李富股匪，在我进剿部队十团三营八连、十连的强大军事打击下，遭灭顶之灾，3个月内我军击毙李富等匪首以下6名，抓获土匪和通匪、窝匪分子150余名，投诚自新的土匪10余名，缴获长短枪约500支，子弹3000余发，手榴弹60余枚，取得了全歼李富股匪的胜利。横石塘大南山一带剿匪结束后，十团三营八、十两个连随即转战与清（远）佛（冈）2县相邻的上下砭地区与原在那里的侦察连一起清剿残

匪。截至7月中旬，经过数月的寻踪、围堵、追击，终将邓德明、邓龙飞、陆忠良三大股土匪残余分子30余人全部歼灭。同年5月，十团一营完成曲江境内剿匪任务后，奉调英德沙口地区清剿杨策雄股匪。在土改工作队密切配合下，组织民兵，发动群众，实施搜山围剿，先后活捉匪参谋长黄炳新、大队长李泽周、中队长邱相、赖强等人，最后只剩下杨策雄“光棍司令”隐蔽于龙头山，在一个晚上被我追击战士击毙在山上。

三、粤湘赣边三省军民合围，千里追歼何康民

在仁化县内，特别是在仁化东北部的粤湘赣边境区，经过1950年春夏我剿匪部队驻剿大扫荡后，“粤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四军”第十师残匪，大部被歼，只剩下匪副军长何康民及其随从亲信，以及他的两名匪支队长刘瑞熊、黄苟仔和大队长曹胜、黄世远、中队长刘明古等一批匪骨干率领的5股土匪210余人时分时合，仍在三省边境区流窜。

为彻底扫除仁化县内匪害，我驻剿部队继续以粤湘赣边境作为重点清剿区。1950年7、8月间的一天午后，我剿匪部队在仁（化）汝（城）边境东岭进剿，发现何康民及其随从亲信与刘瑞熊股匪合伙在山上活动，我驻剿部队迅速追击，匪徒见势不妙立即作鸟兽散，何匪窜进大山，消失在茫茫林海中。为追寻匪踪，我追剿部队在粤湘赣边境区，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翻越了无数的高山大岭，长达半年时间，行程数千里，均不见何匪的踪影。原来匪首何康民“隐居深山”。1951年1月（农历十二月）“大寒”过后，粤湘边境山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雪。为侦察残匪的行踪，我驻剿部队派出两名侦察兵打扮成农民模样，携带猎枪，冒着严寒，上山打猎。几天以后，在一个地名叫平水垅的密林处，终于发现何康民及

其随从亲信的隐蔽目标——草棚。何康民一伙害怕“猎人”通风报信遭我搜捕，于2月1日转移到几十里外刘瑞熊股匪据点湘赣地名为八丘田的小村庄过春节。

我剿匪部队获悉何匪的行踪以后，2月13日，北江军分区十一团会同湘南郴州军分区独立七团和赣南地方部队于仁化县长江召开三省联剿会议，协调合剿何康民的作战行动。会后，三省追剿部队各组织一支飞行捕捉队交叉穿越粤湘赣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搜索追击1200余里。几天以后，得到消息说何匪已逃到粤湘赣三省边境区东岭李子坪的大山隐蔽。为防止何康民远逃，三省剿匪部队又动员民兵、群众紧密配合，搜山、堵路、放哨，连续一个多星期出动群众达4000余人，把整个粤湘赣三省交界地区都轰动起来。2月23日，北江军分区十一团一部于仁化县大麻溪捕获何匪情报员胡永先，经审问得知匪首何康民又转到平水垅密林处隐蔽。次日，驻仁化剿匪部队一部即与友军湘南郴州军分区独立七团一部400余人协同在平水垅至东岭李子坪一带展开清剿。在我两支部队连续数日的追击下，何匪东藏西躲，靠野草、树叶进食，已感到极度饥饿。27日午后，何康民饥肠辘辘被迫下山觅食，来到粤湘边境的蓝田水村向村民要饭吃，村里民兵发现后立即持大刀、长矛上前捕捉，何匪见状向村外奔跑，民兵多人追至一个山庙前将其生擒。就这样，被我军民追剿达一年零四个月之久的国民党少将军官、“粤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四军”副军长何康民最终被捕获归案。

四、跟踪追剿，粤湘、粤赣边土匪余孽一一被剪尽

在追歼匪首何康民的同时，我驻仁化剿匪部队展开了对“粤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四军”余孽刘瑞熊、黄苟仔、曹胜、黄世远、刘明古等股匪的追剿。这批股匪共210余人，在我

猛烈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先后土崩瓦解。1951年3月上旬，我剿匪部队发现刘明古股匪在仁化长江以北的一带山区流窜骚扰，我军随即派部队在腊树下、长横里、锡皮坑、苦竹坝等一带山区，组织搜山围歼。经过20多天的反复搜剿，把刘明古率领的30余名残匪打得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他这个光棍司令在四面楚歌中苟延残喘。在搜山中，群众发现匪中队长刘明古和他的小老婆，躺在一个山沟草地上呜呼哀哉了。估计是我部队追击被打伤流血过多，且日夜奔波躲藏，饥饿所致。至同年4月上旬止，在我军半年多的追剿中，刘瑞熊、黄苟仔、曹胜、黄世远等股匪，被击毙30人，活捉50余人，向驻剿部队和当地乡人民政府自新80余人。余下匪支队长刘瑞熊、黄苟仔和匪大队长曹胜、黄世远及另外5名匪骨干，在仁化县粤湘边境的城口北面赤坑、南木坑等地的岩洞和旧炭窑内隐蔽，被我北江军分区十一团二营四连一个班在城口与两江口一带搜索时全部生擒。

在乐昌、乳源一带，1950年驻剿部队四二九团经过大半年的追剿，大股土匪已基本肃清。四二九团调离粤北后，北江军分区十一团一部接替乐昌境内和乳乐边缘地区的剿匪任务。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9月一年多的追剿中，歼敌150余人，“粤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朱炳寰被活捉，伍云山、刘祖志、吕日正、黎耒林等一批股匪头目也在追击中被俘。10余名小股残余土匪由“粤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团长黎洪率领在瑶山、大桥、沙坪等地荒山野岭中游荡，也不断遭到我军的追击，3名匪徒被击毙，7名匪徒被俘。经历了几个月的被追捕的亡命生活，黎洪越来越感到乐昌、乳源不可久留，于是他决定向湘南逃窜。10月中旬，黎洪来到湘南没有找到大股土匪，只好带着两三名匪

徒在永兴、郴县及资兴一带流窜作案。10月下旬，黎洪等人流窜到了资兴，28日在黄竹坪作案时，当即被我担任剿匪的野战部队后勤生产组发现，我指战员立即包围上去，两名匪徒束手就擒，黎洪开枪顽抗，被我指战员当场击毙。1952年6月，活动于乳北瑶山一带的惯匪头目黄明珠和他的卫士黄明生，也在清剿中被营坑乡的瑶族民兵和群众计设“鸿门宴”击毙。

地处五岭山区的南雄县，随着广大农村清匪反霸的深入开展，大股土匪被消灭以后，侥幸逃脱的匪首匪骨干无论其怎样东躲西藏，最终逃脱不了被歼灭的命运。1951年1、2月，“粤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四军第六支队”支队长黄余东、“反共救国黑军”头目邱常贵分别在北山和南山被我北江军分区第十一团一部与广大民兵合力围追堵截中击毙。同年3月，逃到江西省南康县一个村庄隐蔽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反共救国军乌沙队”队长赵棣华，被我派赴江西南康的武装民兵擒获。同年4月，为躲避我部队追剿，潜逃江西省大余县丫山寺改名为柴明当了和尚的另一名“反共救国黑军”头目张传一被我县公安中队逮捕归案。该县的其他股匪头目赵颂标、沈本万、张浩通、谭顺天、谭和源、张传新等10余名，也都在这段时间先后被我驻剿部队和民兵追剿被俘或被击毙。

在始兴县，1951年3月，流窜于清化、都亨一带山区作案的池月生、李卓华股匪30余人被我追剿部队全部歼灭。匪大队长池月生以下6人被击毙，另一匪头目李卓华以下26人被俘。清化地区的主要土匪头目华秉琦，在我追剿中逃港被台湾蒋介石特务机关任命为“自由中国运动粤赣边区司令部”的指挥官和司令。1952年4月13日晚，华秉琦奉命与副指挥官谭天和电报员何锡、卜浪等一起携冲锋枪4支、航空

曲（手枪）4支、电台两部、金砖和人民币及其他物资一批乘美制蒋机预定在清化山区空投继续他的土匪活动，不料，蒋机飞行员将华秉琦一伙误投在翁源县坝仔乡的笋洞一带山岗上。我驻乡土改工作队发现后，当地民兵和县公安干警紧急出动实施搜山、围堵。15日，经过3天搜剿，华秉琦、何锡，被我公安干警和民兵抓获，谭天、卜浪被击毙。

粤北地区的剿匪斗争于1952年结束。粤北军民经过3年多的奋力清剿，总共歼匪23062名，其中毙伤匪1218名，俘匪8913名，慑于我军的威力被迫下山向我部队和当地政府缴械投诚自新的匪众10662名。在剿匪斗争中，各类匪组织被歼的连级（中队长）以上匪首826名。同时破获匪特地下组织60宗，成员3089人。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北江地区的军民在清剿匪患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

（作者系中共韶关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曲江的土地改革运动

甘 峰

建国初，中共曲江县委、县政府领导曲江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前线、清匪反霸、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各项工作。实践证明，建国后的土改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

1949年10月曲江解放后，党政军民经过半年多的共同努力，支前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全中国的斗争。1950年4月至7月，全县剿匪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除少数残匪外，股匪基本肃清，社会秩序得到初步稳定。1950年底，全县已彻底废除保甲制，建立有6个区1个镇62个乡的农村基层政权，实行大区小乡制。同时，各级还建立了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培养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经济恢复刚刚开始。所有这些，为曲江开展土改准备了条件。

一、曲江土改的工作准备

曲江是广东省第二批、北江地区第一批土改试点县之一。1950年12月1日，曲江县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

革法》发布了布告，宣布全县实行土地改革。为加强对曲江土改的领导，华南分局任命张根生为曲江县委第一书记。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抓紧了土改的准备工作。

1. 调整县委和各区委领导班子。1950年12月25日，经过调整，新的县、区班子组成。县委第一书记张根生，第二书记黄桐华，县委常委吴伯仲、薛经伦、冉济川、向步成；指委：罗启林、李祥麟、张韶、殷连城、潘达、曾东、肖怀义、郑彦文、许文明；一区区委：第一书记李祥麟，第二书记许文明，副书记何英，委员袁德峰、莫世延、官怀民、甘锦轩、陈志奋；二区区委：书记张韶，副书记何耀桓，委员饶克奎、李拔才、冯太平、杨宜华、钟文光、谭章麟；三区区委：书记郑彦文，副书记叶国林，委员叶放青、毛鸿筹、潘文华、叶沛安；四区区委：第一书记薛经伦，第二书记张普，委员于更新、陈向前、邓奇勋、周才平、何龙；五区区委：第一书记罗启林，第二书记石进明，委员潘达、包华、马成功、钟英，范家祥、梁呈祥、成来凤；六区区委：书记张战，委员邹泽民、范兰胜、李仕权。

2. 成立县、区、乡三级土地改革委员会，拟定全县工作计划。县政府土改委员会组成人员：主任黄桐华，委员李祥麟、向步成、郑彦文、许文明、曾东。区土改委员会主要由区委、区农协、区政府、工作队等单位组成，以区委书记为主任，吸收乡土改委员会的主任为委员，乡土改委员会主要由乡农协、乡政府、工作队等单位组成，并以贫雇农为骨干。县土改计划拟定全县以第一区（马坝）为重点，12月开始试点工作，争取12月底全面铺开，在铺开时每个区选择1至2个乡为重点，贯彻由点到面相结合，实行波浪式发展的方针。

3. 集中训练干部，整顿队伍。为搞好北江区土改试点县（曲江、英德）工作，由北江地委组织集中训练干部，准备到曲江参加土改的第一批集中有130人（其中地委、专署及各县派来的干部70人，本县60人），训练后参加马坝试点。第二批430人（其中各县调来130人，本县区乡村干部120人，农干180人），12月25日结束。县委还召开了15天有农干160多人参加的土改训练班，用5天时间召开区以上干部扩大会议。训练内容主要是阶级教育、土改总路线和基本政策、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同时，着重查了干部的立场、思想，认真审查了干部出身成份，并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方针，决定对一般地主出身的干部则在土改期间调离原区乡工作。

4. 大力展开宣传。12月初，县召开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进行总动员。会上，县长黄桐华作了关于《为胜利完成曲江土改而奋斗》的报告；作出了动员全县力量坚决而胜利地完成全县土地改革的决议，还发出《全县人民动员起来，为胜利完成全县土改而奋斗》的告各界人民书。同时，县委、县政府指示各区乡，结合秋征、冬耕，广泛宣传土改，酝酿群众分田要求。12月底，《曲江土改通讯》创刊，加强了土改工作的宣传和指导。

二、曲江土改的经过及其胜利成果

曲江土改经过是：1950年12月10日首先在一区马坝3个重点乡，月底在全县14个重点乡开展，1951年1月初全面铺开，至4月10日基本结束，历时4个月。大体经过了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划分阶级；征收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及胜利果实4个阶段，分5个步骤进行。

1. 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反破坏，整编群众队伍。1950年12月底，1100多土改工作队员（其中包括中南局派来的约100人，南方大学600人，本县300人，地委专署及各县调来的110人）组成7个工作队分赴6个区和韶关镇郊区开展土改运动。针对匪霸势力严重，匪根没有挖掉（全县股匪还有90人，6个区中以六区樟市匪患较为严重）、1949年农民已交地主的租粮及押金均未退减、1950年减租也是“和平”进行的等具体情况，各土改工作队，首先从反霸减租入手，发动群众，控拆土匪罪行，动员广大群众搜山挖匪根，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利用自新土匪、匪属动员土匪自新、投降。转入退租退押时，采取由贫雇农团、贫雇农小组为领导，吸收劳动中农来统一进行，斗争形式开始由全乡斗争逐步转为分村分组斗争。据统计，在土改中，全县清除土匪519人，收缴枪支600余支，对敌斗争4700多次，斗争了地主273个，并通过人民法庭公审大会判处一批匪首、恶霸死刑。从而扫除了土改的阻力，以保障土改有秩序的进行，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2. 划分阶级。曲江土改划分阶级的一般做法是“讲解、评划、通过、批准与宣布”四步及自报公议三榜定案。1951年2月初，曲江个别土改重点乡已进入划阶级，同时由重点乡抽调干部到附点乡结合划阶级。至2月底，18个乡已划清阶级，20多个乡进入划阶级，20多个乡正在第一阶段。县委、县政府土改委在总结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为指导全面，强调指出要解除群众对划阶级的误解和思想顾虑，将政策交给群众掌握；评阶级时要以村（不是以乡）为单位进行，先评地主、次评富农，后评中贫农；在通过批准阶级时，要正确执行划阶级的标准与合法手续。在此阶段中，全县划出主要阶级成

份有：地主 1175 户，7771 人，分别占全县总户数的 2.93% 和总人口的 4.51%（下同）；富农 1528 户，10117 人，分别占 3.81% 和 5.87%；中农 12868 户，64361 人，分别占 32.15% 和 37.38%；贫农 17807 户，71576 人，分别占 44.49% 和 41.56%；雇农 3858 户，9130 人，分别占 9.6% 和 5.3%。

3. 没收征收土地等。没收征收土地等是关系到能否满足贫雇农要求与消灭地主阶级的关键。初期，许多乡和部分土改队员认识不足，普遍产生麻痹、自满和纠正吊打后的束手束脚思想，而不少地主采用“藏、逃、诱、拖”来拼死抵抗，斗争极为尖锐。因此，县委连续三次发文，强调纠正自满轻敌与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县土改委还规定对大中地主严，对小地主则放宽一些，并防止侵犯工商业和富农的自耕田。斗争内容主要是查地主解放后破坏分散的田地、房屋、耕牛、农具、粮食，令其赔偿。没收征收的方法，一是令地主依法自报，二是由农协依法审查、清算。经过反复斗争，全县没收征收土地 204954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51%，没收多余房屋 12649 间，农具 33455 件，耕牛 6693 头，多余粮食 8477846 斤，家具衣物 59466 件。

4. 分配果实。分配果实是土改中一个最细致而又带有更广泛深入的群众性运动的环节。在此阶段中，各区认真贯彻县委、县政府强调的三条原则：①首先满足贫雇农要求，其次适当照顾中农；②为了发展生产；③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具体方法，在加强“天下农民是一家”互让教育，克服平均主义思想的同时，主要采取发动群众自报公议与评委会审议相结合，尽量做到“填坑补缺、缺啥补啥、缺多多补、缺少少补、不缺不补”。在分配果实中，雇农人均分到土地 2.52 亩，

贫农人均 2.3 亩，中农人均 2.54 亩，并基本上解决了农具、耕牛、种子及渡荒口粮的困难。此外，地主和富农分田后也人均分得土地 1.79 亩和 2.66 亩。

5. 巩固胜利、整顿队伍与布置生产。在分完果实后，各土改乡普遍召开庆功大会，烧毁田契与控制地主，还通过农代会、小组会又普遍开展了一次“三查”（即查队伍、查翻身、查敌人）。因此，全县群众组织得到发展与巩固，农协会员达 66526 人，占总人口 38.6%，青年团员由 271 人增至 872 人，民兵由 1538 人增至 6903 人。从运动中培养的 3067 个积极分子成为新的乡村干部，初步奠定了乡村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与此同时，布置群众转入春耕生产，带领群众兴修水利。由于曲江发生水灾，韶关专署、县政府及时拨下一批救灾物、款，解决了群众恢复生产的困难。1951 年 4 月初，县召开三级干部和土改工作队员大会，县委书记张根生作了全县土改运动总结报告。4 月 10 日，全县土改基本结束。

至此，在全县 19 万农业人口中的 62 个乡中，除一区的凡洞、长坪，三区的竹溪，五区的黄沙、沙坪，六区的罗坑 6 个乡 1 万多人口尚未完成或未进行外，其余 56 个乡已完成了土改试点工作，占全县土改乡的 90% 强，超额完成了北江地委下达的要完成 80% 的任务。随即，每区除留下部分工作队员外，其余工作队员全上调北江地委，统一分配到北江地区其他县开展土改运动。

三、土改复查

曲江又是土改复查试点县。1951 年 12 月，县委遵照华南分局指示，为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在全县开展

土改复查工作，经过扎根串连、查霸反霸；查阶级、征收没收；分配解决遗留；民主建政等几个阶段，至1952年底结束，历时一年多。

1951年12月，县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县委副书记向步成作了土改复查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复查是土改的第三阶段”，是曲江土改的“一个重要的补课”。同时还传达了张根生同志（1951年6月已调地委）的复查工作指示和五区的下园、内藤两个村复查试点总结，部署了土改复查工作。随即，组织379人的工作队下乡，复查工作全面展开。

土改复查的任务是：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残余，解决土改遗留问题，颁发土地证，转入大生产。

在此前后，曲江具体制有较大变动，1951年5月已从五区中分设七区，6月，曲江县、韶关市分设。1952年3月，曲江、乳源两县合并，管辖区域增加八区（侯公渡）、九区（卢村坪），计有142个乡（其中曲江109个乡）。县委书记陈奋，副书记向步成、丁兆臣，代县长许文明。

在土改复查中，曲江重点完成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消灭封建残余。曲江土改后，封建残余没有消灭，仍有部分地区的敌特组织反动会道门，制造谣言和反攻破坏。如七区地主黄明珠公开持械杀害我干部群众8名，五区地主欧某殴打贫雇农和民兵，梅塘地主四次放火烧屋，三区古洋一个新扎根子被地主收买，杀害我土改复查工作队干部陈羽。针对这种情况，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于1952年4月，组织力量对全县的反动会道分子开展全面调查，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在巩固农会组织和民兵的基础上，发动群众检举和揭发敌人的反攻倒算，破获了反动会道门9个，成员151

人。6月，曲乳县召开第四届各界代表会议后，土改复查运动进展很快，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经济上取得了一批胜利成果。在此期间，全县共召开公审宣判大会26次，判处以匪霸、反动会道门头子为主的死刑罪犯118名。在复查中，全县重新划定地主成份2436户，占农村总户数的6.5%，富农1722户，占农村总户数的5%。对消灭封建残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和颁发土地证。土改后，曲江农民基本满足了对土地要求，获得了生产资料，解放了生产力，但地权没有确定，因而农民还有顾虑，这是土改遗留问题。在土改复查期间，县委结合复查进行了查田定产工作。为核准全县耕地面积，县组织了1958人，编成265个丈量小组，对全县耕地逐段、逐坵进行丈量，至1952年9月，丈量工作基本结束。根据复查工作的进展情况，重点乡已开始查田定产和结合民主建政，附点乡也完成复查的必要步骤后转入这项工作。到年底全县大部分乡村均已由县、区、乡查定发证委员会组织人力，根据田亩、阳光、水利、耕作习惯进行定产、依率计征工作，按户统计归册，公布于众，并颁发了土地证书。由于土地权属发生了根本变化，80%的土地由过去少数地主占有变为劳动人民拥有，公粮负担经过查田定产，贯彻合理负担的原则确定下来，有效地激发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热情，国家税收工作也有了保证。

三是引导群众，转入大生产。土改复查期间，县委县政府为贯彻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向全党全国提出的“为争取国家对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总口号和总任务，在消灭封建残余、解决土地遗留问题的同时，着力引导翻身农民大力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改善耕作条件，提高抗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1952年6月，为大规模发展互助合作，县共发放贷款32.7万元，为10147户农民解决了生产资料的困难。至土改复查时统计，全县开荒5000亩，建成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3宗，修建山塘200口，水陂259个，水圳221宗，其中马坝中陂修复工程投资30多万元竣工，可灌田1.17万亩。因此，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培养和树立了一批劳模，在1952年12月土改复查结束时，曲江乳源县召开的第一届农业生产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评出头等模范李才、黄观华，二等模范梁五妹等14名，三等模范29名，一般模范46名，并分别发了奖品。接着在粤北区第一届农业劳模代表大会上，太和乡（现樟市群星）李才互助组被评为模范互助组，李才被评为一等劳动模范，以及二、三等劳模33人。此后，李才常年互助组被树为“粤北区互助组的旗帜”，成为曲江乃至北江农民土改后组织起来，解决困难，改进技术，增加生产的好榜样。至此，曲江乳源县（1953年5月分家）土改复查工作（除乳源部分地区）全面结束。

从1950年冬至1952年底，曲江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实践证明，曲江的土改能较好地贯彻有领导、有步骤、分期分批进行的指导思想；贯彻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总政策；贯彻了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组成了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这是应该肯定的。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艰苦奋斗等党的优良传统在土改干部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尽管在土改中存在着如划分阶级成份（主要是地主、富农、中农）的比例略有偏高现象以及在土改工作队员和机关进行整队或清理，挫伤过一些同志等不足或错误，但它同全国土地革命的胜利一样，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

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灭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曲江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

建国初期的始兴教育事业

陈遐莹

新中国成立后，始兴县人民政府为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建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交叉衔接期间，始兴教育事业经过接管、调整和恢复发展阶段，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接管与恢复

始兴县于1949年9月解放，在巩固政权的同时接管学校，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县城由县政府接管中小学，区政府接管区乡小学，同时允许乡村民办小学的存在；第二阶段，由县文教科接管统管全县中小学。

第一阶段的时间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9月，县城解放，设立县人民政府文教科，主持始兴县文化教育卫生工作。副科长李大中，之后科长为钟履全。10月，县人民政府派出工作组接管始兴中学和县城小学。接管后的始兴中学，校长、副校长分别由县长邓文礼、县府秘书陈遐瓚兼任，同时委派原游击队干部刘绍棠、陈方畴、邓济舟、钟履全、曾碧棠、张隆盛、廖健、曾宪湖、陈耀星等到始兴中学任教，由教导主

任刘绍棠主持日常工作。训导主任为邓济舟。陈遐瓚、田章兼任政治课，采取全校师生上大课辅导《论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当时设高、初中部，高中二个班，初中八个班。

县城当时有四间小学。接管后始中附小改为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官惠民，教导主任陈方畴；太平镇中心小学、私立广义小学等并为一间，更名为太平镇第一中心小学，校长饶振西。容后两间小学并为一间命名为联合小学，校长李士文。

在农村，区乡政府接管当地中心小学。其经费除收取学田谷外，不敷由区、乡补助，容后逐步由区、乡财税供给。部分区政府配备文教助理。村小学由公堂或学田经费供给。解放初期大军南下，各乡征收支前公粮，所有收租的公堂都分摊任务，不少村小学停办。当时全县的小学，据县《教育志》记载，1949年小学58间，学生3823人，为解放前的1946年全县小学154间，学生7110人的一半左右。

1950年实行减租减息，乡、村学校公田可收租，一些学校复办。全县小学有所发展，由58间增加至85间。

始兴县革命老区，为怀念牺牲的先辈，是年9月，县政府决定将司前中心小学命名为《赧靖小学》，太平镇第三中心小学（新村）改名为《衍屏小学》，外营小学改名为《八一小学》。

为加快始兴教育的发展，1950年11月25日，召开全县教师代表会议，到会代表50人。二区文教助理参加了会议。会议贯彻省文教厅提出“如何巩固人民的基础教育”的指示，有步骤地改革学校教育，实行面向工农的教育方针，使众多的工农子弟得到入学。通过会议，明确中央对教育的重视，消除教师的思想顾虑，对“民办官助”的基本精神有了认识，到会代表表示回去要加快教育的发展，复办部分学校。次年，学

校规模扩大，学校发展至 105 间，入学人数 6136 人。

接管学校的第二阶段为 1952 年下半年。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开展，进入分田分地工作，由于学校的公田分配给农民，一些学校将有被关闭的危险。针对这一问题，1952 年 5 月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整顿地方财政、统筹乡村小学经费以发展乡村文教事业的规定》，规定乡村小学经费由县统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根据这一指示，全县民办公助和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由县文教科统管，县财政拨款。学校行政任免、调动（含教师调动）及教育管理、教学计划、教学设施和经费使用等主要工作，实行由县统一管理。上级要求对现有学校进行调整整顿，贯彻定班、定额、定教、定薪、定费制度。规定 40 人为一班，不足 25 人的年级组织复式班，不足 25 人的学校应撤销并入其他学校。教职员工配备县城小学一比一点四，中心小学一比一点二，乡村小学一比一。小学教师工资 19.7—23 元/月、中学教师 48—54 元/月。

全县由县接管小学于 1952 年下半年施行。此时我从土改队调回文教科任职。当时全县小学 110 间，计划拟撤不足 25 名学生的学校有 5 间，新发展 2 间。新增是瑶民小学和边远小学。调整中拟撤并的罗围小学，该乡一位女乡长向温茂春县长请求保留，情因群众办学热情高，结果同意继续办学。当时全校仅有 25 名学生的罗围小学，至今已发展为 7 班 100 名学生 8 名教师的完全小学。调整后全县小学 107 间，教职工 234 人。

调整后农村建立中心小学制。每区设立一至三所中心小学即设初小高小的完全小学。乡村小学改为村校。中心小学和村小以地方为校名。中心小学受文教科委托发放乡村小学教师工资和学校办公费等，管理村校的行政、教学任务。县

文教科每学期召开二至三次校长会议，贯彻上级教育方针，布置新学年工作。

县政府接管乡村小学，全县民办、民办公助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教师正式为国家人民教师，生活待遇有保障。他们焕发革命热情，服从工作调动。当时新办沈所左拔、深渡水、隘子等瑶民小学，被分配任教的老师先后有李子才、邓良福、谢章仁、邓文乾等教师，他们愉快接受任务，任劳任怨，一干数年，为山区、为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作贡献是难能可贵的。

如诗似画的辉煌

始兴解放初期，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教师和学生踊跃参加征粮、参军、参干，为始兴政权建设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49年9月下旬始兴解放，紧接着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广东及华南诸战役，面临需要大批粮草。1949年11月和1950年6月，先后两次在始兴中学抽调师生90多人，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工作队进行秋征和夏征，历时4个月，胜利完成公粮征收任务。

始兴解放，城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尽情欢呼新制度的诞生，庆祝自己的翻身解放。始兴中学和县城小学生热情地投入这历史变革中，写宣传标语，布置庆祝会场，学习和演出秧歌舞，上街游行。同时还排演大型话剧《雷雨》，扩大了新文艺的影响。年底成立“始兴中学文工团”，演出大型现代歌剧《白毛女》，以崭新的形式反映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现实，唤醒人民觉悟，有力地配合当时拥护新政权的宣传活动。

解放之后，农民翻身作主，渴望掌握文化知识。从1950年冬开始，全县农村普遍设立妇女识字班，识字班的教师由学校教师兼任，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下到农村识字班任教。全县业余识字班173班，学员5564人；黑板报104处。妇女识字班主要学政治、学文化，提高她们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为土地改革奠定基础。

1950年夏天，爆发了朝鲜战争。始兴中学师生响应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有赖茂昌等学生一批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翌年1月，先后三批有黄凤群、林来发等50多名师生志愿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1951年始兴全面铺开土地改革，全县中小学师生学习土改法。为使教师得到锻炼提高，又有一批师生投入土地改革运动。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全县中小学校教师积极投入运动，参与宣传和资料工作。县城联小和中心小学组织小型宣传队下乡文艺宣传；同时参加当地政治活动，白天上课晚上参加斗争会，经受考验和锻炼。此外，由联小、始兴中学等学校教师排练多幕话剧《思想问题》，为参加县城集训的土改工作队演出，促进干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2年进入分田分地，教师积极参与丈量土地填发山林土地证。当年暑假响应县政府号召，全县150名教师，背着被包步行到司前支援清化区填写山林土地证工作，五天时间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区政府表彰。

建国初期，新制度刚刚建立，需要大批干部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工作。作为始兴最高学府的始兴中学，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支前秋征留在区乡工

作有卢道椿等 30 多人；参加县委宣传队师生有陈方畴、曹祖和、魏学文、赖书耀等 36 人；投笔从戎参军和军干校有莫世光、何衍凯、李阴棠等 50 多人；投身土地改革师生有张隆盛等 30 多人；分配至小学任教师有邓学忠等 18 人；分配到县直属机关有张发均、刘远廷等 10 多人；直接到省市报考大学、中专、政治干校有汤昌辉、罗维忠等 100 多人。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

在历史变革中，由于大批学生投笔从戎，参军参干，在校学生人数大为减少。1950 年秋，始兴中学停办高中，高一、高二学生分别并入南雄中学、北江中学。1951 年学年的始兴中学仅有初中一、二、三年级各一班和 24 人的简师班，学生不足 180 人，是建国后始兴中学学生最少的一年。另一变化是生源的变化，贫下中农子弟入学人数增加了。1952 年始兴中学秋季招生，考生成绩偏低，主持工作的教导主任李士文向文教科汇报录取新生工作。研究结果，为贯彻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学校设立人民助学金，采取优先录取工农子弟入学。这一年报考始兴中学的录取率为 98%，绝大部分考生破格录取了，完成当年招生计划。在办学过程中努力贯彻向工农开门办学方针，学生中的工农子弟大为上升。到 1953 年统计，全县小学生工农子弟上升到 80% 以上，中学生工农子弟达 71% 以上，高于全省水平。

艰难的磨练

解放初期，县城中小学部分教师由于种种原因外出广州、韶关、乐昌等地任教，造成始兴师源不足。县人民政府一方

面委派共产党员、原游击队干部前往学校任教，另一方面做好留任教师团结教育工作。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教育事业，对教师是尊重的。1950年5月开始兴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教育界老前辈饶振澜应邀出席了会议。当年9月县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始兴中学和县城小学有4名教师和1名学生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是如何发展始兴教育事业。县领导在会议期间接见师生代表，鼓励新老教师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奉献力量。县长邓文礼百忙中抽空到始兴中学检查工作，鼓励教师安心教学。在百业待兴、经济困难情况下，拨款给学校购置新书桌。县领导经常到学校上政治课，讲解国内外形势，号召学生为革命而学，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1950年冬，全县中小学教师们在始兴中学举办“始兴教师研究班”，由县领导作动员报告，宣传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进行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号召教师清除封建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积极投身人民教育事业。当年11月25日，召开全县教师代表会议，会议时间五天，讨论当前教育建设方针。通过会议，清除了教师的思想顾虑，对“民办公助”的基本精神有了认识，作出了今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决议。自那两次会议后，始兴教育有了稳步发展。

然而，随着政治运动的开展，学校经受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特别是始兴土地改革很长一段时间受极左路线的干扰，致使始兴教育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使剥削阶级出身的教师蒙受冲击。

1950年土地改革进行试点，寒假全县教师在谭家祠集中举办土地改革学习班。曾宪湖、刘绍棠主持学习班。学习土

改政策和抗美援朝国际形势，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觉悟和阶级斗争观念，号召教师积极投入土地改革运动，站稳阶级立场，凡剥削阶级出身的教师，应与家庭划清界线，动员父母把剥削农民得来的金银财宝赔偿给农民。学习班又是一次队伍整顿会议。会上宣布对混入教师队伍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钟某、张某由政法部门收容审查。

土地改革刚刚开始，机关干部、学校教师普遍开展学习《土改法》、《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谁养活谁》，使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教师认识到农民养活地主，应该与家庭划清界线，脱胎换骨改变自己，加倍努力为人民服务，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纷纷写信或回乡向农民表态，承认过去的错误，拥护支持土改。

随着土改“八字运动”的开展，农村开展清算地主恶霸罪行，追缴果实。此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空前高涨，牵连很大一部分剥削阶级出身的教师，不少被拉回农村表态“斗争”。大体有三种情况：第一，剥削阶级出身的教师，本人在农村曾有剥削行为民愤大或有民愤的，被拉回农村清算。第二，父母系恶霸地主土改中被人民政府处决（其中有一部分属错杀，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其在教师队伍任职的子女在父母处决后拉回农村。第三，父母在土地改革运动因不正常死亡后农民为追回斗争果实，其任教师的子女作“替罪羊”拉回农村；有的为动员其父母赔缴果实拉回农村。据不完全统计，土改运动中出身剥削家庭的教师被拉回农村表态的近百人，其中多为二、三种情况，回乡后学校和当地政府无人过问。从那时起，教师社会地位受到动摇，教师不被人们尊重，教育工作也没有摆上应有位置。乡村可以随意分摊教师任务，甚至勒令学校停课的现象时有发生。关于剥削家

庭出身的教师在土改中拉回农村的审批手续，笔者在县档案馆查资料获悉大部分是没有经县批准的。只要当地土改队同意，就可以随时拉回农村。直至1952年7月，始兴学校缺乏教师，全县校长会议有人提出土改时拉回农村表态的教师可否回校教书。土改被拉回农村表态的剥削阶级出身的教师大多是无罪的，蒙受冤屈，对他们的处境深表同情。我向县长温茂春请示：称土改时一批出身剥削阶级的年轻教师，因农民追缴果实拉回农村表态，一拖一年多，现在缺乏教师，可否回校教书。温县长指示如果农民没有意见可返校教书。根据这一精神，文教科先后收回有李德钊、陈礼元等约50多名教师。当时回收手续较简单，无需审批，由文教科收回回原校或重新分配则可。

县接管全县小学后，在整顿小学教学秩序，努力提高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尊重教师职业，重视人才上作了尝试：大力宣传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宣传县管教育是政府对教育工作的关怀；规定各级不能随意抽调教师参加社会活动，凡要抽调必须经县文教科批准；重用一批德才兼备的教师担任学校领导，在联合小学挑选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到中心小学担任校长，原始兴中学代教导主任李德钊回收后委派到县联合小学任教导主任，原在乐昌担任过小学校长的朱祖周，受挫折后回始兴任教，通过半年考查，委派到顿岗中心小学任校长；选拔一批工农干部到山区任教，如赖贵安、陈汉周等，由于虚心学习，积极上进，成为了优秀的领导干部；还注意选拔年青干部、始兴中学简师班应届毕业生正副班长饶石周、李子维分配到城南澄陂小学、二区二中心小学（黄所）任教导主任，选拔青年教师黄德良到华南师范大学深造。

1953年2月，始兴中学全体教师到韶关集中进行中学教

师思想改造，这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教师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学习班由地委秘书长张根生作了政治时事报告，学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清除封建、买办和法西斯的思想流毒，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崇洋媚外等错误思想，树立正确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期间反复朗读从敌人监狱辗转的方志敏遗著《可爱的中国》，文中字字句句充满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表现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不少教师感动得热泪盈眶。省委书记陶铸到韶关检查工作，亲自为全市 600 多名教师作报告，使到会教师深感党的温暖。学习班通过谈心得体会，批判过去错误思想，有的还放轻思想包袱，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当年，始兴中学由县城迁往白石岗（孔庙），是年始兴中学 5 个班，学生 294 人，教师 18 人。

县接管学校后从 1952 年暑假开始，每年暑假都集中全县小学教师举行短期会议，总结上学期工作，布署下学期任务，对学校中出现的不良倾向进行批判。届时县长温茂春等领导亲自作报告。

改造与提高

新中国建立后，始兴县人民政府接管学校，在上级党政和教育部门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改造工作，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1950 年秋，执行《中南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1951 年施行政务院公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废除了反动的训育制度，在学校建立和发展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取消了国民党政府在学校开设的“公民”、“军训”等对学生灌输反

动政治思想的课程,开设了时事政策课和马列主义政治课;执行了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小学学制分为初小、高小二部制,高小开设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地理、体育、图画课,初中开设语文、算术、时事政治、植物、动物、地理、历史、代数、几何、化学、英语、体育、音乐、美术课;废除了旧的规章制度,颁布了新的规章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鼓励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鼓励师生参加社会活动,组织学生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宣传工作和社会活动;宣传尊师爱生,禁止体罚等,从而使中小学教育开始走上新的道路。

1952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学校的基本工作是教学”,“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学校工作至此有章可循。此时土地改革进入尾声,在上级党政部门关怀下,县区开始重视教育,县文教科逐步增加人员,由1人增加至4人(肖光耀、凌海月陆续到文教科工作),提出整顿教学秩序,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当时具体抓了几项工作:第一,明确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任务,规定中小学师生不得随意参加社会活动,凡抽调借调教师必须由文教科批准,规定中学生参加社会活动,高中生限制在每周三小时内,初中生不得超过两小时。第二,明确规定中小学教师必须认真备课。做到上课有教案,提出“不备好课不进入教室”的口号。当时全国、全省尚未出版教案,针对乡村小学教师文化素质低的问题,委托联合小学编写小学一至四年级语文的教案,教案分为教学目的、中心思想、教学步骤、布置作业四个部分,油印发至各乡小学。第三,提倡个人备课与集体备课相结合,组织观摩教学、学习业务、交

流经验活动。规定每星期六下午为教师业务学习日，乡村小学教师到中心小学集中学习业务，交流备课教案，有计划安排中心小学和联合小学观摩教学。县联合小学出版《教学导报》，分发到全县小学，旨在指导、交流教案，完善课堂教学。当时联小李德钊老师负责抓编写教案和《教学导报》工作，为提高全县小学教学质量作出一定的贡献。

1952~1953年间，学习苏联教学经验，以凯洛夫《教育学》为本，推行苏联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材教法等，强调“启发式”和直观教学，利用图片实物，推行五级记分法，即3分为及格，4分为良好，5分为优秀。从那时起，经常组织全县性的观摩教学和教研活动，对搞好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52年，全县小学推行汉语注音（汉语拼音的前身），提倡讲普通话，集中全县教师在刘镇营学习汉语注音。授注音课的教师是县扫盲队的教师。此时县成立扫盲队，有王树清、陈哲亮、魏柱标等7位同志，直属县文教科。是年在全县乡镇农村开展以汉语拼音为主的夜校识字扫盲运动，并动员全县师生参加这一运动。

1953年下半年，根据省市指示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整顿小学工作。县委组织部分配陈方畴任文教科长，主持此项工作，从而使全县学校教学秩序、教师队伍更加稳定，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学校工作步入正轨，为始兴教育奠定了基础。

回忆在北江公学学习的日子

赵洪波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五十周年，个人在人生旅途中也跨过花甲之年，回首往事如烟，但建国初期即1950年中前期参加北江公学第三期学习的情景却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使我感到分外亲切和激动，因为这是我踏上建设新中国征途中的重要一站，值得深情怀念。

我是从怀集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支前征粮工作队赴北江公学学习的。1950年春节工作队休假期间，我回到怀集北部老家，听到近邻连山县一个刚从北江公学第二期学习结业归来的朋友说，该校于春节过后接着开办第三期。那时我年纪轻，才17岁，虽念过初中，但知识不多，很想深造，多学点革命本事。所以，过了春节我就会同连山县几个知识青年经连山县人民政府写介绍信投奔北江公学。从家乡经连山县步行两天抵达连县，才乘上烧木炭的汽车到达该县星子圩，到坪石火车站不通汽车，又再走了两天路才乘上火车到韶关。走路时爬山涉水的艰辛不用说，尤其是夜宿途中旅店更是提心吊胆，因为解放初期土匪猖獗，真是担心住进“黑店”。那时北江公学的校址已从志锐中学搬到韶关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山岗上，除了火车进出站叫声噪音较大外，环境还算不错。虽

然是些简陋的平房，但有操场、小礼堂（与饭堂共用）等配套设施，其他房子可作校本部、课堂和宿舍之用。

我们抵达北江公学，第三期还没有正式开学，却受到学校的食宿安排。休息了一个多星期以后，经过考试合格作为学员开始参加公学的学习课程，时间是1950年3月底或4月初。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与理论，包括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新民主主义论以及革命人生观、为人民服务宗旨等。运用读书上课讨论的方法，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进行学习。开学那天，中共北江地委书记兼校长伍晋南亲临指导。他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个子不高，态度和霭，声音高亢，带着很重的客家口音给我们讲话，讲目前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讲建设新北江所需人才奇缺，要通过短期培训干部，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并勉励大家努力学习等等。他讲话层次分明，很有说服力，大家静静地听着。全校学员三百多人，多数来自当时北江专区十六个县和韶关市（含现在的清远市等地区），有的是由组织上选送来培训的，有的是招生录取的，但都是些有一定文化水平，品德优秀，身体健康的青年。大家心情愉快，学习情绪高涨，如饥似渴地吸收革命知识，进行思想改造。学习中，北江人民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何俊才作过一次形势报告。他讲到不久前解放海南岛和当前我地区开展剿匪、发动群众、生产渡荒、减租退押、准备土地改革等情况与问题，使大家认清形势，受到鼓舞。

学校的学习生活是军营式的，简朴的，按时学习和休息，早起晨操，轮流值日打扫课室宿舍和厕所卫生，晚上轮流值班巡逻，还要轮值帮厨房，带着炊事员步行到当时的曲江桥头边市场买菜。生活是供给制的，发帽子衣服，帽子是八角

形的红军帽，衣服男的是中山装，女的是列宁装。包伙食，吃大锅饭，菜用大脸盆装，早餐多是稀饭馒头咸菜萝卜干，午晚餐多是青菜豆芽米饭和极少量肉。天气好时把饭菜搬到室外空地上吃。学习分组讨论课堂不够地方，就在草地上围圆圈席地而坐；睡的则是大房间木架床。师生和学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大家相当融洽。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教育长李祥麟，他年富力强，身体壮实，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办实事，说话或讲课声音清晰宏亮，富有哲理，深受欢迎。学习在平时尤其是集会时高唱革命歌曲，气氛热烈，激动人心，情绪高昂。当时唱得最多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团结就是力量”等。

学习期间在学校领导组织下，学员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当时美国打着联合国军队旗号大举侵犯北朝鲜，把战火烧到我东北边境，我们就上街游行示威，写口号，贴标语，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到广州参观访问路过韶关，我们就到火车站参加列队热烈友好欢迎与欢送，同班的女同学献上鲜花，并利用停车休息时间中苏青年联欢共舞，联络友谊。

1950年7月是我难忘的日子，根据我个人志愿申请，老团员同学介绍，团组织审查考察批准，吸收我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当时团的纲领提到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助手，是党的后备力量。从此，我就在团组织直接的培育下，为不久在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好政治思想准备和打下基础。

在公学的学习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四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过去，1950年7月下旬学习就要结业了。大家期

待着组织上对自己工作岗位的安排分配，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我被派往连县中共县委调查研究室工作，接着立即投身到征粮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八字”运动以及土地改革运动中去。广大学员也被分配安排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以后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断磨炼成长，很多昔日的年轻小伙子后来成为各行各业和基层各级领导的骨干，为新中国建设尽一点微薄之力，深感欣慰和自豪，这都离不开祖国的培养，离不开公学的学习受教育，这些往事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作者系中共韶关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

粤北在三年游击战争湘南 游击区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廖冶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活动在湘粤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在边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与强大敌人的残酷清剿和种种反革命阴谋，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战胜了难于想象的艰难险阻，坚持了长期的游击战争，创建了横跨湘粤边区，纵横数百里的“湘南游击区”，成为三年游击战争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之一。粤北，是这一游击区的主要区域范围，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长期以来，粤北在三年游击战争这一游击区中的地位和作用，未能得到史学界应有的评价和承认，甚至被遗忘。为此，本文的任务就是对粤北在三年游击战争湘南游击区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试作探讨。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粤北的乐昌、乳源、连县、阳山等县，地处粤湘两省边

境的交界，是湘南游击区所包括的范围，也是湘南游击区的重要区域之一。这些地区丘陵起伏，高山连绵，地势险峻，纵横数百里。由于交通不便，村庄偏僻分散，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而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所有这些，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党十分重视对这一地区的开辟。继湘南暴动后，中国工农红军湘粤边赤色游击队（也称湘南赤色游击大队）、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即赣南军区）红24师71团等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在这里与湘粤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给湘粤边境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游击革命根据地。

（一）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在粤北创建了横跨乐昌、乳源、连县、阳山一带的粤北游击根据地。

1928年夏天，湘南一批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先后转移到粤北。与粤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发展和建立党组织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武装斗争。1929年夏秋，在粤北乐昌建立了20多人的游击征伐队，李鄂任队长。活动于粤北乐昌之黄圃、九峰一带，建立了以塘村为中心，方圆百余里的根据地。同年冬，中共广东北江巡视员指示：“湘南武装，编为乐昌游击战争部队，把乐昌游击战争发动起来。”^①

1931年2月，红七军转战粤北，为了支持中共湘南特委开展武装斗争，在乐昌赠送了110多枝步枪，2挺重机枪给湘南特委。湘南特委以这些武器装备为基础，在粤北乐昌县黄圃地区，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也称“湘南赤色游击大队”（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由高永平任大队长兼政委，李鄂任副大队长。人员从原来游击征伐队的2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鼎盛时期多达5~6百人，成

为三年游击战争湘南游击区的主要游击队伍之一。活动地区从乐昌黄圃、九峰，扩大到乐昌的坪石、武水沿河一带；乳源的梅花、大坪、石带、湖洞（今属乐昌）；连县的连州、星子；阳山的朝天（今属连州）、称架等地。从原来的一小块根据地发展成为横跨几县，纵横数百里的游击区域。这些区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湘南游击区的主要区域范围。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一直战斗在粤北的这些地区，直到1937年冬下山改编为新四军，才离开粤北这块根据地。这支游击队给湘粤边区的反动统治和反动武装以沉重的打击，巩固和发展了湘南游击区，开创了湘粤边区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在粤北连县天光山建立了根据地。

1934年2月，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由团长李宗保、政委周汉杰率领，奉命到湘粤边区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3月，进入粤北连县天光山、两广圩、周家岱等地开辟新的游击区，在这一带坚持游击武装斗争。利用天光山一带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与连县、临武、蓝山等边境之敌周旋。1934年4月2日，这支队伍与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汇合在一起。尔后，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并入红四团，被编为第一营。1934年7月，这支队伍，撤出连县天光山游击根据地，转回到粤北乐昌瓦屋场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三）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的“红24师71团”，在粤北建立了以连县天光山、黄洞山一带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35年3月，龚楚、石友生奉中央命令，率领留守赣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的红24师71团，进入粤北开展游击战争，以连县天光山、黄洞山一带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

并向粤桂湘边扩展。同年5月底。因敌人南北夹击，红24师71团撤出天光山、黄洞山根据地，向湘南转移。不久，龚楚叛变，部队受到严重损失。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湘粤边区进行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基本没有停止过在粤北进行游击武装斗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特别是湘南游击区的主要游击队伍之一的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长期活动在粤北。而且在粤北创建了横跨四县，纵横数百里的游击根据地。成为湘南游击区的主要区域范围，也是湘南游击区的一块不可分割和不可没有的区域。

二

粤北，作为湘南游击区的一部分，它所起的历史作用是非常大的。

(一) 粤北人民保护了一批湘南转移到粤北的革命同志，为革命保存了种子，为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武装队伍的建立，准备了基本干部和骨干力量，为创建湘南游击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湖南暴动后，朱德、陈毅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尔后，湘南革命转入了低潮，白色恐怖严重。湘南的革命同志无法立足，不得不向粤北转移。

1928年4~8月间，湘南一批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先后分别转移隐蔽在粤北乐昌县的黄圃、九峰、坪石、武水沿河一带和乳源的梅花、大坪、石带、湖洞（今属乐昌），连县的连州、星子等地，以及曲江县的富国煤矿。

这些转移到粤北的湘南革命同志，大多从找乡亲，认家门入手，找到立足点。以行医、做泥水、木工、烧砖瓦、烧木炭、理发和街头卖艺等职业为掩护，潜伏下来，等待时机，重新开辟地下革命斗争。这些转移到粤北的革命同志，后来通过乐昌党组织的关系，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1929年春，成立了中共坪石市委，收编湘南转移到粤北的同志。从而，转移到粤北的湘南革命同志得到了党组织的领导和粤北人民的保护。这些在粤北被保护下来的湘南革命同志，就是后来建立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基础，也是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基本干部和骨干力量。

1931年1月，在粤北乐昌县黄圃司恢复建立了“中共湘南特委”。同年2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也称“湘南赤色游击大队”），成为后来三年游击战争湘南游击区的主要队伍之一。“中共湘南特委”的恢复建立和“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的成立，为创建“湘南游击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粤北，是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长期生存、活动的可靠后方。湘南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粤北这块后方根据地度过了多次危难关头。粤北成为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一把巨大的“保护伞”。

粤北乐昌县的黄圃、坪石，乳源的梅花、大坪、湖洞（今属乐昌）是湘南游击区的中心。它是湘南游击区党组织机关的长驻之地。从1928年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共湘粤边工委”、“中共湘南特委”以及“中共宜（章）乐（昌）县委（工委）”等党组织，一直长驻在这些地区，领导红军游击队和湘粤边区人民进行游击战争。

1929年，转移到粤北的一批共产党员，经与中共广东省

委取得联系后，先后成立了“中共乐（昌）乳（源）宜（章）边区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湘粤边区工作委员会”，机关分别驻在乳源县的大坪和乐昌坪石等地。

1930年8~9月份，上级派张连兴、徐浙江到粤北乐昌黄圃塘村，建立湘南特委交通中心，联系和安排散落在粤北的湘南同志。1931年在乐昌黄圃司恢复建立了“中共湘南特委”，机关设在乐昌黄圃司。乐昌黄圃地区成为湘南特委的两个中心地区之一。1932年又成立了“中共宜（章）乐（昌）县委”，属湘南特委领导。县委机关驻乐昌县的黄圃司。湘粤边区的党组织在粤北得到不断发展壮大。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粤湘边区后，中共湘南特委机关迁驻湖南郴县和耒阳等地。1934年12月下旬，湘南特委遭到破坏。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在湘南没有立足之地了。1935年春，谷子元、李林、贺泮朵、林长春等一些湘南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突破重围，回到粤北乐昌、乳源后方根据地。同年夏天，重新恢复“中共湘粤边区工作委员会”，机关设驻乐昌湖洞上坪一带山区，后迁往乐昌坪石。湘南游击区的党组织在粤北又得到重新恢复和发展。

1936年7月，原湘南特委的主要领导之一周里，也来到坪石，加强湘南游击区党组织的领导。1937年冬，党中央派王涛同志重返湘粤边区，领导湘粤边区人民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是年冬，又重新恢复“中共湘南特委”（湘粤边工委随之取消），机关驻乐昌坪石。不久又建立了“中共宜（章）乐（昌）县工委”，机关驻乐昌坪石等地。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领导湘南游击区武装力量进行游击战争的党组织，虽几经演变沿革，但其机关基本长驻粤北。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在粤北得到了发展壮大，确保了湘南三年游

击战争的进行和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粤北，除了是湖南游击区党组织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地方之外，也是湘南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的可靠后方。

粤北有着坚实的革命基础，而且远离反动统治的中心，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红军游击队可以避免与敌主力冲突，保存力量，减少消耗。是一块较为理想的后方根据地。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红 24 师 71 团等红军游击队，长期利用粤北这块后方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开展游击战争。红军游击队实行“坐南朝北”的战略方针，依托粤北，重点打击湘敌。红军游击队经常出其不意地出击湘敌，往往等湘敌赶来围攻时，游击队早已带着战利品回到了粤北后方根据地，使挨打的湘敌感到无可奈何。

湘南保安司令部曾出动 30 余队保安队，围剿出击湘敌的“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妄图消灭这支红军游击队伍。但这支队伍战术灵活，敌人在湘南集中围剿，游击队就迅速退回到粤北养精蓄锐。湘南保安队“虽竭力剿办，然此剿彼窜，殊难收效……”^②由于有了粤北这块后方根据地的天然屏障，令湘敌“进剿颇感困难”。^③

有了粤北这块后方根据地，也使湘南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能在危难时刻化险为夷，摆脱困境，渡过难关。1934 年 12 月，红军长征经过粤湘边境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湘南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调集 9 县反动团队进行围剿。湘省务会议决议：“划郴县、宜章为特别区，县长改由军人担任，限令三个月肃清共匪”。^④由于敌人集中优势兵力疯狂围剿，加上党内出了叛徒，正在湘南出击敌人的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遭到严重损失，整个队伍中剩下 6~7 个人，7~8 条枪，不成为游击队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

不突围回到粤北乐昌这块后方根据地，并改称为“武工队”进行休整补充发展。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只剩下几名队员的“武工队”又发展到60多人。同时还组织了300多人不脱产的群众性游击组。一年后，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度过了危难关头。这时又恢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由肖良略任大队长（肖牺牲后由李林继任）；林长春任政委。湘南游击区游击战争的烈火，又重新燃烧了起来，湘南游击区又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由此可见：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能够得到长期生存和发展，湘南游击区得以巩固和湘南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得以坚持，和粤北这块后方根据地所起的作用关系极大。可以说，没有粤北后方根据地，也就没有湘南游击区的存在。

（三）粤北为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发展和湘南游击区的创建和巩固，提供了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粤北，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人民经受过革命斗争的洗礼，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群众基础较好。早在1925年~1927年，粤北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同时，红军也多次在粤北进行过活动。1927年12~1928年2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在粤北活动；1931年1月~2月，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转战粤北；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粤北境内。粤北人民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而且粤北有地下党组织。同时还有革命群众组织。1936年，仅乐昌县“参加贫雇农团的有几千入”^⑤。这为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发展，以及湘南游南区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原中顾委委员、湖南省委书记周里，1936年~1938年，曾在粤北乐昌坪石领导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他深有

体会地说：“坪石地处两省三县交界，活动范围大，加上群众拥护和帮助，反动派很难剿到我们。”^⑥这充分说明了粤北的群众基础是非常好的。粤北人民对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如掩护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进行活动。1937年，湘粤边工委负责同志谷子元和几个游击队员，在乐昌坪石坳丘村活动时，被一个叛徒告密，并引领国民党湘南保安队前来围捕。人民群众将谷子元等人隐藏起来，敌人无计可施，只好逐户搜查。正在敌人大肆搜查时，白皮红心的国民党皈塘乡乡长、共产党员李青青带着一帮人赶来解救。他义正辞严地对湘南保安队说：“我们这里是广东管的地方，没有什么共产党，你们要搜就到你们湖南去搜吧！”^⑦湘南保安队只好灰溜溜地撤走，从而使谷子元安全脱险。

另外，粤北人民还为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提供情报，输送军需，安置伤病员，帮助建立根据地。同时还积极送子弟参加红军游击队，仅乐昌就有100多人参加游击队，300多人参加了不脱产的游击组。为活动在湘粤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增添了新生力量，发展和壮大了湘南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推动了湘粤边游击战争的开展。

粤北不仅为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同时也提供了物质基础。粤北地处湘粤两省边界的要冲，物产丰富，市场较为兴旺繁荣。特别是乐昌的坪石和连县的连州镇，是湘粤边区物资交流的集散地，素有“小广州”之称。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粤北能够得到充足的给养。游击队在粤北打土豪、筹粮饷，粤北人民也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同时在物资上援助红军游击队，经常接济粮盐，留宿供膳，使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渡

过了一个个物质难关，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困境。

从上可见，粤北为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确保了湘南游击区的巩固和发展。

综合所述：粤北作为湘南游击区的主要区域范围和后方根据地，为湘南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发展，为湘南游击区的建设和巩固，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粤北在三年游击战争湘南游击区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①（《北江巡视员李一鸣》1929.12.5）

②（《广州民国日报》1932.3.27）

③（《湖南大公报》1935.4.4）

④（《湖南大公报》1934.12.7）

⑤（周里《湘南三年游击战争的回顾》）

⑥（邱辉珍《回忆湘粤边赤色游击队的战斗历程》）

⑦同⑤

（作者单位：乐昌市政协）

大革命时期的乐昌工农运动

廖冶金

一、乐昌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1924年，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军，因而必须普遍地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以反对地主政权和地主武装”。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也指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生产占全部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是农民革命。吾党为巩固国民之基础，惟有首先解放农民，无论政治的，经济的运动，均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之政策首先着眼于农民本身利益；政府之行动，亦需根据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国共两党都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这为开展农民运动创造了条件。

1925年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中共广东省农民运动委员会，派陈德钊等人，到乐昌开展农民运动，在乐昌县城龟峰寺民团成立了“乐昌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由陈德钊任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夏天，中共广东省委农委又

加派龚楚等人回乐昌协助陈德钊筹办乐昌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从中培养农运骨干。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首先遴选了李光中、杨高林、李家源等一批知识青年骨干参加农会筹备工作。他们粗布短衣，深入农村，积极宣传教育发动农民，帮助指导各乡村成立农会。陈德钊亲自到各地宣传发动农民，指导开展农民运动。由于农民的热烈响应，乐昌农会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二、农会组织的蓬勃发展

经过宣传发动，农民要求参加农会的积极性很高。为了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工作，乐昌农筹会首先组织村农会，有了二个村农会以上就建立乡农会，有了二个乡农会以上就建立区农会。由于方法得当，工作深入，乐昌农会组织发展很快。1925年7月，陈德钊亲自到坪石发动农民，帮助指导成立农会。为了便于组织发动，把坪石地区分为七段进行：莲塘第一段、塘口第二段、白沙第三段、皈塘第四段、小漕第五段、杨毡第六段、天堂第七段。经过陈德钊等人的努力，1925年7月，全县第一个农会—皈塘农会成立了。皈塘农会的会员基本上包括了上楼、下楼的农民。后来根据运动发展的需要将皈塘农会划分为上楼、下楼两个农会。选举李顺安、李顺德为会长。随后白沙、小漕农会相继成立，选举吴九松、何功珍为会长。1925年8月，毛泽东同志前往广州主办第六届农讲所，途经乐昌。毛泽东同志在乐昌逗留期间，在义仓为乐昌工人、农民作了一次演说。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演说，对乐昌工农群众有很大的鼓舞，启发了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有

力地推动了乐昌工农运动的开展。而后，各村乡农会迅速发展。1925年12月15日，第一区西门乡、老虎头乡农会成立，省农会代表丘鉴志、陈德钊，国民党乐昌县党部代表谭军略、朱节山等参加了成立大会。12月18日，第四区大吼坪、歧岗岭、洪莲洞、筑篱等4个乡农会会员集中在河南水北帝庙开成立大会。

1926年1月23日，第八区田头乡农民协会在田头乡举行成立庆祝大会。省农会代表陈德钊、县党部代表李开如、县长曾昭声出席了大会，并致辞祝贺。

3月15日，第三区灵口乡农会在灵口张家祠堂召开成立大会。

到1926年3月止，全县成立了8个乡农会57个村农会。

同年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宋华、侯凤墀受派来乐昌，加强领导乐昌开展农民运动。在侯、宋二特派员的具体指导下，乐昌农会组织有较快发展，到1926年4月，全县共成立区农会3个，乡农会33个，会员1698人。

1926年5月1日，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乐昌派了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北江农民办事处决议强调：“乐昌要严密组织起来，以便伸张国民革命势力于中部”。这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推动促进了乐昌农民协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全县各地农民踊跃加入农会组织，农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26年5月31日，乐昌第四区坑下乡农民协会成立。1926年7月，第二区农民协会宣告成立，接着九峰、五山、长来、东乡等乡村农会也相继成立。全县乡农会增加14个，会员增加1101人。至此，全县共有区农会4个，乡农会42个，会员2709人。

1926年8月17日，广东农民协会召开执行委员扩大会

议。乐昌代表龚楚、杨高林、邓水石、薛仰圣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揭露了各地豪绅地主勾结反动军队、右派官吏在农村破坏农民运动的严重情况，批评政府当局未给农运以有力支持。会议号召全省农民团结一致，以谋达到抑制反革命势力，实现农民最低限度要求之目的，并进而为完全解放。

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乐昌农民运动更加向前发展。到是年底，加入农会组织的农民达二万余众，农会势力遍及各个乡村。

随着各区乡农民协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7年春，在乐昌县城公局正式成立了“乐昌县农民协会。”选举陈德钊为农会委员长。从此，乐昌农会组织便日益壮大了。

三、建立农民武装

农村协会成立之后，要在封建势力长期统治的农村，推翻地主豪绅的反动势力，巩固农民协会，保护农民利益，在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同时，要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用孙中山的话说：农民“联络”起来，“有了枪，练成了很好的农民自卫军，就可以不致做人的奴隶，成为一等的主人翁”。国共合作后，在广东革命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于农民运动的宣言中便指出：农民协会“特许其在一定计划之下组织农民自卫军”。1926年5月，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根据政府宣言，认定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有效。从此，农民自卫军便成为公开合法的组织，他伴随着农民协会的建立而建立。

1926年11月，中共北江特委和北江农民办事处，为了提

高农民自卫军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能，培训农民武装干部，决定开办“北江农军学校”。根据北江农民办事处规定：入学学员必须是在农运中一向工作积极、思想进步、略有文化的农会青年。名额根据各县农军发展情况和需要统一分配。乐昌两期共派了11名合格青年农民进北江农军学校学习。毕业后派回乐昌，成为乐昌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的骨干，充实加强了乐昌农民武装干部力量，推动了乐昌农民武装的向前发展。

1926年冬，在成立各区农军的同时，还对县民团进行了武装改编，将县民团改编为农军的一个中队。

1927年春，在成立县农民协会的同时，成立了乐昌县农民自卫军。龚楚任指挥官，谭军略任副指挥官。由青壮年农民组织起来的乐昌农民自卫军共有8个中队，约1000人，另有民团局一个中队，有枪200余枝。

农民自卫军的建立，维护了地方治安，保护了农民利益，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嚣张气焰。乐昌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武装队伍。

四、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

农民协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和农民武装的建立，组织发动了广大农民群众，从而使乐昌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不断引向深入。

1. 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抨击土豪劣绅，声张农会势力。为了扩大农会之影响，打击封建势力，乐昌县农会经常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在县城二、三天开一次大会，宣传农会宗旨，抨击土豪劣绅，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各乡农民

手持梭标、大刀、鸟铳，齐集县城。“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地主豪绅压迫！实行减租减息！实行耕者有其田！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的口号不绝于耳，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强大力量。

孙中山逝世周年和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日乐昌农会组织召开了大型纪念会。会议开得隆重热烈。会后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借资宣传革命，声张农会势力。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推动了乐昌农民运动的向前发展。对于乐昌县农会强大的宣传攻势，乐昌旧志作了详细的记载。旧志云：“十五年，侯凤墀、宋华来县组织各乡农民协会，旋开县农民协会……随时开会，其标语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大资本家、大地主为词。”又云：“二、三日必开大会一次，其口号不外打倒某某，谓之革命工作……官绅人人自危。”从旧志记载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农会的宣传声势是何等的浩大。

强大的宣传攻势，使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官僚土匪闻风丧胆。农民群众扬眉吐气，面貌为之一新，大长了农会会员的志气。

2. 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乐昌农民受苦甚深，地主盘剥厉害，赋税奇重，名目举之不尽。农民交租占收获的一半，借谷利息高达50%，平时还受军阀、民团派役之苦，农村中流行一首民谣：“农民收了谷，家中无粒粟，田主家里堆满屋。”广大劳动人民无以为生。

农民不甘心情愿忍受这种无限无制的剥削，他们心中早已隐伏着愤怒和怨恨。农会成立后农民群众纷纷起来要求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皈塘农民在农会会长李顺安的领导下带头开展“罢送田租”的运动。以前农民交租要送到地主家里，现在农民不再送了。要地主到佃户家里挑，气得

地主火冒青天。自己去挑有失体面，逼农民再送吗？农会势力大如山，奈何不得。地主无计可施，又以“不佃耕”相威胁。农民有了农会，毫不畏惧。提出：地主田租高就罢耕，不佃耕就不耕的口号，同地主针锋相对。结果神洞一带几十亩田地因农民罢耕而荒弃。随着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县农民协会根据农民的要求，下令宣布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如有违抗，严惩不贷。接着全县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的运动。农民纷纷起来抗租抗税。

地主阶级借口农民减租减息，延纳粮税给政府当局，企图破坏减租减息运动。乐昌农会将情况如实上告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民政厅查明情况后，下令乐昌县政府当局，行文说：“查粮税关系国课，出自田主，田主既有租息收入，不得借口农民减租，任意拖延……”从而挫败了地主阶级企图破坏减租减息的阴谋，使乐昌减租减息运动得以顺利发展。

3. 禁烟禁赌。鸦片烟是推残人体健康，麻痹人的意志，败坏社会风气的剧烈毒品。乐昌染上烟瘾的壮丁不少，老年人吸鸦片的比例更多，弄得街巷乌烟瘴气。摆摊开赌在乐昌也盛行一时，城乡圩市，赌摊赌馆比比皆是。吆喝聚赌，日夜不停。农会成立后，立即开展禁烟禁赌运动，公布了烟赌禁令。坪石农会将违抗烟赌禁令的破阳大地主李其成拘拿，押至坪石街游行示众，影响很大。此后，烟赌几乎绝迹，社会风气日趋好转。

4. 打击反动奸商，保护农商利益。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奸商巨贾异常害怕。他们畏惧农民力量的强大，害怕工农群众抬头，千方百计破坏农民运动。坪石反动商会会长周汉勋私立国民党党部，以对抗农民协会组织，借端捣乱农民运动。在坪石农民协会的强烈反对下县党部顺从民意，报告省党部

将其私立党部取消，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但反动商会长周汉勋不肯就此罢休，与土匪头子胡凤璋串通一气，合谋破坏农会组织，攻打农民自卫军。同时，还纠集乳源土匪，借名保护河道，在武水河上设卡收税，每年约万余元。蛊惑普通商人，对抗农民运动。农商群众以其病农害商，罪恶昭著，要求严惩。坪石农会准备派人捉拿，准备公开惩办。周汉勋闻风先遁，一些反动奸商乘机煽动，挑拨间离农商关系。一帮反动奸商挑起了“罢市”浪潮，妄图用“罢市”来抵制农民群众的正义行动，用不卖油盐来威吓农民群众。坪石农民群众在农会领导李家泉的领导下进行反“罢市”斗争。农民群众柴米蔬菜不上市，断绝商店粮食蔬菜供应，回击反动奸商的“罢市”浪潮。同时，农会领导干部出面做小商小贩的劝导工作，揭露反动商会的罪恶阴谋。小商小贩要靠小本经营为生，经过农会出面做工作，他们认识到“罢市”吃亏的是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不再听从反动商会的摆布，暗中把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卖给农民。

另一方面，坪石农民协会还派人到乐昌、韶关等地采购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长尾洞和罗家渡设点供应给农民。并把农民的农副产品收购起来运往乐昌、韶关等地出售。为了利于保管和运输，坪石农会还专门从各地抽调了20多条木帆船作货物运储船。

再则，农会还动员民船工人不给奸商巨贾运货，时间长达半个多月。

“罢市”的结果，受限制的不是农民群众而是不法奸商和豪绅大贾。

农民柴米蔬菜不上市，民船工人不运货，而农会又自己采购生活必需品供应给农民，长此下去，受损失的是奸商巨

贾。他们无计可施只得哀求县长曾昭声出面调处。周汉勋不得不接受农民协会提出的条件，将其借给土匪的经费交给农民自卫队，由此，局势才有所缓和。但反动商会长周汉勋仍不敢轻举露面，象落水狗一样，龟缩在匪首胡凤璋巢穴里不敢动弹。坪石农会取得了反“罢市”斗争的胜利。

5. 打击土匪，清除匪害。乐昌原是匪患猖獗之地。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四处驻防，湘粤桂各系军阀来去如梭，战火遍地，兵慌马乱。官僚地主与匪勾结，豢养大批流氓兵痞分子，养匪为患。土匪仗着地主官僚的豢养，四处窜扰，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土豪劣绅坐地分赃。弄得整个乐昌鸡犬不宁，生灵涂炭，为害甚烈。

农会轰轰烈烈开展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运动，豪绅地主的利益受到极大的冲击。他们对农会恨之入骨，便勾结土匪胡凤璋与农会相对抗。农会减租减息，而湘南土匪胡凤璋匪部则在武水沿河设立关卡向船民勒索船税。武水沿河700多条船只的正常来往运输受到严重威胁。而且这帮土匪又与当地反动民团、土豪劣绅勾结起来，暗杀农会领导人，偷袭农军，捣乱破坏农民运动。人民群众对之深恶痛绝。

为了保护农民、船民利益，保障乐昌农民运动向前发展，消除匪患，乐昌农会与船业工会联合起来，给武水沿河一带土匪以猛烈的打击。坪石农军中队长李家泉率领1000多青壮农民支援船民击败了武水河上为非作歹的土匪，拔除了土匪据点，摧毁了土匪设置的关卡税站。

1926年7月10日，李家泉率领农军战士在乐昌长来袭击了胡凤璋的船只，打死了为虎作伥的胡匪参谋、副官各一名，俘获匪兵19名，缴获其携带的全部武器。

农民的武装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土匪对乐昌农民运动的

猖狂进攻，维护了地方治安，保护了农工利益，清除了匪害，保障了乐昌农民运动的顺利发展。

6. 横扫封建宗法思想，废除农村陋习。农民运动兴起后，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在农会的领导下，向封建宗法思想、农村陋习发起了冲击。1926年的清明节皈上乡农民带头冲击封建宗法制度，要求取消“功名昨肉”。他们认为农民年年要交三斤“功名昨肉”的封建宗法制度不合理。因为交猪肉的不是地主，而是农民，然而大吃大喝饱食猪肉的却是封建地主和宗族头人，农民根本无法享受。因此，皈上乡农民在农会的支持下清明节抗交“功名昨肉”，勇敢地冲击封建宗法制度。

另外，废除夫权，实行男女平等制度。农会兴起后，女人不再裹脚，与男人一样进祠堂坐上凳，还参加农会组织，推倒几千年的族权夫权制度，妇女的权力和地位大大提高了。

五、工人运动的兴起

在各地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乐昌工人运动也随之兴起。乐昌船业，理发、柴货、商业等员工，在中国共产党乐昌组织的领导下，为了自身的权益和民族的解放，与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乐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6年，乐昌至坪石河段的武江上，大小船只约700多艘，共有航运工人2000多人。为把他们团结起来，使他们与农民合作，推动乐昌工农运动的向前发展。1926年2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决议中指出：“乐昌船员工会要设法与之接近，训练他们，引导他们同站于革命的战线上。”陈德钊、

李光中等人根据广东农民协会扩大会议的决议精神，在乐昌坪石进行夺取船员工会权力的工作。把原被地主豪绅所把持的黄色工会组织“济川堂”改组成为“坪宜船业工会”。

“济川堂”为乐昌豪绅地主所把持操纵，对航运工人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地主豪绅只顾收租，榨取工人的血汗，不修河道。航运工人长期漂泊水上，生活苦不堪言，加上武汉河道滩多礁利，水流湍急，常发生船只触礁或翻沉、货物受损的事故。奸商豪绅地主往往利用事故，无理向航运工人勒索高价赔偿。同时造船的商人垄断市场，任意抬高船价，使航运工人买船只因困难重重，只能由豪绅资本家盘剥。

要把船业工人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就必须对压迫航运工人的“济川堂”改变性质，使船员工会真正成为船员自己的组织，成为保障船业工人权益和为船业工人谋利益的群众组织。因此，农民部特派员陈德钊和乐昌农工运动骨干李光中等人，根据上级有关决议，对“济川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组工作。

一、取消“济川堂”，成立“坪宜船业工会”。选举航运工人何国安为主席，何国裕、周光保、罗元兆、朱玉龙为委员，使工会权力真正掌握在工人手里。

二、为便于组织领导，方便运输，防止混乱，将所有船只编班编组航行。

三、制订装御货物规章制度，防止争运事故的发生。

四、制订了工会章程和其他规章制度。其主要精神是：

1. 保障工人的正常收入，提出合理分配原则。每次航运收入，除一部份归船主外，其余均作为工资发给工人。船员工资的高低，视其劳动态度、技术熟练程度与取责情况而定。

2. 因事故造成船只损坏，货物损失，工人不赔偿。商人、

船主不得乘机勒榨，一切由工会出面调停解决。

3. 除缴交政府明文规定的关税外，其他地方关卡税收一律不交。

4. 工人家庭生活有困难，工会要酌情补助。

5. 工人购买船只要向工会统一登记，统一由工会向船厂订货，以防船厂资本家哄抬价格。

“坪宜船业工会”的成立，团结了乐宜航道上的船业工人，保障了工人的基本权益，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限制了豪绅地主、资本家对船业工人的压迫和剥削。

船业工会夺取权力的成功，在其他行业工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理发、柴货、店员工会也跟着相继成立。他们和农民一道，并肩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六、支援北伐战争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打垮了陈炯明，接着又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随后爆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工农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国民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1926年国民革命政府决定再次进行北伐，讨伐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军阀。

5月，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即34团），奉命为北伐开路先锋队从肇庆、新会出发，挥师北上，于5月22日进入乐昌。中共乐昌党小组和乐昌农会组织农民给予叶挺独立团大力支援帮助，沿途农民送茶送水。

6月中旬，国民革命军12师、第10师进入乐昌。7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第二军4、5、6师开拔乐昌。乐昌党组织和农会也发动大量农民，组成服务队，为北伐军服务。

7月29日，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随北伐军总部各部、处长、警卫团、宪兵团，炮兵团抵达乐昌。乐昌党组织和农会组织农民慰劳北伐军将士。7月30日，举行欢迎大会。各界代表及民众数千人参加了大会，并结彩燃炮，热烈欢迎北伐军将士抵达乐昌，预祝北伐取得胜利。欢迎仪式颇为隆重热烈，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出席了欢迎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7月31日，北伐军从乐昌出发，部队出城时拉成了一望无际的长蛇阵，辎重都由民夫抬着。一门野炮拆卸后，加上炮弹，需要八、九十名民夫才能运走，因此，乐昌农村组织了近千名农民，冒雨帮助北伐军把辎重等运送到武江河岸，用船拉到坪石。

九峰、黄圃、坪石等沿途各乡农会组织农民服务队，送茶送水，让出房屋给北伐军安营住宿。

另外，乐昌农会还组织动员了一批青壮农民加入北伐军的行列。乐昌人民为北伐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七、汇入革命洪流 参加南昌起义

正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革命人民实行大屠杀，革命处在紧急关头。乐昌党组织和乐昌农会接到北江农民办事处的命令，着乐昌农军和北江各县农民一道，随陈嘉佑部队北上武汉，支援武汉国民革命政府，讨伐蒋介石。乐昌党支部和乐昌农会积极响应北江农民办事处的号召，组织了500多名农军战士集中乐昌县城待命。

1927年5月1日，北江各县农民在韶关宝灵寺举行北上

誓师大会。他们踏上征途，于5月2日到达乐昌。5月4日，乐昌大部份党团员及500多名农军战士与北江各县农军一起挥师北上。当晚宿于九峰。5月5日抵达黄圃塘村，6日进入湘南境内。5月14日到达湖南来阳，进行军事训练和整编，农军建制由大队、中队、小队改编为营、连、排。北江农军编为13军补充团（对外仍用广东工农自卫军的称号），尔后继续北上。

6月8日，北江农军到达十八都后，传来北江土豪劣绅勾结反动官府大肆捕杀农会干部和会员的消息，农军战士愤怒异常。乐昌、仁化、曲江部份农军要求回师粤北，向反动派讨还血债。于是，乐昌农军分成二部份，一部份由薛仰圣率领与仁化、曲江农军南归。回师时先到仁化，支援仁化农军攻下仁化城，破监救出被关押的300多名农会干部和会员，再回到乐昌与反动派进行顽强斗争。另一部份在龚楚、谭军略的带领下，随北江农民继续北上，于6月15日到达武汉，驻徐家棚琴园。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右转反共，大革命失败了。党中央为了挽救革命，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7月21日，乐昌农军接到命令后，与北江农军一道，迅速脱离13军开赴南昌集中。乐昌农军分乘三艘小轮于7月29日黄昏抵达江西九江。30日乘火车到达南昌，被编入叶挺24师教导团，驻新营房。乐昌农军和乐昌大部份党团骨干，从此汇入了革命的大洪流。

7月31日晚，北江农军接到起义总指挥部的命令。大意是：决于明（八月一日）二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你部农军于攻击前，应完成新营房之防御部署，并相机增援24师教导团对新营房南面敌军之进攻。8月1日二时，震撼

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乐昌农军在起义总指挥部的指挥下，立下了卓著的战功。

八、反动派对工农大革命运动的破坏

农民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秩序，这必然引起农村地主、豪绅、贪官污吏等反动势力的恐惧和仇视。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采取种种毒辣手段，对农民运动进行破坏和摧残。其中最突出的是地主民团勾结土匪串通驻防军，对农会和农军进行武力镇压，致使“凡有农民协会组织之区，无不大多受压迫阶级之摧残。”

反动派对乐昌农民运动的破坏采取了种种阴谋手段。在农民运动开始时，地主豪绅也想加入农会，企图从中操纵农会权力。但他们的阴谋被农会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所识破，拒绝他们参加农会。

加入农会遭到拒绝，他们就采取捣乱的办法对农民运动进行阻挠破坏。1926年5月，乐昌第八区各乡农会会员联合各界人士召开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坪石反动商会长周汉勋纠集一帮走卒，到会场进行捣乱。当农会游行队伍走至坪石街头将军山塘口上下渡等处，反动商会长周汉勋又纠集一帮反动喽罗，大声叫喊“打倒乡下的耕田佬！”，“打倒乡下的耙田佬！”等反动口号，公开污辱农会会员。激起农民的极大义愤。

同年7月，在第二区农会成立之日，县联团率团丁500余人包围会场，进行恐吓破坏。坪石官僚地主何泽洪、邓茂成等纠集反革命武装商团，从广州购来100多支步枪、20支手枪，公开与农会相对抗。国民党左派老同盟会会员、乐昌农

运领导人之一李传楷得到情报后，带领农军百多人，包围商团，缴获其枪械，粉碎其颠覆阴谋。

地主豪绅等反动派势力还频频挑起攻打农军、暗杀农会干部和农会会员的事件。敌人对李传楷等农运领导人非常惧怕。土豪劣绅、反动民团、商团勾结湘粤边土匪头子胡凤璋，密谋暗杀李传楷。1926年4月，他们探知李传楷的行踪，派出刺客在黄禄冲伏击李传楷。李传楷头部虽被击伤，但机警地脱去血衣投入河中迷惑敌人。敌人以为暗杀成功，朝血衣上补了数枪就走了。李传楷隐藏在河岸草丛中，被农军救回坪石治疗。

不久，叛徒谢应丁、谢兴民向胡匪告密。1926年5月19日，胡匪趁黑夜包围了坪石区农会。叛徒与胡匪里应外合，农军队长郑龙标，副队长何成业，农军战士李传辉等在反击中英勇牺牲。李传楷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农军战士突围撤退。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李传楷在狱中宁死不屈，视死如归。临刑前怒斥敌人说：我头可断，志不可屈，要杀就杀，看你们猖狂到几时。”并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农民协会万岁！”敌人恼羞成怒，乃砍下其头颅投入武江。

而后，他们又到处悬偿捉命李光中、李家泉、周光保等农工运动骨干。坪宜船业工会委员周光保被他们捕捉杀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形势发生了逆转。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密令各地“清党”。反动派向人民进行反扑，疯狂镇压工农运动。一时乌云密布，白色恐怖弥漫。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又恰逢乐昌大部份党团员骨干和农军战士北上武汉支援国民革命政府。乐昌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乐

昌的地主豪绅和反动官吏互相勾结，趁乐昌农军北上后，乐昌革命力量薄弱时，组织反革命武装，公开向革命人民实行大屠杀，疯狂镇压乐昌工农革命运动。他们日夜捕杀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捉拿革命家属，滥捕无辜群众。周少楼、邓水石、李金富、袁甲为、林思廷等 11 名乐昌工农运动骨干分子被反动派杀害。反动派镇压工农运动的流血惨案发生了多起。正如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所指出的那样：“农民运动与乡村统治阶级接触，即发现地主与地方官方军勾结作武装的压与摧残……差不多都是血肉模糊的惨案。可说是血的农民运动。”

由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局失败，加上乐昌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乐昌轰轰烈烈的工农大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乐昌人民的革命斗争由此暂时转入了低潮。

乐昌工农大革命运动的失败，使乐昌的革命事业遭到惨重的损失。但它给乐昌的封建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不仅动摇了乐昌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而且也锻炼了乐昌的党组织和革命人民，并从革命的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教训。同时也为以后开展革命斗争，使乐昌革命走上复兴之路，积累了经验。

（作者单位：乐昌市政协）

仁化县长江镇的广州会馆

刘森华

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长江镇长江圩内建的广州会馆，座落在长江圩上新街（今东风街），是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冬，由广行（广州、佛山、南海、番禺、顺德等珠三角人）30家商人集资所建。占地面积1571.78平方米。建筑面积657.15平方米。据说该会馆的主要建筑材料，多为广州、佛山等地，从水路用木船逆流运来。在建筑设计上独具一格，装饰讲究，很有气派。

会馆的上座是主座，分上下厅，拾级而上。顶高12米，面积264.8平方米。左右有走廊，中为28平方米天井，四水归流，水从砖砌曲湾暗渠排至院外水沟。右侧有厢房，左侧是厨房。天井边沿摆设有直径50厘米园形的釉彩紫色陶盆的精制盆景。前厅大门上砌有一块宽325厘米，高80厘米的辉绿岩石横额。其中从右至左阴刻“广州会馆”四个楷书大字，用天蓝色填刷。右款刻有“光绪乙酉仲秋创建”；左边落款“梁耀枢书”和“臣梁耀枢”、“辛未状元”两八角石柱两个，作为大门廊的支柱，两侧的石梁上，在中间各有一个活泼石雕狮子。两边向外墙上，各有古雅、形像逼真的人物石浮雕等装饰。

厅正中设关圣帝君神位，供人们参拜。



厅脊用青砖砌成如书屏和工字墙，高约 80 厘米。两边墙体之上，也同样用青砖砌 80 厘米高工字墙。厅脊正中饰以彩瓷双龙戏珠和葫芦顶。显得高大、美丽、壮观。

厅内的顶墙之下，均画有彩色壁画，共 108 幅。有 150×100、100×60 厘米不等数种规格。画面多为古典人物或山水、花卉，描精美，栩栩如生。

厅的左侧走廊墙上嵌有 81×184 厘米，长方形阴刻“新建广州会馆碑记”石碑一方，共 359 字（详述如后），记载建馆情况。

下座为一朝着上座的敞口大厅，面积 98.8 平方米，作为集会或议事之用。均为青砖、双层瓦面琉璃瓦结构，灰砂作

栋。

上下座大厅前，均用花岗岩长方形条石砌成，地面用方阶砖铺设，干爽、冬暖夏凉。

上下座大厅的中间是一大院。院中有水井和一腊梅花池；左右两侧均是走廊院墙。左侧是4.3米×21.2米，91.16平方米走廊花厅；右侧走廊宽1米。两走廊均是园形石座木柱和琉璃瓦结构。

会馆大门，宽3米，深2.6米，设在上下座大厅东面的中间，门前是南北走道，可通往前后街道。并在前面设一杉木栅门，后设砖墙后门。

会馆的上座大厅及厢房、厨房至今犹存，院子仍在，其余已拆。更可惜的是上座厅脊上的二龙戏珠及厅前左右浮雕的人物均被人为所毁。

附：

新建广州会馆碑记（全文）

自来商贾懋迁，不辞道远，市廛列肆，先择地宜，我广属之服贾于兹也。窃慕夫长江纸贵，有胜洛阳。每当二七圩期，绿荷裹饭，客集如云，素竹成行，笈排似雪；北通江右，西接湖南，亦韶郡之一都会也。迄今百十年来，我广属之托业而获益者，利译源流。众以为不立都居，无以联桑梓，情也；不崇广厦，无以答神明，赋也。爰合凡卅家，分积年之余润，购巨室之良材，卜地建堂，金同日，可因咸举，值事等，分任其劳；经于乙酉之初春，落成于是年之冬腊。颜其

堂曰：永安。题其馆曰：广州会馆。中奉

关圣帝君暨 列圣神位，递年籍 神竣，以结杯酒之欢。
俾我广属，凡卅家仰桃园之义重，思梓里之情深，历久永垂，
同人安庇。因记其事，庶后之世守前业者，不忘所自焉。

芳名列后

| | | | | |
|-----|-----|-----|-----|-----|
| 兴昌号 | 协和号 | 正昌号 | 其昌号 | 达兴号 |
| 恒兴号 | 巨兴号 | 新 记 | 其兴号 | 和昌号 |
| 元昌号 | 广盛号 | 安 记 | 兴和号 | 晋昌号 |
| 巨安号 | 永昌号 | 祥和号 | 大昌号 | 新昌号 |
| 同和号 | 福兴号 | 元兴号 | 均和号 | 林森记 |
| 大和号 | 复昌号 | 利昌号 | 广和堂 | 和利号 |

光 绪 十 一 年 冬 月 吉 日 永 安 堂 全 立

（作者单位：仁化县长江镇政府）

一条六十年前的抗日标语

刘森华

在仁化县长江镇锦江村邹屋祠堂墙上，最近发现一条用石灰水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标语写在该祠堂门口左侧青砖墙上。繁体字，排列是从右至左，每字40×30公厘，标语全长3米。可惜写标语的单位及时间看不清了。据该祠堂附近居住的老人说：这是韶州师范宣传队写的，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像这样长时间还存在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标语，在当地十分罕见。

据了解，锦江村是长江镇政府的所在地，又是粤赣湘边沿的偏僻山区，人口不多，交通不便，开门见山，出门步行。像这样的大山区，韶师师生宣传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不畏艰辛，深入山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难能可贵。他们的宣传方式，短小精干，灵活多样，有戏剧、白话剧、民歌、歌曲、标语、图画、文字等。以唤起全民族，团结一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万众一心，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图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



(作者单位：仁化县长江镇政府)

长江抗日宣传剧团

刘森华

“广东省仁化县长江抗日宣传剧团”团章，是锦江农民林春旺 1997 年夏，在长江圩河边淘钨矿时淘出来的。团章为椭圆形，横长 4 厘米，中直径 3 厘米，双线边，繁体字；横书从右到左：上为广东省仁化县，中为国民党党徽，下为长江抗日宣传剧团，最下面是团章二字。浮雕字，铜质；后有别针，用于别在左胸前。

据调查，长江抗日宣传剧团，组建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团长戚明，人员有何棠、肖秋、肖庆升、刘尤、邓千秋、江燦、麦康等三四十人，均以纸行店员工组成。经费来源由长江纸行负责。演出节目以宣传抗日为主，自编自导自演，用粤剧、白话剧演出。演出时间一般在节日，从组建始至抗日战争胜利的 1945 年 8 月止。地点在长江戏台，有时也到县城上演。性质业余、义务，工人不要工资排练和演出。团章每一剧团人员各发一枚。戏台用的布幕是纸行私人捐赠，中间绣有“唤起民众”四个大字，右直书赠给长江抗日宣传剧团，左直书××× ××× ×××赠。

（作者单位：仁化县长江镇政府）

曲江东水农运概况

甘 烽

曲江东水地区（即韶关市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今曲江的大塘、火山、大桥、周田、黄坑以及浈江区新韶乡一带）是曲江农民运动的策源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兴起过农民运动，进行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曲江农运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曲江（韶关）地处粤赣湘交通枢纽，广大农民饱受兵祸、匪患、天灾的痛苦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要求解放的愿望非常急切。1924年9月，孙中山在韶关督师北伐，电召以彭湃为团长的广东农民自卫军（以广州农讲所第二期学员组成）和施卜任团长的广东工团军从广州开赴韶关，进行军事训练和担负宣传工作，谭平山、罗绮园、阮啸仙等人也随农军队伍，于9月21日到达韶关。翌日，他们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组成宣传队，到城厢内外宣传，发动群众支持北伐，开展工农运动。东水农民经过他们的启发教育，逐渐觉醒，要求组织起来。在阮啸仙、彭湃等人的支持下，东厢翻溪桥村及腊石坝村，分别组织起曲江县翻溪桥、腊石坝两个村农民协会（即犁头会，简称农会），叶国棠、叶凤章、黄希盘被选为村农会的执行委员。同年9月29日，两个村农会的全体会

员高举犁头大旗，参加了在韶关南较场召开的有 26 个团体共三千余人出席赞助孙中山北伐的大会，听了孙中山先生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参加了盛大游行。

翻溪桥、腊石坝村农会的建立，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用事实说明农民的重要，预示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此，前往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带动了全县各地农会的建立，成为北江地区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为了发展农运，翻溪桥村农会骨干叶凤章、叶发青、叶凤端、叶凤标、叶凤阳等人，去当地的莲花、府管、下陂、陈江各乡村，采取办夜校、教唱《农会歌》等形式，宣传组织起来的好处。在他们的宣传及农会的影响下，一些村、乡的农民组织起来了，相继成立村、乡农会。这样，农会的影响扩大了。后来，还派出积极分子到大塘、重阳等地，协助组织农会。在他们的帮助下，大塘区的一批村、乡农会先后建立，涌现了罗名声（大塘罗沙岗人）、廖文楷（大塘西林廖屋人）等积极分子。至此，东水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的兴起来了。到 1925 年春至秋间，曲江各区农会相继成立，全县已有 7 个区农会，141 个乡农会，会员达 11320 人。其中东水就有一区（东厢）和大塘两个区农会，一区农会负责人有叶国棠、叶凤章、叶凤标（后）、陈异峰；大塘区农会负责人有罗名声、余德招、卢家茂、杨省光、廖文楷等。

1925 年 11 月，曲江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韶关召开，正式成立曲江县农会。在选出的 17 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东水籍的就有王士宾、叶国棠、廖文楷、王良珍、叶凤章、叶凤端、罗名声、黄希盘、陈异峰、蒋兆甫、廖式瑜等 11 人。1926 年 7 月县农会改组后，东水地区的叶凤章、廖文楷、罗名声、黄希盘、廖式瑜、陈异峰、叶凤端等 7 人，仍

当选为县农会的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

1925年冬，按照县农会的部署，东水一带区、乡两级农会武装迅速组建了，王良珍、叶凤章、刘福先后担任一区农军中队长，罗名声担任大塘区农军中队长。他们自筹枪枝，制订活动计划，开展训练，提高了农军的素质，成为保卫农民利益的有力武装力量。同时，挑选了一批农民骨干编入县农军大队，叶凤章调任县农军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职。

自1925年至1927年春，在县农会的领导下，先后从各区、乡农会中挑选的130多名骨干送去培训。东厢的叶凤开、叶凤标、蔡标、陈异峰、廖福烈、叶剑群、姜红光、姜济舟、大塘的刘祝清、曾海棠、吕维汉、余茂修等共50多人，先后分别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四期，韶关北江农军学校一、二期，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和广东农民训练所的学习。他们经过政治、军事训练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成为东水农民运动的中坚，对发展曲江的农民运动，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党组织随着建立，以适应形势。1925年7月，省农会先后派丘鉴志、侯凤墀、刘胜侣、徐金良等人（均是共产党员）为特派员，到曲江开展农运和发展党、团组织。翻溪桥的叶凤章由于政治热情高，工作负责，经侯凤墀、刘胜侣的帮助和考察，于1925年12月在曲江（韶关）农会办事处（现韶关市下后街建国小学）与乌石的梁展如、重阳的欧日章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中共曲江县支部。1926年夏，叶凤章将翻溪桥农会和东厢各村的骨干分子叶凤标、叶发青、叶凤阳、叶凤洲、叶建荣、叶桂永、陈异峰、刘福等21位同志，在翻溪桥村先后吸收为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翻溪桥支部，叶凤章任支部书记，叶发青负责组

织（后任支书），叶凤标负责宣传。至1926年6月，东水有了三个支部，30多个党员。

1927年4月，东水的党员和农会干部、农军骨干约100多人，参加广东北江工农自卫军北上，因而，东水党的组织、农会、农军等停止了活动，实际已经解体。

1927年7月，大塘的地主豪绅勾结地方民团，进攻大塘地区农民协会，先后两次围攻罗沙岗村，妄图捕捉大塘区农会负责人罗名声，阴谋落空后，把全村瓦缸、炉灶砸碎。第二次更为疯狂，大肆抢劫民财，纵火烧毁祠堂3间，民房30多间，致使罗沙岗群众遭受惨重损失。在此情况下，罗名声只好暂且离家外避；叶凤章、叶发青等人，则巧妙地躲避了敌人的搜捕，待机进行活动。此时，白色恐怖笼罩着东水大地，给农运带来巨大的困难。

1927年冬，叶凤章获悉欧日章回到曲江，梁展如在乌石开展活动，喜出望外，便和欧日章一起到梁展如家会面，研究今后的斗争，决心重振旗鼓，继续开展农民运动。根据分工，叶凤章、刘福继续负责东水方面的农运。同年12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驻韶关时，在东河坝刘福家里，秘密会见了叶凤章、刘福、邓其森、叶发青、叶凤标等人。东水农会、农军领导人听了朱德的教诲，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此之后，叶凤章、刘福等人一方面加紧党的整顿、恢复工作，一方面继续组织农民自卫武装，坚持斗争。1928年2月间，恢复中共曲江县委，东水方面恢复了一区区委（后撤销），刘福、叶发青参加了曲江县委，刘福任常委，叶发青为委员。同年4月，在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叶发青被选为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广东农民代表。6月，他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

被选为“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和“广州暴动委员会”委员。“六大”结束后于8月初从苏联回到曲江。已经背叛农民利益，堕落成为地主阶级代表的叶国棠等人，勾结国民党桂系驻韶代表王应榆，于1928年秋，先后两次派兵围剿翻溪桥、洋村、石安等村，妄图一举扑灭东水的革命火焰。敌人极为嚣张，大肆焚烧屠杀，全村房屋被烧光，叶凤章的叔父被杀害，群众财物遭洗劫。由于敌人的疯狂行径，东水地区已难以立足，于是，叶凤章率领东水农会干部和农军骨干20多人，秘密转移到乌石鹅鼻洞，与梁展如领导的南水农军汇合，组成曲江县第四区农军大队，梁展如任大队长，叶凤章任副大队长，一起开展秘密活动。

1928年冬的一天，由于乌石反动劣绅的告密，正在塘面村活动的农军主要领导和骨干，遭到敌人的包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梁展如、叶凤章指挥农军英勇还击，击毙敌排长等10余人后，突出重围。在战斗中，东水农军叶凤洲、叶建荣两人壮烈牺牲，叶凤章身负重伤，在往马坝南华铁路背大窝细坑里时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东水农军遭受严重损失之后，其他革命同志只好隐蔽在群众之中继续坚持斗争。至此，东水农运转入低潮。

（作者单位：中共曲江县委党史研究室）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前夕渝江人民的革命活动

何群新

1949年元旦，新华社播发了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一支队电台收译后，支队机关报《北江报》立即转载、出号外，并编印了大量宣传材料发到全区广大军民中。通过广泛宣传，对渝江军民夺取新胜利极大鼓舞。

敌人的第一期“清剿”计划失败后，1月7日，国民党调派军事强人原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取代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原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薛、余上台后，为挽救败局，提出“肃清平原、围困山区”的第二期“清剿”计划。增调重兵，加紧对我队进行围歼。

北江第一支队根据《新年献辞》精神以及粤赣湘边纵队司令部关于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坚决反击敌人的进攻的指示，抓紧战斗空隙，对部队进行整训；进行形势、阶级、纪律教育；在全队开展立功竞赛的活动。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和提高了战略战术水平。

这年春夏，部队继取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翁源新江陈

公湾和磨刀坑、龙仙良洞、六里揽陂河战斗的重大胜利后，5月中旬，支队司令员何俊才、政委邓楚白率主力团乘胜向佛冈、新丰进军。

我队在佛冈挂牌径全歼国民党的三十九军九十一师二七二团一个营和拔除了大陂、烟岭、迳头三个敌据点，解放佛冈县北部之后，6月11日，主力团开赴新丰、攻打县城丰城镇。在本支队一团和东江第二支队第二团的配合下，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攻下丰城镇。俘虏国民党新丰县长陈中瑞和政警人员600多人，缴获敌人枪支、弹药及物资一大批，新丰获得解放。

接着，北江第一支队第六团解放佛冈汤塘等地；促成琶江国民党陈泽和部携带机枪三挺、长短枪100多支起义，改编为滙江人民抗征大队。

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和武工队，大力加强统战工作，瓦解敌人。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各地的政警人员和联防队，先后携械向我部队起义或投诚。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时，敌军狼狈向海南岛、台湾方向逃窜。至此，敌人的第二期“清剿”计划逐告“流产”。使国民党军队不仅不能占据华南，而且处处受到牵制、威胁和打击。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滙江军民的反“围剿”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立即投入迎军支前。

是年，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向前发展。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势如破竹，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5月22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江西省会南昌后，8月，由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等率领的南下大军抵达赣州市，准备解放两广。

9月上旬，在江西虔南（今全南）县乌柏坝活动的我武工队队长梁增托与大军接上头后，随即在广东翁源活动的中共潞江地委书记、北江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俊才、支队参谋长叶镜即率支队新编主力团部分部队到虔南乌柏坝大吉山矿迎接大军先头部队四十八军一四三师。

会面中，大军首长听取了何俊才对潞江敌情和全区迎军支前准备工作情况通报后，传达了叶剑英总参谋长关于要扫清一切障碍、保证部队南下顺利进行的重要指示；并共同研究了大军入境广东第一站潞江地区的具体事宜。

根据叶剑英的指示，何俊才等返回潞江地委、北江第一支队司令部驻地翁源后，立即向地委和县（团）级党、政、军负责同志传达贯彻，部署加紧落实叶总长的重要指示，以及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粤赣湘边区党委关于做好迎军支前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层层成立机构，切实加强领导；布置部队封锁堵截敌人外逃和外运粮食、物资；广泛进行宣传发动，组织民兵、群众，日夜抢修公路、桥梁，筹集了大批粮草、物资，准备大军的到来。

9月15日凌晨，北江第一支队派出主力团和第三团部分部队，配合大军一四三师之四二九团攻打国民党翁源县政府所在地龙仙镇。敌人负隅顽抗。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在我军强大火力和政治攻势下，当天下午五时半，敌人在其驻守的制高点当楼窗口伸出白旗，示意放弃抵抗。经过谈判，国民党翁源县上校县长官家骥和200多名政警人员放下武器投降。计缴获敌人迫击炮2门，重、轻机枪19挺，长短枪300多支和弹药、军用物资一大批，龙仙镇解放。战斗中，我军牺牲26人。

16日，北江第一支队第三团和一团，解放翁源周陂；不

久，五团（主力团）和二团、六团配合大军解放佛冈、英德、清远县。至此，潯江地区全部解放，为大军南下扫除了障碍。

9月中旬末开始，大军大部队从江西源源不断向潯江开来。这时，沿途群众，兴高彩烈，载歌载舞，迎接亲人解放军。在北江第一支前司令部的领导、指挥下，各级干部亲临现场，组织带领群众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在公路沿线圩镇及主要道路上设立接待站，供应粮食、茶水、马草；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巡逻，维护社会秩序；全区组织了一支拥有五万多人的民工队、担架队、运输队，为大军修桥补路、运送炮弹、物资等。使入境广东经过潯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四十八军、四十四军、四十三军10多万南下大军顺利通过潯江地区，挥师向华南重镇广州方向挺进！

潯江地区的社会治安、支前工作，受到指挥大军南下、在潯江宿营的叶剑英总参谋长等首长的高度赞扬。

为建立新中国献身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作者系中共翁源县委党史研究室高级政工师）

韶关飞机制造厂的兴衰

关中人

三十年代初，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间创办的广州东山飞机制造（修理）厂，在国内是享有盛名的。它在飞机制造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但由于设备落后，年产飞机亦仅两三架，远远不能满足广东空军迅猛发展的需要。广东陈济棠为了同蒋介石把持的南京政府抗衡，一方面派黄光锐、丁纪徐分赴欧美采购飞机，另一方面又派周宝衡负责筹建飞机制造厂。1934年初，同美国冠蒂斯——莱特（Curtiss Wright）飞机公司商定在韶关合办飞机制造厂，但为了掩人耳目，定名为韶关飞机修理厂，厂地选在曲江河之畔。

1934年4月，开始设计厂房，次年8月基建工程完成，耗资约30万元。工厂引进美国全套设备和技术，聘请美籍俄人萨克诺夫（Shaknov）为顾问、戴查理（Charles Day）为总工程师，谢零耀、雷兆鸿、陈作儒等20多名美国留学生为技术员，周宝衡任厂长，下设工务、总务两处；工务处下又有设计、建造、调配、材料、检查等科以及金工、白铁、机身、机翼、热铸、装配等车间，全厂职工500多人，是当时国内同类工厂中一间规模宏大、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工厂。除了修理和装配飞机外，还自行设计生产飞机。

1935年底开始生产自行设计的双翼飞机，名为“复兴”式，计划在此基础上逐步设计制造高级教练机、双座驱逐机、侦察机和轻型轰炸机。“复兴”式机计划生产20架（一说30架），先生产5架。试飞场为曲江河边的一大片沙滩，有的飞机升力不够，曾掉到曲江河中，但厂内职工并不气馁，边试造边改进，终于在1936年5月20日制成第一架“复兴”式飞机。试飞成功后到广州进行飞行表演，并与波音飞机模拟空战，性能较好，时速288公里。之后，这架飞机即调去部队服役。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央空军第30中队卢誉衡副队长、陈顺南分队长均曾驾驶“复兴”式飞机接送周恩来往返西安至延安之间。

1936年6月，发生“两广事变”，7月陈济棠下野，8月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接管该厂，改名为韶关飞机制造厂，梅龙安被任命为厂长。第一架“复兴”式飞机试飞成功后，经过改进设计，又制出第二架，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生产了“复兴”式飞机4架。在此期间，还装配了波音P—26A飞机11架。

1937年8月，林福元任厂长，奉命仿制霍克——Ⅲ双翼战斗轰炸机30架。从1937年8月至1939年4月，共生产霍克——Ⅲ30架^①，新式“复兴”飞机2架，修理旧飞机14架。霍克——Ⅲ745匹马力，最高航速为384公里，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从1937年8月31日开始，韶关飞机制造厂就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特别是1938年之后，工厂不断遭日机轰炸扫射，被迫分散到附近黎市、沙尾、桂头等地的深山密林中搭茅棚生产。但由于交通不便，条件简陋，给生产造成很大困难，加上广州日益受到日军威胁，

形势越来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长期抗战，1938年4月林福元奉命把工厂内迁至昆明。林即与美籍总工程师戴查理前往选址，最后选定在昆明市西郊的昭宗林附近。那里是两山夹着的狭长地带，地处滇缅公路近侧，距昆明7公里，地形隐蔽，交通方便，是战时厂地的理想地方。同年6月，设立韶关飞机制造厂驻昆明办事处。厂房由航委会驻滇建筑工程师刘俊峰负责设计和督建，由大仓公司承包主要工程。

工厂内迁，主要设备，例如立式电炉、100吨四柱油压机、氧气机、焊接机、冲床、带锯、刨木机、自动铆钉机、配电设备等，先拆卸运香港，经过越南与海防沿滇越铁路运抵昆明。员工分海陆两路到昆明。陆路员工还曾在湖南衡阳，广西桂林、柳州，贵州贵阳等地设临时工场，继续装配飞机和修理战争受损的飞机。1938年底，到达昆明的员工约300人。1939年1月，工厂改名为航空委员会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②。

韶关飞机制造厂厂房被炸后，其建筑材料被人拆除变卖，被盗一空，从此飞机制造厂变为废圩。

注 释：

①霍克——Ⅲ产量尽管有种种说法，但基本上比较一致：新产霍克—Ⅲ30架（一说40架），另修旧14架，共44架（40余架）。至于“复兴”机产量，众说纷纭，差异较大。一说30架，一说12架，一说4架，还有一说4架另新式的2架，即共6架。最后一说似较实际。

②一说开办时定名为韶关飞机制造厂，至陈济棠下野后改为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不确。

铜韶忆旧

——和平路的昨天

鲁韶

韶关市和平路，是韶关市区岛内一条颇具现代城市派势的大马路。路两旁高楼林立，热闹繁华，为粤北古老山城增添了不少风采。昨天是怎样的一条街道呢，笔者抗日战争前即居於此，现追记如后，权作韶关市街道沧桑的历史点滴资料。

和平路原各罗沙苍，东连风度中路，西接武江河边，地势自东向西倾斜，从高街口杨家开始，向西两旁民屋都是拾级登门，有的三、四级，七、八级，最高的高码头杨家（高街口）有十一、二级之多。每年春雨到来，大水浸街，行人叫苦不堪。

该路面宽约二、三米，取材鹅卵石、麻石、青石铺成，凹凸不平。整条街只有十余杆杉木电灯柱，灯光几盏，暗淡异常，灯柱上挂着一个装死鼠的铁皮箱。那时没有环卫工人扫街，也无拉圾桶，只有不定时的押来一些穿着囚服的犯人扫街，还有一个老汉背着个竹箩筐，上面写着“敬惜字纸功德无量”沿街收集废纸。街上清洁卫生全由各家各户“自扫门前雪”。在近圣堂巷口更楼上住着一个打更老人，每晚一小时

一次，敲着竹筒给街坊报时，辅以巡逻防犯小偷小摸。

罗沙巷是市区进出东西河郊外的一条主要通道。不管天晴下雨，天刚亮便有人经过，如卖菜的菜农，菜贩，挑集肥料的农民，肩挑小贩等都是常客，整个上午络绎不绝。“午时炮”一响（当地政府每天十二时点炮报时，人称“午时炮”），一个个似曾相识的熟面孔又匆匆而过，重走罗沙巷回自己家园去，有笑声，也有叹气声、吵嘴声。这时候不少居民都站在自己家门口看看有无卖剩的便宜货如瓜果蔬菜山货等。

下午四时后，巷内又是另一种风光：街上出现了三五成队一群群小孩，在玩游戏，跳飞机，滚铁圈，踢毽子，跳绳，童声稚语，好似孩子乐园。太阳西下，大家回去洗澡和晚饭。紧接着货郎担到来先是卖洋什的，多是青年男子，扁担一头是玻璃木柜，里面放满各式各样针线、红头绳、发夹、头油、香水等妇女用品；另一头是个木架，载着一桶煤油（俗称火水油）。他一到，居民便纷纷拥前。那时，居民用电灯的不多，普遍点煤油。妇女又不习惯到风度路的大商店买东西，所以生意不错。入夜了，买甜品的到来，多是老头，挑着两个箩筐，放着几个瓦茶煲，还有二个炭炉，品种有绿豆沙、芝麻糊、杏仁茶、鸡旦茶，冬天还有热蔗。深夜里，湖南人挑着云吞面，竹板声响个不停，忽远忽近，随叫随到，送货上门，居民不出街可吃上宵夜。

当年没有自来水，居民食用水有二处：巷东头有罗沙井，这是城内较好的一口古井。井口是青石围成，高约一米，年岁日久被绳索磨出道道沟痕，井深十多米，水清润甜，冬暖夏凉，从早到晚，数以百计男女老少都来挑水，有少数的是专给店铺、人家挑水卖，这种人甚为苦累，其中有位钟姓妇女，个子高，体力好，她靠此为生，而且还供给孩子读中学，

儿子毕业后考进了邮电局工作。居民都称赞她们母子。钟亚婆解放后仍健在，90余岁才去世。巷西头有罗沙巷码头，这里既是个船只往末靠岸的码头，经常泊有船艇，也是居民食用水挑水码头。那时武江河水清澈见底，算是洁净，不过上上落落几十级码头挑水倒很辛苦，特别是雨天，不时有挑水者滑倒。

罗沙巷绝大多数是民用砖木结构的平房，比较宽大的是康家（即现今居委会一角）、陈家。据说康陈两家都是清代时期在韶关较有名气的官僚住宅。康是外地人，陈为本地人，主人早已是破落户了。杨家祠为粤北杨氏宗祠，座落在巷东头，住户都是杨氏族人，多是贫苦人家，以小贩为生。对面有间江西会馆，是赣南人在韶集散之处；西头近江边有同仁善堂，灾荒时施粥施赈。

在众多居民中，高街口杨家，称得上是较为知名的门户，户主为本县龙归人。杨家之所以在巷内知名，除了该屋要走十几级码头才能进去，站在门前薰风南来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还有一些情况别家所无。第二代，杨老二、老四，民国初期均在外当过官。老四是莫雄旧部，在北江绿林中有名气，抗日前收山闲居。老二的大儿子年青时曾在汕头从政，失意后取杨济公之名，号称看相大师，常出入於市内大酒店，抗战初各躁一时，不少达人妇女登门请教。杨平日长衫马褂，遗老古风保留，杨不幸于曲江沦陷回到龙归被日寇杀害。除外还发生过老四的老婆打麻将牌，孩子扒上窗掉下街跌死了，以及老二儿子杨德威玩旧破手榴弹被炸断手指的事。不过最为人知的是杨家有个女婿姓邓，系国民党军队旅参谋处长，黄埔军校毕业生，淞沪抗日在上海英勇牺牲，后来在韶关举行追悼大会，杨家也就成了新闻热点了。

唯一的一间什货店昌隆，座落在亚魁里（群乐里）右边，老板是广府人，经营南北京果、油、盐、柴、米、酱、醋、茶、烟、酒、海味。他天亮开门，晚8时关门，以后还专开一个小窗，方便街坊，保持24小时营业，人们随时拍门可买到东西。店风优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因此博得街坊好评，生意兴隆。附近“马盛祥”系湖南人开的木匠店，手工精美，城里城外不少人来订做嫁妆和木箱床柜。还有一间车衣店，系佛山人姓黄的师傅开的，夫妇同做，还请帮手，街坊称女的“四姑”，男的称“四姑爷”。旧历年到，生意特别好，还做狮头被、彩服。夫妇年老，在日本投降后搬回佛山安居。

巷里有庙宇三间，即县城隍庙、陈公庙、康王庙。城隍庙是城内较大的庙宇，座落高街口右边，有大小泥塑、木雕二、三十个，其中正殿的城隍爷高高坐着，威严肃穆，使人望而生畏。庙内只有庙祝公一人负责管理。殿宇高大，黑暗阴森，平日甚少人到此，只有本巷小孩进去玩耍，捉迷藏追去追来，更有跳皮小孩在菩萨面前拉尿、扔石，庙祝公见到就把他们追赶出去。但逢年过节能香火旺盛，城里和东西两岸百姓都来拜城隍爷，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庙门前南面有座约三米高的戏台，演戏时观众站在街上和庙门前石阶上看，没有凳子坐。这个戏台后来因市内有机院便无什么作用，变成了一间私人锯木场，不少居民都来这里取木糠做燃料。陈公庙、康王庙分别在圣堂巷和西斗街附近，这两间庙规模较小。一条小巷就有三间庙宇，可见当年韶关古镇迷信风气甚是严重。

在平治巷口附近有南华戏院，以演湖南班为主，有时也演粤剧和魔术，如《真枪打美人》和睡在钉床压上大石用槌敲打，小丑吃铜板拉铜板引人发笑的古老传统节目。近十八

街（壮志街）口有新世界电影院，那时看电影叫看影画戏，起先是无声电影，放映时楼角上有位讲解员为观众讲解戏文，观众边看边听，好似听讲古似的；抗战以后改为有声电影，记得放映《关东大侠》时，广告宣传很厉害，宣称该片是中国唯一武侠机关惊险斗打片，中国第一流武侠巨星查瑞龙、郭丽珠领衔主演，数百男女演员合作不可不看。果然轰动韶城，场场满座。其时电影院治安不好，看坝王戏者天天都有，常有国民党军队官兵、伤兵打架闹事。其中发生一起凶杀案：1943年6月22日上午10时左右，正放电影时，守门员邱紫金枪击看坝王戏的黄仲铭，致使黄伤重毙命。邱畏罪潜逃，引起全城人民议论纷纷。案情结果，不得而知，此后看电影也心有余悸。但没有钱买票的小孩照常每天“打戏钉”过不花钱的电影瘾（散场前十分钟，让人不买票进场看电影叫“打戏钉”。）

韶关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新军伐混战和蒋介石围剿苏区，常派部队进驻，路过韶关。罗沙巷庙多，又有康、陈大院，又是西河通往市中心重要通道，故时有军队驻扎，有时半个月，有时三、二天。每次军队来时，家长便叫妇女、小孩无事不要上街，晚上更要关门不出，怕出事（如被抓壮丁、抓挑夫、调戏妇女）。那里逃兵很多，被抓回来，他们就在街上集合队伍、杀鸡警猴，令逃跑的士兵趴在板凳上，叫另一个士兵举起扁担大打屁股，打得哭声连天，皮破血流，居民闻之无不难过痛心，老人说，饿死也不让孩子去当兵受罪。

广州沦陷后，韶关成了战时省会，人口增至20余万人。罗沙巷原来居民变化很大，闲着的房子租给了逃难来的人们，日寇飞机常来轰炸，国民党政府在罗沙巷西头架起一座浮桥

横跨武江，便於市内居民走警报。每当警报拉响。罗沙巷成了一条人流，拥向浮桥向西河疏散。此时，罗沙巷真成了市民一条逃命之路。1938年和1939年两年间，罗沙巷多次被日本飞机轰炸，不少人家，家破人亡，无家可归。城隍庙、陈公庙如泥菩萨过海，自身难保，也被炸为平地，后被修建成两个简便防空洞。一次，陈公庙侧的防空洞被炸塌落，几十名居民被活活埋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罗沙巷人民的一笔血债。

最使人怀念的是罗沙巷十九号民房为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管东渠）区委农委北江办事处所在地。八号二楼是1939年中共广东省委创办的《新华南》机关刊物社址。这两处现已无痕迹留下，是文物保护的一个损失。

杨新先生生平事略

甘 峰

杨新（1911—1995），原名杨宜政，又名杨义海，曲江居港知名开明人士。他曾受聘为韶关同乡联谊会有限公司第一届名誉顾问、曲江海外联谊会顾问、香港曲江同乡联谊会永远名誉会长。一生潇洒动荡，有过许多传奇式且鲜为人知的事情。

据《杨氏族谱》记载，杨新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出生于曲江县马坝小坑杨屋村。其父杨作栋（松生）为清代文武秀才，民国初期，在孙中山先生北伐时任过独立团团长，后升任混成旅旅长，为旧民主革命作出过贡献。其母蔡义英，生有七子一女。杨新排行第三。

杨氏先辈，自古重视教育，有书香世家之称。少年时代的杨新，由于家中在马坝街开有一间饼铺做小生意，因此有幸在马坝街“三圣公”私塾启蒙，接受较为良好的教育。但好景不长，主要是兄弟姐妹渐多，家境衰落所至，他读至初中便辍学，尔后迁回小坑细坝子村做屋、耕田、成家立业，度过了艰辛而漫长的岁月。

青年时间的杨新有极强的自强自立的精神。抗日战争初期，他不忍再过清苦难言的农家生活，偕妻张氏搬迁到马坝

街居住，先是以修理单车为业，继而在马坝火车站旁把一块池塘沼泽地用泥填平作耕种。经过几年，他事必躬亲，付出的汗水和辛劳得到了温饱且有点积蓄的回报。当时，他在马坝创下了两个第一，即“电灯（110伏）第一家”、“汽车第一家”。因而群众刮目相看，国民党方面也认为他有能力，委任其为马坝街即第五保保长。

1945年1月曲江沦陷后，侵华日军到处掳掠。尤其是其老家小坑细坝子村被日军洗劫之后，更激起了杨新的民族义愤。他在堂叔杨维常（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和二哥宜民便参加了曲江联乡抗日自卫委员会，宜民担任马坝第一大队大队长，他也担任中队干部。其间，杨新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参与在马坝、沙溪、罗坑、龙归等地抗击日军的战斗，为抗日保乡做过有益的工作。

杨新是一个性格开朗，八面玲珑，善于两面逢迎的人。因此，在他的人生中，左中右的朋友都有，与三教九流的人都合得来。

1945年4月间，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第三挺进支队企图在我曲江抗日游击队总部沙溪乡“鸠占鹊巢”的阴谋被挫败之后，杨新曾当向导引路送彭孟缉部西渡北江离开曲江前往英德，给彭留下人去人情在的印象。十数年过去，杨新在港定居期间，巧被邀请到台湾参加国民党“双十”节活动。当彭孟缉（时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得知后，给杨新以厚待，生活上的照顾不在话下，还派出专车送杨新到各处观光游玩，所到之处，各受敬重，好不威风。

与此同时，杨新也和南华寺方丈维因支交往甚深。杨新到港定居后1988年第一次回乡，便在曲江县政协领导的陪同下，亲切拜访了维因方丈，相聚叙旧，津津乐道，并合影留

念。

解放战争时期，杨新主要是在马坝至韶关搞汽车运输。先期他还担任过马坝乡自卫大队长，尔后还参加过忠义堂为大哥，与地方上的捞家混得很熟，人面也很广。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帮助游击队？他坦率地说：“搞革命的，不是朋友就是亲戚。”确实如此，自1947年至1949年10月曲江解放，我地下党十分重视做好统战工作，先后派出何远香、陈云、杨发威同志作为杨新的联系人。由于各种关系，甘锦轩、何远赤、何耀爵等地下党的同志也较常与他接触。因此，我游击队所需的弹药、药品等物不少都是通过杨新出面购买的。据了解统计，杨新先后为游击队购买子弹2000余发，炸药15公斤，送给游击队手枪2支、子弹400余发。更有趣的是，有一次，他从妹夫何远香处得知曲江工委书记赵学光的手枪只配有3颗子弹，认为不好看，便自告奋勇跑到国民党39军驻马坝军部将手枪子弹配齐至30颗，再转送到枪主手里。1949年6月，为保护曲江大桥，游击队大队长何远赤出具了捐粮通知，杨新不但带头捐谷，还积极协助我地下党员在马坝做捐粮动员工作，并把四、五万斤谷的折款交由张永芳同志转送韶关地下党。自1948年4月下旬至1949年9月的17个月里，杨新接受我地下党的规劝，利用他的特殊身份，组织二、三十个捞家在马坝街开设了三张赌博摊台收取台费，直至我地下党员、时任马坝乡乡长的罗玉麟被捕日（1949年9月28日）止，共收光洋4000多元，全部缴作游击队经费。10月7日曲江解放当日，杨新还亲身驾车到韶关，送曲东区委副书记何耀恒同志到韶关去接收大塘区政权。

曲江解放不久，广州急需人民币流通，由于铁路不通，汽车运输又怕途中遭匪徒打劫，因此，粤北剿匪总司令莫雄和

曲江县长黄桐华通知杨新予以协助。在商量有关事宜中，南下大军代表认为必须带一连兵力押送，而杨新则认为这样容易暴露目标，危险更大。因他熟知土匪的属性，并自告奋勇只带一支冲锋枪，多带一部空车即可完成任务。在场领导同意了方案。

果然不出所料，杨新带着装满人民币的车队在花县遭到土匪的拦截。杨新表明“大哥”身份后，大胆机智地与拦匪舌战。当众土匪查问车上运的是什么东西时，杨新回答说是政府的东西。当又追问为什么要帮政府运时，杨新圆滑地说：“政府相信我，我有什么办法”。这些土匪碍于杨新的面子，而又不甘捞不到东西，便愤愤地对杨新说：“杨大哥，给你过又不好，不给你过又不好，下次不要这样搞了！”杨新回答道：“请转告××哥，代为多谢！”于是，顺利地把26车人民币送至广州。杨新也得到时任省领导叶剑英、方方等同志的热情接待，并表扬了他做了一件大好事，交待他回曲江后协助莫雄司令、黄桐华县长把地方治安搞好。

杨新完成这次任务后，县政府领导对他的看法已有转变。然而，地方上有人恐吓他，说忠义堂的人都要抓起来，他因是忠义堂的大哥，便第一次出走香港。县里领导得此消息后，认为杨新此举多余，通知何远香做工作，结果，杨新从香港回到马坝。没几天，杨新便接到去马坝黄家祠举办敌伪人员训练班的通知，在街上巧遇黄桐华县长，当黄县长得知此事后便对杨新说：你不是这类人，回去，回去！

杨新还是干老本行——马坝至韶关的汽车运输，对新办的马坝供销社运货从不收运费。一次，在狮子岩山洞隐藏着陈冬明等5个土匪，经解放军和区乡民兵包围了三天三夜，一时难以剿灭，马坝区便通知杨新出面协助在洞口呼叫，结果

陈匪愿意投降自首，从山洞走出来，然而，某副区长可能是出于义愤，不顾俘匪政策，立即举枪将陈匪当场击毙。杨新目睹感到惊讶，心有余悸。

1951年冬土改时，杨新家庭成份划为中农，土改复查被定为“反动富农”。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杨新便被当地民兵扣押管制。其间，杨新便巧妙地再度潜逃香港避难谋生。

杨新先生平生不求发财，只求两餐。到港后，他先在大揽冲打大工，搞建筑、承包树山砍伐、开石场、耕田也都做过，渐渐地家业有所扩大，加上他待人诚至，大陆过港的人也乐意在其手下打工，先后有过几十人。在港期间，他有过三次发财的机遇，如国民党撤退时，在香港开有不少工厂，他人熟面广，开口叫他们拿一二个工厂管理是很容易的事，可他没有开口；又如在承包工程中，老板没钱，意欲拿几栋楼房抵押作工钱，他没有要；再是1961年巴西有一富商叫他去办实业，他变卖了全部家产准备前往，适逢巴西搞政变，再是考虑身边的人合作不力而放弃。

1962年11月，杨新在香港蕉经租用四、五亩官地，同时开办“新记士多”铺头经营日常用品，先后任过蕉经菜站副理事长、理事长。他常说，自己没有钱（即钱不多）也要支持人家。因此，整个地区，很多熟人可以得到他出钱坐车或饮茶。尽管杨新年已80高龄，当地人都还拥戴他担任香港新界菜农理事会常务理事。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杨新先生在港先后与曲江县侨务办及曲江县的一些党政主要领导多次接触，沟通了与家乡的信息。1988年，饱经沧桑的杨新先生首次率团回曲江观光，终于在有生之年回到了日夜梦想的家乡，得到曲江县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同时，他通过探亲访友，更广泛地

了解家乡的巨大变化。尔后，他心动了，不顾耄耋高龄连年回乡达七、八次，并在马坝街购买了一套房子。

杨新先生认为，能为家乡做点有益的工作，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于是，他1990年9月受聘为曲江县海外联谊会顾问，1991年12月受聘为韶关同乡联谊会有限公司第一届名誉顾问，1994年6月受聘为香港曲江同乡联谊会永远名誉会长。为做好韶关、曲江与香港方面的联系工作尽了绵薄之力。

1995年4月20日，杨新先生因病与世长辞了，享年85岁。曲江县政府及韶关海外联谊会、香港曲江同乡会、曲江海外联谊会都送了花圈或花篮，并委派了曲江县外经委主任何著东同志赴港作全权代表参加悼丧活动，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爱国爱乡人士的一片深情。

（作者单位：中共曲江县委党史研究室）

于光远在翁源的抗日活动

官永辉

于光远，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早年在翁源的革命活动却鲜为人知。抗日战争初期，他曾在粤北翁源活动了三个月，带领抗先队员，在当地进行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亲自领导和指挥军事演习，掀起了翁源的抗日救亡运动，为翁源的党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对广东省建党和发动游击战争的工作作了全面的部署。于光远当时是广东省委领导的青年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因为北平“一二·九”运动后，于光远一直从事青年工作，去广东工作前在党的长江局青年运动委员会担任委员，在党外，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的一个部长和总队部武汉办事处主任。因为武汉局势紧张，党就派他到广州建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南工作部工作，并帮助广东省委开展青年工作。在广州沦陷前夕，当时广东省青委书记吴华同志到延安开会去了，原先他负责领导的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这是广东省最大的青年团体，也是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总队部党组织工作就交由于光远负责。由于形势所迫，于光远同“抗先”的二百多个同志一起从广州撤退。省委有的领导也在这个队伍中。这

支队伍到了西江地区的四会县的一个叫凤凰村的村庄开了几天会，对这支队伍的党员和非党员的抗先队员，分配到广东各个地区的工作作了一个具体的布置，于光远和邓楚白、梁嘉等 10 多位同志分到粤北地区的翁源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个分队叫抗先 119 分队。

抗日宣传

到达翁源的那一天，正是日本飞机对县城进行轰炸的一天。城中居民已四处逃散，整个县城都被炸毁了，抗先队员找不到住的地方，于光远就在一家棺材店的棺材盖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抗先队员步行到龙仙圩，并以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战地动员委员会领导的战时工作队的名义和当地的上层人士见了面。这个名义是在广州沦陷后的第二天，在佛山市的广东省国民政府才答应给他们的。有了这个合法的名义，他们每个人才能够得到一个国民党二等兵的待遇，即每个月可以领取十元零五角钱的饷金；有了这个合法的名义，他们才好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

于光远一行到龙仙后，集中整训学习了约一个星期。学习的内容有：政治形势、统战工作、游击战术、学生、青年、妇女、反特、反奸、反托等。于光远是讲课人之一。整训学习结束后，抗先队决定到周陂、龙仙、江尾三个点分头开展工作。于光远开始在周陂，后来也到龙仙来加强领导。他公开不担任什么职务，实际是抗先队内部的决策人。

于光远率领的抗先队，在翁源的东部、龙仙这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由于抗先队人员中，有的会唱，有的会演，并

明确分工，分别负责学习、歌咏、演剧等宣传活动工作。每逢圩日集中进行学习，到街上演讲、演戏，公开以抗先队的名义出墙报、贴标语，与群众打成一片。当时抗先队规定：每个抗先队员都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同食、同住。这样抗先队便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并逐步扎下了根，与群众关系密切了。抗先队从开始时被群众认为是“戏班子”，而逐步认识到是一支抗日的宣传队伍，是来帮助老百姓共同打日本鬼子的。当时不少青年，还有妇女都纷纷要求参加抗先队，第一批有1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龙仙江下陈姓青年。这一批作为骨干力量很快形成，为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随着抗先队伍的发展，决定正式成立抗先龙仙队部。队部成立时，周陂、江尾等地抗先组织都派出代表来参加演戏联欢，最后还照相留念。到了1939年春，龙仙抗先队已发展到300百多人，其中抗日自卫队就占了三分之一，还有小学教师、农村知识青年、妇女、各阶层爱国人士等。群众被广泛发动起来后，龙仙的抗日救亡工作很快掀起了高潮。

统 战 工 作

抗先队进驻龙仙后，在做好群众宣传教育工作的基础上，还十分注意做好当地上层人物和抗日自卫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于光远领导的抗先队想抓翁源县的枪杆子，所以他们的工作方法是：一方面同上层人物来往，另一方面是做好群众工作。事实上，抗先队来到龙仙后不但和江下陈屋的地主来往，而且和国民党县长也来往。对当地有名望的大乡绅陈霜根、龙仙抗日自卫中队长陈发源等开明人士，抗先队都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从而

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陈霜根为了使抗先队避免顽固势力的干扰，主动让出房屋给抗先队做驻地，陈发源把在龙仙老街祖传的“五德堂”空出来做抗先队队部等。

当时的龙仙属五区，区长兼龙仙社训总队长谢仲鹏是梅县松口人。而抗先队中的陈华（温京）与他同乡，并且与他的夫人是小学同学。因此，于光远等决策人将陈华分配到龙仙抗先队做负责人，以便对谢开展统战工作。谢的社训总队共有 300 多人（枪），下设大、中、小队，抗先队中的党组织非常重视这支武装队伍，准备把它争取过来共同抗日。因此，党组织指示陈华利用与谢的同乡和他夫人同学的关系，做好谢的思想工作。谢本来政治上比较开明，有同情和支持抗日之心，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于是陈华便向谢提出，派抗先队员（女同志除外）到自卫队中去担任政治教官，谢欣然同意了，并专门设宴招待，他还郑重地亲自为每个教官发了聘书。抗先队员取得了这个合法身份后，开展工作就更为有利了。

抗先队除了对自卫队开展统战工作外，还对指挥权掌握在当地的国民党和地主手里的保安团开展统战工作。保安团的队员们都是很朴实的农民，于光远派抗先队员去保安团中开展思想工作，经过培养、考察，发展了好几个党员，为党增加了新生力量。

军事演习

翁源离广州只有 200 多公里，广州沦陷后，飞机不断到翁源轰炸，国民党党政机关大批迁移到翁源县。特别是三华

一带，穿军装的人越来越多。余汉谋的十八集团军总部就设在三华镇。日本兵占领翁源的可能性愈来愈大。因此，于光远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抓得特别紧。在抗战前，于光远以民先队员的名义在北平参加过游击战争知识的学习。因此，抗先队员们公认于光远为游击战争的“专家”，决定进行一次军事演习。

一天，在于光远同志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抗先队员、学生和龙仙抗日自卫队在江下村抗先队的驻地到李村的两旁山道上进行了军事演习。参加人数有三、四百人，抗先队和学生为防守一方，抗日自卫队为进攻的一方。当时布置双方每个人削一根竹杆作为枪枝，装上若干个松果作为手榴弹。每个人手里有一串鞭炮，响起鞭炮就作为接头。规定以手榴弹为中心，若干米内周围的人就要伤亡。演习开始后，双方非常认真，进攻的一方自己拟定了进攻的路线，不是按照平常的道路来进攻。担任埋伏的一方揣摸进攻一方要走的路线，选择自己埋伏的地点。“战斗”打响了，问题是“该死”的不肯“死”，手榴弹扔到身上还继续战斗。有一个自卫队战士，把用来点燃鞭炮的香丢失了，这样枪就哑了。他着急得不得了，就跑到附近的土地庙里跪着祷告，向土地爷借了一把香，继续战斗。演习结束后，于光远做总结，讲了游击战术的要领。

这次演习，收效很大，影响很深，使大家初步掌握了一些军事知识，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为日后组织抗日游击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发展党员

广州沦陷后，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翁源地处

粤赣边，在当时是带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地方。抗先队遵照广东省委指示，在农村新区开展建党工作。因此，抗先队来到翁源，表面上是做抗日宣传工作，实际上工作重点是做群众工作和发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当然，发展党的工作是很谨慎并秘密地进行的。

翁源由于地处粤北山区，交通不便，政治闭塞，经济落后，红军没在这一带活动过，很少受到革命影响。因此，中共党组织在中国大地诞生十多年，在翁源却只有那么点点星火，几乎没什么影响。直到抗先队总队部党组织工作负责人于光远和省抗先总队委员陈中夫和邓楚白等同志率领抗先119分队来到翁源后，翁源党组织才迅速发展起来。

1938年11月，抗先队在龙仙整训后，由省委青委副书记梁嘉代表党组织宣布成立中共翁源特别支部（领导机关设在翁源中学），书记邓楚白负责领导翁源的建党工作。当时分配到龙仙开展工作的抗先队员，还不全是党员，只有抗先队的骨干于光远、陈华、陈祥等人是中共党员。于光远一行的工作几乎是以宣传抗日为中心，通过宣传教育从中发现培养建党对象，发展一批党员，建立党的地方组织，从而使党的组织开始在龙仙生根。经过抗先队的努力工作，抗先队中党组织的发现培养，慎重审查决定了第一批建党对象：陈文性、陈冠元、官世爵、吴克忠、沈式添、官云卿、官世圭、官世沐、官世拔、谭七（女）、陈惠金（女）等10多人。其中在1939年春节前已发展了陈文性、吴克忠、官世爵等人。计划在清明节后吸收一批党员，成立中共龙仙支部。由于设在韶关的广东省委调于光远回省委工作，于光远将酝酿成立中共龙仙支部工作交付陈华等同志完成。

1938年农历除夕，是于光远在龙仙的最后一天。白天，老

乡们给他送来了一桶用柑树叶煮的又香又绿的洗澡水。他用这桶水将皮肤洗得又香又干净。晚上聚餐，同志们为于光远饯行。吃饭后举行了一个欢送晚会。这次晚会名叫“坦白晚会”。这次坦白会大家确是名符其实地讲，每个人都谈了，大家非常有趣，毫不保留地讲出了个人的“秘密”。但是，轮到于光远时，他三言两语就“滑过去”了。

于光远带领抗先队在龙仙开辟工作，虽然只有短暂的三个月，但是，他在这块当时还没开垦的“处女地”上辛勤耕耘，播下了一批红色的革命种子。抗先队员们在于光远的领导下，时刻不忘执行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苦深入的工作，唤醒了民众，团结了各阶层人士起来抗日，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准备建立抗日武装，以党的“三大法宝”去开展工作，起到了“拓荒”的作用。

（作者单位：翁源县委党史研究室）

刘怀汉烈士传略

李启民

刘怀汉，始兴罗坝乡淋头人，1924年×月生于韶关。其父刘瑶江是前清秀才，向以教学为业，长兄刘铁是抗日时期爱国军官，二兄刘韶棠是中共党员。

怀汉自幼受家庭良好教育，六岁随父在韶州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又随父亲就学于曲江县立中学。抗日战争时，日寇骚扰粤北，战局紧张，便转学于始兴中学读二年级。毕业后考入韶州师范高中，于1943年考入中华文化学院，1945年粤北沦陷学院停办才回到淋头老家。怀汉天资聪慧，性沉静，勤奋好学，品学兼优，深为父亲及其家人喜爱。

怀汉自小养成乐于助人的品德，对贫苦人民极富同情心。在韶师附小读书时，常和大姊去帮助学校附近盲老院的老人挑水做饭。回到家乡也常帮助穷困的邻居解决困难。在韶师读书时，有位同学患伤寒症，病情危急，亲人在始兴一时赶不来，他便日夜守护在病人床侧，为病人煲药护理。平时常将自己的积蓄资助贫困的同学和朋友。

在始兴中学读书时，因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于1940年3月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的教育下，思

想境界更高，为革命学习更勤。为了避免校方的干扰，他在东门街租了一间小房，常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著作及有关共产主义基础理论的书籍。他常说：“为了解放中国劳苦大众，解放全人类，必须学好本领，充实自己的知识。”并以此鞭策自己，勤奋学习孜孜不倦。

在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中，他自觉努力去做团结教育同学和朋友的工作。他常利用各种机会向同学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同大家一起研讨社会发展规律，从中教育启发大家懂得劳苦大众为什么穷？穷的根源在那里？为什么社会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道理。进而引导大家认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的必然性真理。在他的教育下，许多政治思想较落后的同学都提高了政治觉悟，有的同学还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

1945年2月日寇侵犯始兴县境，我党组织风度抗日自卫大队，开展保乡卫国抗日武装斗争。为加强部队的骨干力量，党需要怀汉同志到部队去，他没有半点犹豫，毅然离开年老的父亲，向朋友借来一支驳壳手枪参加抗日风度大队。

在部队时他担任政治工作，积极协助政治指导员用共产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道理，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战士，使队伍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严明的纪律，增强战斗力。虽建队不久，曾数次击败武器比我们精良的日寇、汉奸和顽固派武装。队伍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拥戴和支援。

1945年7月23日我风度大队打退了日本侵略军，光复了始兴城。蒋军为抢夺胜利果实，用多于我们数倍的兵力向我部队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部队暂时转入山区坚持斗争。怀汉与副大队长郑屏带领一部份人在柑子园一带活动。

当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公历8月21日）晚上，怀汉与郑

屏、陈颂尧、刘青达等四人去柑子园何屋执行任务，被坏人察觉密报蒋军。七月十五日凌晨突然被蒋军三、四百武装包围。当时若他们采取黑夜突围是可以脱险的，可是，怀汉、郑屏两同志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为了顾全群众利益和我党我军与群众的密切关系，他们化装在群众中间以便混过敌人耳目。但终被敌人认出，刘怀汉等七人（其中三名民兵）不幸落入魔爪。

怀汉同志不愧是坚强的共产党员，人民战士。被捕后敌人对他施用吊飞机、灌辣椒水等酷刑，企图胁迫他供出我军我党活动情况，和承认“危害民国”罪。怀汉予以严词驳斥，并反问敌首：“我们打日本，保家乡有什么罪？”旧历七月十八日刘怀汉被绑赴刑场时，仍坚持对敌斗争，一路高唱悲壮雄伟的《国际歌》，高呼“打倒蒋光头！”“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刘怀汉同志为共产主义理想，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怀汉精神应颂扬，浩气冲天斗志昂。敌协不屈宁流血，《国际歌》声震刑场。”我们应该学习怀汉同志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布衣诗人廖柴舟生平事略

杨民生

廖柴舟，初名燕生，后改为燕，号柴舟，又号梦醒，祖籍乳源县侯公渡镇青水廖屋村，后迁居至韶关（曲江）市西河芙蓉山下的大庙村（坊）。只因他是一个站起来似竖了一根扁担，躺下去似条蚱蜢船，正如他自己说的“骨瘦如柴，身轻似燕，故名之曰柴舟又号曰燕”。他是一位清初的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与诗人，书法也很有名，尤其他的草书写得好，他写出的字体如古木寒石，深得群众喜爱。

他出生的那年，正是顺治皇帝登基的一年，这时正当清兵入关，爱新觉罗氏人主中原之日，但他长大成人之后，鉴于早岁的阅历，使他懂得汉人被异族统治，实在是一大耻辱，现实生活教育了他在他的脑海里孕育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怀抱着反清复明的愿望。

七岁那年，清军南下攻占了韶州府。顺治九年正月，清军以乘胜之势，继续攻占了琼州府（今之海南岛），接着广东全境为清军平定，可是不久，南明残军企图东山再起，转而进攻广东，而粤北当地的南雄、韶州、连州的反清势力（义军）也配合，乘势出击，最后由于义军力量薄弱，抵不住清军的大势，故而南明王朝，随着大势而东逝矣。

顺治十四年，柴舟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桎梏下，与同县的富户邓翼冲先生之长女结了婚，其时柴舟才十四岁，邓氏才七岁，邓氏生性质朴，少年时在娘家学习了不少诗书礼仪的知识，继而初通诗文，随着年龄的长大，双方产生了爱情，夫妻感情甚为融洽，又在柴舟好学的影晌与帮助下，其文化修养不断提高，进而能吟诗作文。平日她积极支持丈夫读书上进。由于廖家贫困，供不起柴舟的学费，于是她竟自愿将自己心爱的陪嫁钗奩饰物典当或变卖，给柴舟作上学费用，从而使柴舟能顺利完成高等级的学业。结婚后他（她）们生有二子二女，后来因诸多困事，造成二个儿子先后不幸夭亡，柴舟因忙于读书交流，对于家庭总是出多人少，往往顾不上这个家，加上父亲在不久前去世因此家庭生活的重担，便落到爱妻邓氏身上。此后，邓氏挺住贫困，精心扶养余下的两个女孩。同时她操持家务克勤克俭，对翁姑也很孝顺，可以说得上是一位贤妻良母。然而，天不假年，在康熙十五年十月，正是国运艰难，避乱于南岸之时，邓氏和余下的二个女儿也相继死亡。邓氏死时才二十七岁，与柴舟共同生活先后不过二十年的岁月，“鸳鸯折翼不堪痛，倩影离魂何处招？”这一打击对于柴舟来说，无异于割肉之痛，自后柴舟孑然一身，不知所终。

在他（她）们夫妇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相互之间，也有唱酬，如柴舟在外游时大约是康熙十四年，飘萍在异乡，想起自己恩爱的妻子，除了写信以安慰外，同时还用诗词吐露自己的心声。表示对她的怀念之情。

荆布支贫未有涯，几年曾共受寒斋。
谈天客至先藏酒，买史囊慳早当钗。
别后尘埃封玉镜，行深霜雪蔽芒鞋。

穷途赢得思乡泪，并入邮笺寄远怀。

看：“买史囊悭寄远怀，”他没有忘记，自己买书的钱，还是爱妻当头钗拿出来的，然而，当邓氏接到良人从远方寄来的信时，心里非常感动，因是自己也和了一首，寄去。

几回魂梦绕天涯，门径萧条闭竹斋。
夜课功忙煨荻火，珠冠当尽插荆钗。
孀姑缺旨愁添泪，破雨侵窗冷到鞋。
欲问前途知此意，慢将虚誉慰离怀。

邓氏为了丈夫的前途和幸福，宁愿自己吃苦，宁可“珠冠当尽插荆钗”，也要鼓励丈夫上进，有光明的前途，这种夫妻的支助精神，何等感人啊！

贫穷的生活，是柴舟过惯了的，缺衣少食他并不把它当一回事。据说有一年，时当岁腊，离除夕不几日了，家家正在采办过年料，而柴舟家里除空气和水不要钱买的外，其余什么也没有，连日常开门七件事的柴米油盐酱腊茶这些生活必需品也毫无着落，可他却若无其事，还是一味地写他的诗，妻子走上前去一看，他正在写“今日自然然不得，开窗且看白梅花”。生了一肚子气，便说：“家里年都过不成，快吊煲断炊了，你还吟什么诗？穷风流，如果白梅花能解决肚饿问题，那么你就去看你的白梅花去吧！”柴舟听后笑着说：“急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天无绝人之路，年总是要过的。”

过了次日的上午，果然韶州府台，派人送来了一批过年的钱物，府台并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一些慰问的安慰言词外，还告诉他说在新年佳节期间还要专程来祝年，因此，柴舟和邓氏以及小孩们都觉得很高兴，从而欢欢喜喜地过了年。

康熙五年，柴舟正是青壮之年，攻读三坟五典于芙蓉山下的绿匪山房，这所地方素来是韶关士人别业的地方，别业多至数百间，亭沼竹树，周遮蓊郁，堪称韶关地方的一大胜地，州内不少弟子生员来往游访不绝。这里是一大片树林，郁郁葱葱，风景优美，当他诗兴来时曾写下一首《即事》诗：

万竹围人坐，闲将鹤影同。
忽惊书恍雨，更爽支荷风。
心已如山寂，庭真似水空。
忘言当此际，新月印墙东。

尽管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抱志不凡，但由于家境贫寒，人生道路非常坎坷，因此至二十七岁时才补为秀才。

康熙十二年，柴舟已三十岁了。这一时期，他远游羊城，为时约一年余，即使在客游他乡，行踪不定的情况下，他总要寻找机会读书自修，只要有书可找的地方他都要设法找来读。一次在羊城发现一家藏书大户，他非常羡慕，发出“此真乃富户也”，后征得这位藏书家的同意，使他阅读了许多书籍，获得不少学问知识。此后，只要有书的地方他都要找来一读，正如他自己说：“早年家贫无书，破产买数十百卷。”可见他对书的嗜好与勤奋了。

这年的十二月，正好是吴三桂联合耿精忠、尚之信等发动叛乱，弄得民不聊生，历史学家把这次的叛乱称之为：“三藩之乱”。从那时起的数月间，连陷辰州，沅州等地，盘据了岭南六省。由于当时的“三藩之乱”，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政治纲领和唤起人们反清的理由，实际是他们借着反清而达到他们称帝掌权的目的，而廖柴舟错以为他们是反清复明的力量，并寄予他们很大的希望，于是在广州写了一首《粤王

台怀古》，面对粤王台的古迹借赵佗自立为王，后终于归汉的故事，抒发朝代兴亡的感慨，隐喻反清势力此起彼伏，斗争不息，表现他反清复明的热切期望。

粤峤犹存拜汉台，东南半壁望中开。
命归亭长占王业，人起炎方见霸才。
日月行空从地转，蛟龙入海卷潮回。
山川自古雄图在，槛外时闻绕电雷。

康熙十三年，柴舟听说仁化丹霞山来了一位和尚名叫淡归的，计划要在丹霞山开发佛教胜地。此人通文才，喜诗赋，因此很想与之交游，奈因自己正奔走功名，未得机会与之相见，只能是书信往来，使他不能不感到一种憾事，直到淡归到韶关南华入寺斋戒之后，这时才有机会投诗送帖，见面相谈并与之交往了，到后来淡归曾与友人刘汉成徒步抵廖府造访，从此他们诗赋相酬，成为有共同的志趣有共同的人生观和社会观的好朋友了。

淡归原名金堡（1614—1680）释名今释，字道隐，淡归是其佛名，今浙江杭州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当时他对满人的统治是不满的，明亡后，曾起兵抗清，永历二年，授兵科给事中，他耿直敢言，被称为“五虎”之一。永历四年，被论罪下狱，谪戍清浪卫，因路途遥远未能成行，最后流落桂林，始看破红尘，削发为僧，先到仁化县的丹霞山创建了别传寺，以后才转到韶关的南华寺修炼，至康熙十二年底，才离开丹霞山，回到老家嘉兴去了。

基于反清复明的思想和诗词的爱好，使淡归、柴舟他们成了忘年之交，走到一起了。有人说他们是佛教信徒，非也，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他们两人都感到自己不为世用，英雄无

用武之地，在那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社会里才不得不这样做的。

柴舟在《山居杂谈》里说：若依释教“使天下尽绝嗜欲，不数十年而人类尽灭矣”。由此可见柴舟是不信佛教的，认为佛教的禁欲主义，是极其荒谬的。淡归比他年长，故柴舟常常尊他为师，又因他曾到丹霞山创建了别传寺，又称他为“一代伟人”。淡归也很佩服柴舟的才华，经常在人前说他的好处。就是后来（康熙十六年）他离开丹霞山回到嘉兴后，柴舟也还写信给他，如信中说“数十年梦想，始得一见为快”，又他因病住无锡的龙护园时，柴舟信说：“闻师以病阻锡，静养龙护园，时逼岁暮，无由恭候”等语。康熙十三年，柴舟父亲逝世，留下寡母，因为自己求学上进更准确点说为自己出仕前途，不得不外游他乡，嘱咐妻子妥善照顾，使母亲安度晚年。

康熙十五年（柴舟三十二岁）下半年，又先后游历仁化、南雄、广州等地，不久又投笔从戎，入伍于江西地区。这时“三藩之乱”正殷，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惨受离乱之苦。在游穗期间，一次路过陈村，见郊区葬有六烈女的新坟，经访问才知是李家的女儿因不愿吴三桂部下的侮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集体跳河而死。柴舟闻此，心里产生敬佩感动之情，同时亦认识到吴三桂的狰狞面目，于是写下一首律诗，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对敌人的愤怒。

寇气当日遍关津，六女捐躯胜古人。

一夕映成池水碧，千秋泪染臂罗新。

蛾眉烈性留天地，夜雨荒坟泣鬼神。

凭吊不须重写照，龟山山色尽前身。

康熙十六年的立春日，柴舟会友人聚集于好友陈金闾家，作棋饮酒，吟诗遣怀，或相慰、或解嘲，非常乐趣，如他写了一首七律《寄陈昆圃》。

平生自笑竟何为，此日相怜作塾师。
地接池荷香度处，光连灯火夜分时。
六经删后谁堪继，一代文成已独知。
举向良朋应肯肯，从来怀抱不相疑。

这首诗除了与友人相慰，也是平生抱负的写照，诗中的“地接池荷”，“光连灯火”说明他与黄遥绛帐相邻，常备课于深夜，关系非常密切与互相信赖。这年三月，清朝驻韶关总兵张耀星叛降吴三桂，对韶关人民纵兵大掠。五月，蟒（依图将帅）师复韶州，至七月。马宝、张耀星又领众数万，再图韶州。当时韶州城内居民避乱入山者，多疫死于河西之靖村、白土等处，造成屋无完瓦，尸相枕藉，惨不忍睹。九月，江宁将军额楚率师援韶，大战于莲花山下，获胜、其乱乃平。

五、六月间，正当盗贼大乱之时，柴舟携妻女避乱于南岸。妻子因劳奔，饥饿过度，贫病相煎，身罹疾病而死亡，跟着次女因患痢疾夭折，这种悲惨的遭遇，给柴舟精神上的打击是极为痛苦的。

兵乱平息后，他孑然一身，抱着一颗破碎的心，拖着病躯，回到故园。环视四周，感到景物全非，一片片瓦砾，一块块砖头细屑，东倒西歪，一派模糊，呆呆地站了很久，才勉强看出原来的轮廓，满目凄凉，不免自己声泪俱下。通过家园和邻屋数百家，联系起来看，都是一片颓泥。兵祸这场浩劫，给韶关人民带来的灾难，确实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他曾用自己的心声，描写了这场浩劫，对“三藩”的控诉。

一身半死余，扶筇观故址，乍入已无辨，
良久乃可指。粃屋数百家，家家剩颓危，
依稀鬼啸壁，先灵失栖止。伤哉读书堂，
瓦砾生荆枳，杀戮及苍生，亦不怨书史。
四梅半株存，松竹已尽毁，犹意初种时，
一刻百回视。芳冷入孤怀，余阴韵素履，
饮读坐其下，颇觉具神理。成败原在天，
此岂及其圯，但见虚墓间，酸风吹叶起。

“一病惟余半死身”。他觉得自己的病蛮重了，于是拖着病体，去就医于陈沧洲门下。陈先生是素以执义忘利的人，见柴舟病体如此沉重，便想方设法要把他的病治好，不幸的是待他的病稍有好转时，女儿又因病死亡，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为感谢陈先生的大力抢救，使他恢复健康，可又家里无钱酬答，只得“报君笔墨”了。廖先生给陈沧洲写一首诗以赠：

《丁巳腊病起寄陈沧洲》

五月二日风萧索，杀气薄云风火恶。
苍茫草莽争避藏，山瘴乘危侵更虐。
妻孥鬼录哭声吞，一病惟余半死身。
健儿日呼鬼夜泣，引领谁肯肯援汲。
闻君慷慨载同归，药疮多时为骨立。
惊魂今始得生还，回忆从前喜惧集。
似兹急义侠者谁，古今中人我见之。
报君笔墨可无负，谱入吾时君亦古。

康熙十七年，柴舟三十五岁，自己仍然孤身一人，在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宗接代的思想支配下，为了

继承香火，拼弃孤独，仍然须要找回一个伴侣。因此通过亲友的介绍与支助，又在附近娶了一位姓邓女子，生下四个儿女，仍是二子二女，这时柴舟觉得自己又有一个家了，这时生活较为安定如意。

由于家庭的安定，心神的转好，便与友人商议筹建风度楼。这风度楼，据《曲江县志》载：韶关人为纪念大唐丞相张九龄，早在北宋天禧（1017—1021）年间始建。此后包丞苏轼等人都有为此题咏，历代以来兴废多次，而廖柴舟也是非常尊敬张九龄的，他曾写过许多诗作，去赞颂讴歌张九龄在开元时期对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成就和开凿大庾岭驿道的伟大贡献。康熙二十年（1683）夏，大乱之后，韶州的风度楼毁烬无遗，一班崇敬张九龄的文人雅士又积极提倡重修风度楼，廖柴舟也是当中的一位。他除了积极推动募捐之外，为重建风度楼写了碑记，至次年六月落成。当楼建成之后，自己高兴地登上风度楼，用自己的余兴写下《登风度楼》一诗，如：

独此危楼在，遗风想像中。
功标庾岭胜，诗起盛唐雄。
高置身千尺，遥开一眼空。
由来经济士，旷世许相同。

诗里通过写风度楼的形势，歌颂了张九龄开发庾岭之功和建设开元之绩，以及他那雄伟的诗风。然而新建的风度楼不到一年，却又被大火毁了。至康熙二十四年八月，有韶州知府唐宗尧和廖柴舟等再度倡导重建，经过二个月的紧张施工，乃得顺利竣工。

康熙二十六、二十七年这几年，廖柴舟参与修撰《曲江

县志》和《韶州府志》的工作，两志收集他不少的诗词，曲江名胜二十多首，大都写于此时。

康熙三十年，柴舟得友人郑思宣之荐，准备到广西谋事，因中途变约，逐致未得如愿，于是又返回家园。返家后蛰居陋室，闭门谢客。无聊时抽暇给郑氏写信，先后写了几封信，第一封信是这么说：燕拜……馆谷所入，莫救饥寒，近已弃去浪迹……，第二封信说：昨来南宁，意谓即可扬帆径去，而俟十余日，竟不得一便舟，坎坷之人，动见阻滞，大抵于此，归心似箭，逐致度日如年”。第三封信说：“客岁四月。从南宁旋里，身治蛮烟瘴雨，尽驱人行壤中作诗料用”云云。如他在旋归途中的诗料，是这样写的。

穷冬犹作客，心逐片帆悬，不为营衣食，
宁轻冒瘴烟？星分同鸟屋，萍聚翼乡船，
底事凭谁语？踟躇落照前。

康熙三十二年的秋天，柴舟应府台陈廷策之邀到了广州，住了二、三个月，至这年的腊月，又回到英德客居。次年，为了生活，再次奔走广州，这时得知后娶邓氏生的二个儿子因贫病无钱医治，相继夭折，加上韶州大饥荒，柴舟处于家散人亡之中。但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幸得协镇都尉孙清先生的大力倡议，赈济灾民，并以实际行动来资助柴舟。一次孙清亲赴柴舟家查访，见廖家住屋十分狭陋，心里很是难过，因此遂与游击查之恺等人商量，决定解囊相助，并将柴舟原先典当出去的住屋赎回来，雇工把它修缮好，还送给他日用物品。于是柴舟在穷困中得到救助，无异如雪中送炭，如鱼得水，心里很是感激。为此，他又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孙君查君开戟门，不嫌贫贱来小轩。

相看座次难容膝，安得青山赠隐纶。
傍有荒花堪寓目，一椽尤许围修竹。
询是吾宗出质庐，赎买恰好为书屋。
语未出口快捐囊，还请同侪助薪筑。

诗里叙述了孙查两人临轩看望和解囊相助的经过，最后还衷心感谢他们资助的好心。房屋赎回之后，同时接着把它修补好，这时柴舟的心情有别一番滋味，于是写了一首七律。

地偏偏得好林泉，新构松寮水石边。
晚岁著书怜此日，清明移竹忆前年。
窗开峰影连云见，树隐渔家入画传。
惭愧贫居无客到，柴门春长绿苔钱。

总之从康熙二十七年到三十年这一期间，廖柴舟为寻求出路，先后到过江西、肇庆、广西、乐昌、英德等地，并曾两次到过广州游历。

康熙三十年，廖柴舟已近五十三岁，这时正值陈廷策卸任赴京，廷策欲乘拜见皇上的机会，顺便将南粤才子廖柴舟介绍入京办事，于是力邀柴舟一同前行，而柴舟自己也想进京一行，决定在正月二十六日从广州启程，二月中旬到南昌，不料到南昌后，因故两人不能前行，改为分途北上。两人在分手之前，陈廷策还留了盘费给柴舟，并写信嘱咐韶州府官员，要接济其家困难。当他与陈廷策分手之后，便与苏州人薛某同行，三月中旬抵达苏州，在苏州客居了四个月之久。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前段寄住薛家。俗话说：“日久见人心”，在日常的接触中，发现薛某为人狡猾，对朋友不忠，不可与之交往，遂改寓于苏州通圆寺。这时既无好友，又无可爱的书藉好读，形单影只，困在寺中，极少外出，加上陈廷策消

息全无，踪迹难寻，旅中心情更为烦燥，时发思归之念，因而写了六首旅怀诗，其中一首云：

搔首问青天，青天不肯语，壮士抱奇才，
脉脉徒自许。仗剑走天涯，拄颊视岛屿，
美人期不来，浮云适俦侣。人事多参差，
忧来不可拒，安得金丹成，此身忽轻举。

七月，陈廷策不幸在京病逝。噩耗传来，柴舟心里异常悲痛，且认为自己仕途从此已绝功名矣，连声叹曰：“我命该如此，命该如此啊”！从而感到一生已无希望了，遂南归。这次所归，是返回韶关老家西河。可是他在南归途中写了不少诗词，如《旅怀》六首、《题严子陵钓鱼台》、《高凉道中闻子规》等。这也许是因为廖柴舟早年读过金圣叹所评的各类书籍，对他的一些标新立异的评论，心里很是佩服的。他因陈廷策约他北上京都经苏州时，闻知金圣叹先生已含冤被杀多年，深为惋惜，本欲寻访金氏故居，奈不知所在，因作诗以吊曰：

诗书塞天地，斯道益蔽亏，孰具点睛手，
为之抉其奇。君怀创古才，奋笔启群疑，
· · · · · ·，· · · · · ·。高标七子作，
分解三唐诗，其余经赏鉴，众妙分陆离。
陈者使之新，险者使之夷，昏者使之为，
字字有余思。掀观鬼神窟，再开混沌基，
遂令千载下，人人得所师。我居领海隅，
君启吴门湄，读君所著书，恨不相追随。
高才造物忌，行僻俗人嗤，果以罹奇祸，
遥闻涕泪颐。今来闾閻城，宿草盈墓碑，

斯人不可再，知者当俟谁？

诗中揭示了廖柴舟对金圣叹的道德文章崇高的敬意，同时对他的不幸遭遇寄予无限的悲痛。金圣叹先生是怎么死的呢？顺治十八年清始祖福临去世、乘官员举哀吊唁机会，金圣叹与秀才们亦聚集一起去“哭庙”，要求驱逐暴虐贪污的知县，清廷误以为金氏聚众作乱，并因他才名卓著，而又富有民族义愤，被目为首犯，不久将金氏逮解江宁（南京）处死。

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四年的十年间，柴舟经过此次挫折，从苏州南归后，觉得自己年岁老大，很少外出，尤其后五、六年，安于贫困，一心杜门著书，但较近的地方他还是要去走走的，如三十七年应朋友的邀请，曾赴高州一行。到茂名后，知县还请他游视西城。在赏游中，他还写了《高凉道中闻子规》的诗。

乍入高凉路，偏多杜宇声，思乡肠易断，
啼血恨艰平。落花春三月，灯昏梦五更，
几人曾共听，孤客泪先倾。

他多愁善感，触景生情，诗的意境凄迷，诗里反映了旅途跋涉之苦，孤零乡思之情。

这年夏天，他又到广州游旅。在广州游旅期间，还为朋友的书画作跋，秋后他又返回故里——韶州。返家后，先给乳源县令写信问候，以图联系一批友人结伴上京，参加诸生员的考试。

康熙三十八年（1699）《廖燕传》载，“……学使按韶，（廖燕）赋诗一章辞诸生……自后当道至者，莫不往访，然罕见其面矣”。说明柴舟自感年岁老大，自愿回到故乡芙蓉山下，在那二十七棵松树的陪伴之下，杜门著书，决心过“抱琴书、

伴钓矶”的隐士生活，远避政治尘嚣，真有如世外桃源。说到辞诸生，即放弃各种生员（如增生、附生、禀生、例生等）的考试，表示不再到科场中考试去了。

他的那部《二十七松堂集》就是在此时期，在此地点把自己所有的诗文词稿整理而成的。二十七松堂是他最后居住的地方，正好是二十七棵大松树下建成庐舍。这二十七棵松树也是他晚年至好的朋友与嘉客了，有诗为证。

我昔有堂在西郭，群松拥护成林壑。
寒涛日夜吼碧空，一声声响窗前落。
虬技龙干之低昂，历尽风霜岁月长。
计株仅得二七数，即以其数名吾堂。

尤其在康熙四十年后的两年间，廖柴舟在他的二十七松堂埋头著述，奈因老病缠身，无力振作，从此时起诗词写作则不多了，那首《重游曹溪草亭》诗，是他逝世前写的，可能是他最后的一章了。

曾掬曹溪洞口泉，重来已隔廿余年。
苔侵破壁题痕旧，景入新秋画谱妍。
夜静风翻千树月，晓寒雨洗一潭烟。
此身已是维摩后，欲结青山世外缘。

因为这几年直到他辞世，除此诗外，再没有发现过他此后的诗作了。在康熙四十二年冬，曾被友人邀请到仁化县一次游，可是因病无能再登丹霞山，就是偶有人请他题诗，他也懒得去应酬了。

康熙四十四年，他因病魔缠身，过于虚弱的身体，经多方治疗，仍然无效而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一岁。

综观廖柴舟先生的一生，虽命途坎坷，穷愁潦倒，但他

的为人抗志不拘，重持气节，厌恶趋炎附势，虽欲步入仕途，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最低限度能有益于世的愿望，但都没有机会达到，就是在自己晚年的岁月里，一次想趁陈廷策因调用邀他上京的机会，能一见皇上，希望能得到皇帝的赏识，但都终成泡影。

在学术上，他主张读“无字书”，即抛开书本到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去学习和体会，从而直接得到更丰富的感性知识；在观点上，敢于离经叛道，对程朱理学及儒家传统史论，多持异议，别有见解。

他的诗风，自然风趣，平淡而永隽，读之能唤起人们的共同感情，令人感到格外新鲜，亲切而真实，越读越耐人寻味，兴趣无穷，难怪近三百年来，柴舟的诗词，不被历史所淘汰。民国时期，在廖柴舟的故里（原籍）乳源，大多人家都留存着他的代表作《二十七松堂集》，有的木刻，有的手抄，有些文人还在诗中用红笔划线点圈，书头眉批或注解等。可见廖先生的诗作在韶关地区，尤其在乳源老一代的知识层中广泛传颂，历久不衰。

柴舟学识渊博，不仅所写诗词很多，文章议论也不少，气势犀利，论诗则反对模拟堆砌，而成为韶州有名的文人墨客。著有近体诗词五百五十多首，其中《山居杂咏》三十首，部份诗词被友人邓氏和尚带到日本去刊行，至今还有诗作珍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图书馆内，另著有杂剧《醉昼图》、《诉琵琶》等数种。

注：参考资料：《乳源文史》第三辑《粤北历代名人诗选》第266页至311页，（黄志辉、龙思谋编注）；《二十七松堂集》（廖燕著）中的有关诗文记述。

《读廖燕诗感赋一首》

(依《山君诗》第八首韵)

廖燕诗词誉粤关，瑶章朗诵喜开颜，
自然亲切抒心曲，雅健雄深唱水湾，
吟咏千章情未尽，悲欢十载意犹闲，
遗篇句句声威壮，似奋鞍刀斩石顽。

附：廖柴舟《山居诗》三十首（七律）

一

愿结烟霞梦不违，遥瞻山色已神飞。
几年作客游方外，就日携家住翠薇。
水国潮生浮艇去，松窗花落指云归。
到来邱壑难忘处，正值春风蕨笋肥。

二

远山重叠白云升，移步家居最上层。
风里响听千尺瀑，雨中寒坐一龛灯。
微言此日难传授，大道何人肯仰承。
自昔恢心寻隐乐，门前流水早成冰。

三

柴门曲折傍云开，世外经营取次栽。
时放渔舟题画去，偶从僧屋赌棋回。

红添锦绣三春雨，绿染须眉半亩苔。
读罢楞严闲睡觉，此身何异在蓬莱。

四

住久山庄路不迷，千峰行尽草桥西。
频看花鸟随时变，杂植叠麻过屋齐。
秋晚寻僧黄叶寺，宵昏钓雪绿萝溪。
平生自信贪奇癖，惯贯村醪酹杖藜。

五

几年避迹卧崆峒，茅屋高低竹树中。
未学谁堪称隐逸，有才人始许贫穷。
芭蕉雨过侵书幌，牡蛎墙荒聚草虫。
正好新当春酒熟，飞笺先约灌园翁。

六

掩映疏篱野趣饶，清幽况复近僧寮。
月明墙角梅初放，霞湿松梢鹤可招。
随筑黄泥成古屋，任分绿水灌新苗。
从今不用寻山隐，处处枝头好挂瓢。

七

红绿经秋尚未稀，周遭好护旧柴扉。
闲来著述心徒切，老去功名愿已违。
竹榻诗成观蚁斗，石楼琴罢羡鸿飞。
故人家住清溪曲，千里相期共采薇。

八

世外何须学闭关，林泉随处好舒颜。
行舟一水溪光渺，家绕千竿竹路湾。
好句当前吟未稳，胜性终日坐来闲。
分明记得囊中约，才入烟霞性更顽。

九

水石周遭一径通，沿堤花放色绯红。
寻常送客柴门外，潦倒题诗竹箬中。
四壁野风吟蟋蟀，三更霜月上梧桐。
此时独乐成高隐，卧听溪声隔岸东。

十

松针种提已成林，绿覆墙东小院深。
花影满帘人挂颊，溪山如画客携琴。
著书眼盼先天地，经世才高辨古今。
每忆罗浮仙处隐，万峰峰顶一沉吟。

十一

踏遍烟岚兴更奇，新诗写就手长披。
全身有意藏岩石，与物忘机狎鹿麋。
寺送疏钟人静候，渔归远浦月明时。
山情近夜尤堪赏，独上高楼听籁吹。

十二

几折寒流接板桥，杖藜何处访渔樵。

名花种就时堪赏，好句吟成酒未消。
松桂满山明月皎，蒹葭隔水美人遥。
年来心绪凭谁诉，数遍墙东一簇蕉。

十三

爱山常抱住山心，拮据于今始胜任。
到处烟霞双履足，闭门风雨一床深。
碧桃花下人闲卧，独木桥边客远寻。
又约千峰锄药去，杖头挑上古瑶琴。

十四

丰草长林杂苇芦，闲情恰与野情孚。
漫言邱壑藏胸里，不觉须眉入画图。
曲岸丛深巢翡翠，荒唐水浅长茨菇。
春来到处寻芳去，赏遍溪山只酒壶。

十五

深山初觉早寒添，手倦抛书曝短檐。
万顷平畴翻麦浪，三叉斜路滑松针。
坐临水石心俱冷，卧入烟霞梦亦甜。
闻道长安尘十丈，从来足迹未曾沾。

十六

树杪炊烟几缕斜，偏宜数口住山家。
潜疏涧道随流曲，悠向耕农去路遐。
满室化工留竹影，一林香露落松花。
斯情正与闲情得，又报邻翁约采茶。

十七

春回刀绿绕围墙，几片飞花坠砚香。
好友招来成石隐，奇书著就觅山藏。
沙田水长含泥蚬，岩屋檐生上树姜。
值得松风连晓夜，扶持清梦到羲皇。

十八

风雨连旬掩敝庐，此中怀抱欲何如。
图成剑侠开斋供，种就芭蕉秃笔书。
黄卷满床消岁月，绿衾一领老樵渔。
近来尚畏人踪迹，又向深岩别卜居。

十九

几片晴岚接荻湾，似将画意与秋山。
钓垂潭月孤身往，药采藤花满袖还。
千古胸藏天地秘，一时情寄水云间。
林涛尽日无人到，雨渍阶前野藓斑。

二十

信步芒鞋半溅泥，闲看阡陌绿萋萋。
收来花瓣缝茵卧，移得山岚上画题。
荒境雨昏常过虎，孤村日午乱鸣鸡。
西城又近黄昏后，雪压寒梅几树低。

二十一

野性耽闲僦僻居，每思往事亦难除。

栽茶绿遍新开坞。洗药香浮乱甃渠。
云泻断峰秋色净，月窥残梦夜帘虚。
醉来潦倒长吟句，都向邻庵壁上书。

二十二

炊烟遥共片云浮，山色苍苍景更幽。
笔底有文通造化，眼前无事系心头。
梅花香绕吟诗屋，杨柳堤横弄笛舟。
却羨二三知己在，清山好结月明游。

二十三

只窗半破透曦光，二十年前旧草堂。
明月贮胸尘不染，白云在望迹堪藏。
雪酣乌柏千林醉，艳漫红蕖一水香。
欲散幽衿闲远眺，收来佳句满书囊。

二十四

遥望山岚似有无，何妨行径杂樵蔬。
花明几处开诗境，囊涩经年积酒铺。
数亩田园生计足，一肩云水枕头孤。
还期快试扁舟乐，稳载全家泛五湖。

二十五

踪迹年来与世忘，尚余何事好相商。
篱花争发围茅屋，野水分流入藕塘。
岩穴有人专著作，庙堂无缺藉匡襄。
孤怀此际谁堪伴，夜夜松荫扑满床。

二十六

竹屋窗开野水边，读书犹记十年前。
苦吟几榻常留稿，入画峰峦尽带烟。
长日耕余分馐食，远山樵倦傍松眠。
等闲又度春三月，乱棘丛深叫杜鹃。

二十七

地绝尘嚣少送迎，闲中岁月几回更。
树连邻圃藏鸠屋，藤荫荒塘架豆棚。
沽酒病当三日卧，赏花时值一天晴。
扶筇又向何峰去，欲上匡庐听瀑声。

二十八

山窗却好接修篁，终日看花独劝觞。
瓦雀将雏喧小圃，苔痕随雨上回廊。
是非浪语千秋史，笔墨参禅众妙方。
闲画故人悬卧室，免教魂梦太凄凉。

二十九

一溪绿水隔红尘，鸡犬桑麻不计春。
坠箬为冠成古制，好花酿酒醉芳辰。
招来世外渔樵侣，隐去人间翰墨身。
谁是披裘天子客，碧波深处漫垂纶。

三十

勘破行藏尚欲何，此生赢得住岩阿。

穿篱嫩笋成苞竹，绕屋危墙长薜萝。
半世心耽尘事少，数家耕占水田多。
闲来得句偏奇绝，书向花间倩鸟哦。

依廖柴舟《山居诗》三十首原韵赓和（七律）

杨民生

一

书生报国愿相违，情寄林泉逸兴飞。
少壮无缘攀桂树，老来有意采巢薇。
挑犁引犊披星出，种豆荷锄带月归。
风味家山尝不尽，糟汤咸菜亦甘肥。

注：巢薇即巢菜。

二

晏眠不觉日高升，劳作担粗蹬岭层。
黄卷晨研仍卧枕，青麻夜绩点盈灯。
折松烹茗烧烟呛，截竹引泉细渠承。
作罢农桑吟拙句，管它寒雨化成冰。

注：担粗就是担大粪

三

风光顾我好怀开，锦秀山河取次裁。
除旧千般随腊去，维新万象已春回。
黄莺树底听春雨，青石亭中长湿苔。
矮屋柴扉贫贱惯，此身总觉住蓬莱。

四

坎坷泥泞路不迷，行东不致误行西。
任由风雨随时变，自与峰峦可比齐。
风度诗声传粤海，南华禅诵壮漕溪。
今生七十难称意，且送斜阳扶杖藜。

五

古楼烟雨满乡峒，圆在忘机世事中。
鳞次山峦分上下，衣冠人物有优穷。
波涛忽起惊蛇螫，风雨频来撼草虫。
浪迹生涯如旅寄，相逢且莫讶衰翁。

六

筑屋编茅算富饶，垂杨绿竹绕贫寮。
虽无车马当门集，亦有良朋把酒招。
新稿未曾重造句，妍花真应首培苗。
眼前不羨江河大，自舀山泉水一瓢。

七

世态炎凉诤友稀，南窗高卧掩柴扉。
诗词老练曾因困，事物开初总是违。
但得衣温心便足，尚能饭饱意犹飞。
余生修到天伦乐，一任清溪长翠薇。

八

登峰走嶂上云关，烟雨晴岚彩画颜。

树影婆娑千叶翠，鹰声回荡九程湾。
云巅俯首诸山小，脚底流霞尽日闲。
历遍沧桑人未老，危岩策杖似童顽。

九

花笑寒儒运不通，悄然暗淡失绯红。
人生险阻艰难里，世事悲歌感慨中。
廿七高松凌碧落，万千细雨滴梧桐。
等闲欲步龙池阁，遗憾长江水已东。

注：廿七高松：指廖燕居处的二十七棵松树

十

穷经空感老儒林，居住寒泉岁深。
双字利名双把锁，一枝秃笔一囊琴。
玉壶心底宽天地，风雨人生阅古今。
喜有蜗庐藏我拙，清贫每自抱长吟。

十一

吟诗欲觅句无奇，旧稿翻来辄乱披。
倦向杯中浮绿蚁，饥从厨下索羹糜。
攻书往日嫌迟暮，闻道如今喜及时。
杳杳蓬壶天路远，沉沉羽翮待风吹。

十二

花销蓝关柳锁桥，山林栖止慕渔樵。
门临溪水关常闭，雨漏床头滴未消。
籍卷当中开懵懂，葛巾方外任逍遥。

满腔心事凭谁诉，命运形如雨打蕉。

注：葛巾：指古代炼丹成仙的葛洪

十三

高洁谁为表予心？老牛重负自难任。
诗歌不及钱财贵，鱼酒难供盘盏深。
粟可充饥凭累获，药能治病哪方寻。
知音同饮宜春酒，钟子能知俞伯琴。

十四

一片平畴尽草芦，勤耕苦种望堪乎。
沙明水碧宜垂钓，云白山青好画图。
闲与诗朋聊对句，兴随野老共培菇。
相逢知己欢欣饮，击节高歌碎唾壶。

十五

又念衰鸿袂未添，无声冻雀息危檐。
灶中炭湿难传火，路侧荆丛尽冒针。
沽酒常羞囊涩涩，吟诗总觉兴甜甜。
任随鸱角频猜度，腐鼠鸩雏绝不沾。

注：腐鼠鸩雏：《庄子·秋水篇》说惠子与庄子原为好友，只听了小人的谗话，怀疑庄子要夺他的相位庄子对惠子说：南方有鸟名鸩雏（凤凰）从南海至北海沿途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吃，非泉不饮，十分高洁，然遇一鸱鸺（猫头鹰）正获一只腐烂的死老鼠。生怕猫头鹰抢走，于是“哞”了一声，可是凤凰连看也不看便走了。

十六

野鸟闲栖玉树斜，有谁青眼看寒家。
人情世味杯壶近，水复山重道路遐。
囊里功名身外事，眼前锦绣镜中花。
满腔妙趣谁能识，款客诚心煮好茶。

十七

燕掠春阴入短墙，满林花木喷馨香。
剑囊踟躅思锋利，心境萧疏抱拙藏。
少小雄心刚似虎，老成世故辣如姜。
布衣亦是人间出，纯朴诗风礼上皇。

十八

亦足称为阮者庐，萧然四壁意何如。
嚶鸣海内求知已，狼藉床头读好书。
抱卷长吟消岁月，开门待作学樵渔。
最怜雪月风花句，坐对松云水竹居。

十九

行踪且寄上坪湾，丘壑高悬似座山。
鼓劲披星除草去，勤劳带月砍柴还。
鱼游浅水池塘里，灯照残光陋室间。
堤上垂杨频摆舞，落花轻衬石苔斑。

二十

廿载青春付土泥，心如荒地草萋萋。

有缘唱和连千友，无纸吟诗少两题。
卷恋江山思猛虎，忧怀风雨待鸣鸡。
山途险恶难行走，十步高来九步低。

二十一

谁人不爱好山居，懒散闲游习竞除。
欲在门前旋种竹，宜于屋角又开渠。
醉醒人世浑如戏，荣辱声名总是虚。
不为穷愁消意志，医愚端的要读书。

二十二

万壑千岩爽气浮，闲来游赏景清幽。
扪心自问无媚骨，对镜方知已白头。
染翰操觚忙度日，弄潮濯足赶飞舟。
暮云芳草尤堪赏，甘醉疏狂任放游。

二十三

帽峰山顶赏风光，四地联心客满堂。
技艺营谋随意学，诗书益智任箱藏。
澄澄鉴水春风暖，霭霭家山桃李香。
盛世辉煌留雁迹，韶华风雨入诗囊。

注：四地指梅辽四地

二十四

雨雨风风甚日无，管它丰歉种园蔬。
杜陵江畔开诗境，元亮花边辟酒铺。
野鹤闲云时作伴，寒梅疏影亦非孤。

老夫受用常知足，记得当年困海湖。
注：海湖：作者因厄困青海湖边十五年

二十五

好友亲朋岂可忘，吟哦助兴谱宫商。
飞停鹤鹭游沙渚，来往鸬鹚过野塘。
对客几回谈世道，交游不少论帮襄。
忽来夜雨慌忙甚，屋漏频移几处床。

二十六

乐守清贫苦竹边，何须计较住山前。
寒灰冷灶难留火，缺米无盐欲断烟。
得句喜拈花叶写，观书倦作枕头眠。
一生事业东流水，致使寒儒总泣鹃。

二十七

春风杨柳似相迎，不觉时轮已换更。
才整花坞清菜壑，又除杂草搭瓜棚。
绸缪蓑笠遮风雨，挥舞银锄赖日晴。
劳动归来灯已亮，登楼依旧读诗声。

二十八

茅屋三间绕绿簷，宾朋促膝醉壶觞。
乐天似有蓬莱境，亏命愧无珠玉廊。
别个易寻臻富法，唯吾难找治穷方。
如能上得天堂去，桂殿蟾宫好纳凉。

二十九

四壁萧条不染尘，此生已误廿秋春。
谁知幸遇伸头日，忝觉重逢盛世辰。
白日难消头上雪，黄金岂铸镜中身。
时人莫笑余衰老，好向山溪放钓纶。

三十

昔日穷愁奈若何，添茅补屋住山阿。
堂中热烈谈诗酒，门下萧疏长薜萝。
巷口莓苔笸裤少，江山风月咏怀多。
布衣柴老今如在，也应松堂共唱哦。

（作者：原南方大学学员）

封面题字：赵朴初
主 编：伍时永
编 辑：罗运梅
校 对：罗运梅

韶关文史资料

第二十五辑

* * *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粤印准字第0013号

邮政编码：512002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承印